

新北市立 黃金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JOURNAL 第四期

2016學刊



新北市立
黃金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JOURNAL 第四期

2016學刊



序 文

局長序

林寬裕

04

館長序

廖文卿

05

學 術 論 文

夾雜於文化資產與觀光資源認知下的日本神社遺跡：

以金瓜石神社、鹿野神社，臺中神社大鳥居為例

The Remains of Japanese Shinto Shrine which is Valid between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 Jinguashi Shrine, Luyeh Shrine, Taichung Shrine Otorii as An Example

撰文 | 林承緯 Cheng-Wei Lin

06

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

A Study of Taiwan Traditional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撰文 | 李建緯 Chian-Wei Lee

20



文化資產教育與博物館

Heritage Education and Museums

撰文 | 江明親 Min-Chin Chiang

48

以博物館為管理平臺發展工業遺產旅遊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例・臺灣／金瓜石

Museum as the Platform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Jinguashi, Taiwan

撰文 | 蔡宗雄 Tsung-Hsiung Tsai、蘇憶如 I-Zu Su

58

硫砷銅礦的發現與金瓜石礦山

Discovery of Enargite and Jinguashi

撰文 | 駱淑蓉 Shu-Jung Lo

76

變生太子賓館的前生今世

Different Fates of the “Twins” of Crown Prince Chalet

撰文 | 許勝發 Sheng-Fa Hsu、徐明福 Min-Fu Hsu

94

礦山寺廟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以金瓜石地區勸濟堂為例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 and Social Changes in Mining Town – A Case Study of Quanji Temple in Jinguashi

撰文 | 王慧珍 Hui-Chen Wang

112

局長序

金瓜石是水金九礦業遺址的核心主體之一，環繞的山巒與蜿蜒的溪谷成就絕妙的自然地景，礦業運輸軌跡與冶煉設施串連起聚落之間的緊密關係，街巷建物與廟宇神社形塑別具特色的人文記憶，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記錄著臺灣金銅礦業的發展痕跡。

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故事，記載金瓜石山城百年來的礦業發展過程。自十九世紀末發現金礦開始，歷經淘金採礦的榮枯、走過不同採礦經營模式，歲月的刻痕層層疊疊不斷地留下印記。金瓜石保有的文化資產，讓它從過去產礦、採礦的工業山城，轉變成吸引研究者、旅人探訪的對象，無論在地質、礦業文史、自然生態、建築或旅遊等領域，在在被研究人員或遊客用不同方式記錄下各自感受。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每年一期發行學刊，集結本局團隊與各界學者的智慧結晶，透過文字方式累積學術能量，期望藉由多方的思辨，讓金瓜石礦業遺址的文化面貌能更完整。在本期學刊中，可從宗教信仰的視角觀察社會變遷的脈絡、觀光認知的轉化；從金銀飾品工藝、形制的演變，認識其社會象徵意涵；從文化資產的角度剖析博物館在教育、遺址旅遊的角色；從礦業歷史探討金瓜石礦業形成、比較不同礦區的日式建築等，提供讀者認識水金九地區文化元素的途徑。

水金九礦業遺址是新北市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業遺址與人文資產，構築出多面向的文化紋理，也使金瓜石礦山文化有別於其他礦業城鎮，更是閱讀金瓜石的多元角度。礦山文化需要被記錄，未來，本局團隊將持續努力以既有的文化脈絡為骨幹，思考活化保存的新契機，再現金瓜石地區特有的礦山風華。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林寬裕

館長序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坐落的位址，承襲著百年以來的時空流轉，一頁頁礦業發展史堆疊，讓金瓜石的山光水色、聚落建築與礦業設施等，形成獨樹一幟的空間氛圍與人文記憶。然而，金瓜石礦業發展不再，但它的故事與能量並未停歇，因著礦業開採留下的遺跡與史事，有了可以追溯礦山歷史、文化資產，研究自然礦物、地質面貌，探討旅遊觀光、金屬藝術發展的契機。

保存礦業人文歷史特色、推廣生態環境旅遊、推展黃金及金屬藝術是黃金博物館創立的宗旨，本館透過展覽策劃、課程推廣、體驗活動或學術研究等方式，持續在營運軌轍上前進，也不斷調整實踐模式。藉由學刊發行逐步匯聚涓滴的研究成果，以作為讀者認識黃金博物館的媒介，也作為瞭解礦山文化或水金九地區人文風華的發軔。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自發行以來，以水金九地區文化資產保存活化、歷史人文、博物館經營或金屬藝術等領域為文章主題範疇，期望能觸發讀者對礦業文化及現況發展的回溯或省思。本期學刊蒐錄主題豐富，聚焦文化資產、工業遺址、礦山社會等層面，梳理文化資產與觀光、教育的發展關係，瞭解臺灣金銀飾品內涵、礦業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脈絡，從多個面向發掘礦山記憶與詮釋礦山文化發展。

金瓜石在大自然資源與歷史淘洗的相互碰撞下，締造獨特的山城聚落與礦業文化，它與鄰近的九份、水湳洞因為礦業發展形成緊密的生活網絡，然卻又能各自獨立，各擁殊異風貌。黃金博物館將戮力作為礦山歷史記憶保存與礦山文化活化的橋樑，藉由研究性文章的彙集出刊，讓讀者認識在地文化梗概，也激發更多力量的挹注投入，讓礦山文化能綿延、創新。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館長

廖文卿

夾雜於文化資產與觀光資源認知下的日本神社遺跡：以金瓜石神社、鹿野神社，臺中神社大鳥居為例

The Remains of Japanese Shinto Shrine which is Valid between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 Jinguashi Shrine, Luyeh Shrine, Taichung Shrine Otorii as An Example

林承緯 Cheng-Wei Lin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摘要

臺灣為日本最初的海外殖民地，在半世紀的統治期間，各地在日人原鄉信仰、宗教政策等因素促使下，造就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信仰大規模的移植來臺。不論是神社神道、國家神道、教派神道或是民俗信仰其宗教設施的神社、社祠廣泛被興建，神道宗教之祭神、信仰、祭典等蘊含於神道的信仰文化隨之散布落腳全臺。這些神道宗教設施至今仍有不少遺留，被視為文化資產、觀光資源而加以保護、利用。其中，有重視硬體性的史蹟保存，近年亦出現採以展演、展示，甚至遺跡重建的發展動向。本論將從臺灣歷代的宗教受容談起，針對現存的日本宗教遺產進行概說，並擇以神社重建、鳥居復原等近年所出現的鹿野神社社殿、臺中神社大鳥居等代表事例，探究神道宗教遺跡在臺灣呈現的多樣發展面貌。最後著眼金瓜石神社近年來從基礎研究調查到透過祭典活動、遺跡修復、文化展示等面向所展開的系統性文化資產保護工作，分析金瓜石神社從單純的一座戰前宗教遺跡如何加以資產化，

讓已喪失原功能的場域得以轉換其價值，進而綜觀從金瓜石神社、鹿野神社至臺中神社大鳥居等日本神社遺跡發展所反映的日治宗教遺產的現況及存在意義。

關鍵字：日本神社遺跡、文化資產、觀光資源、神社重建、再利用

Abstract

Taiwan was the Japanese Empire's first overseas colony.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onial rule, which lasted over half a century, hundreds of Shinto shrines were built around Taiwan based on Japanese faith, religion and politics. Today, many of these Shinto religious installments can still be found. Across Taiwan, they are regarded as religious heritage and thus treated with care and used appropriately. There is an emphasis on the physical preservation of these historical artifacts as, in recent years, many have appeared in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and ev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artifacts.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explaining existing Japanese religious heritage, whilst taking Taiwan'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discussion. Tak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hinto shrines and the Torii (Shinto shrine archway) as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it will illustrate the diverse features of Shinto religious relics in Taiwan.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recently launched, “systematic cultural asset protection” of Jinguashi Shinto shrin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how pure, pre-war religious historical remains were turned into assets, and will create an overview of the appear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Colonial-era Japanese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artifacts that can be found in Taiwan.

Keywords: the remains of Shinto shrine, cultural property, tourist attractions, shrine reconstruction, recycling

壹、前言

「世界遺產」、「無形文化遺產」、「文化資源」、「文化財」等名詞充塞於今日的社會，縱使多數的人們對這些用詞的含意欠缺完整的認識，不過舉凡造訪國內外觀光景點，或是隨手翻閱各種地方人文介紹的書籍雜誌，世界遺產、文化資產已是人人耳熟能詳的語彙。「遺產」一詞最早具有前人遺留給後世的財產之意，近代隨著世界遺產等文化、自然遺產保護觀念興起，社會大眾對遺產的認知大幅提升，在前述如世界遺產、各國指定登錄文化財等狹義的遺產概念之外，像是文化遺產、歷史遺產、產業遺產、文學遺產，以至於本論將探討的宗教遺產，遺產成為表述珍貴值得人類代代傳世資產的概念。當然，這樣的概念於近來，也衍生出負面遺產等用來指稱人類因戰爭、虐殺所造就的負面遺跡。在各種不同屬性的遺產中，宗教遺產可謂歷年來廣受關注的類別，這點我們從過去世界遺產指定下的教堂、神殿等宗教設施，再進入到無形文化遺產登錄也多見具宗教性格的祭典儀禮，顯示宗教遺產為遺產概念下的今日不可或缺的區塊。舉凡名列世界遺產或各國文化資產保護制度下的宗教遺產，多數的屬性皆以該區域長久傳承發展的宗教信仰居多，譬如佛寺、神社的日本，或像是西方各國廣泛存在的教堂、修道院，這些擁有深厚歷史、優美造型、特殊意義並屬於該地區主流信仰的相關遺產，自然而然容易獲得正面的評價，成為該地區代表性的宗教遺產。

相較於前述普遍所認知的宗教遺產，近代伴隨著帝國勢力擴張，因而在各地創建的宗教設施及其文化傳統，縱使多數伴隨帝國崩解、統治結束而落幕，這些遺留而下的宗教設施各自呈現不同的現況，其中以遺產之姿現存於各地的情況亦可見。我

們就以大日本帝國為例，不論是當時來自於統治目的或隨著移民造就的神社，根據歷史學者中島三千男的研究統計¹，在全亞洲至少曾存在 1600 座的外國神社。這些當時因各種因素設置的神社有多少遺留至今，遺跡物件在今日的遺產、文化財風潮下，何以採取具文化價值的宗教遺產之姿再登場。另一方面，這些遺產遺跡也成為具戰爭、殖民等負面價值的遺產，其現存狀態及呈現的遺產價值為何？針對前述的關心與問題意識，本稿選擇了戰前日本第一處海外統治地，戰前長達半世紀統治時光的臺灣為考察對象，從當時伴隨日本統治傳入的宗教傳統中最具日本色彩及統治象徵的神道為題，探討當時以神道宗教設施之姿建立於全臺的神社現今存在的樣態。

回顧本研究涉及議題至今的研究成果及動向，顯示針對海外神社的歷史研究從戰前的小笠原省三《海外の神社：並にブラジル在住同胞の教育と宗教》（神道評論社：2005〔複製版〕）、近藤喜博《海外神社の史的研究》（明世堂：1943），至戰後初期成書的《海外神社史上》（海外神社史編纂會：1953）這本全面描述戰前移植日本列島之外的各神社發展、實態的體系之作，相關的歷史性考察對戰前海外神社的發展有達相當的探討。這方面的研究在 2000 年前後，又掀起一股熱潮，佐藤弘毅於《神社本 教 研究所紀要》連載刊登了〈戰前の海外神社一覽〉數篇，而中島三千男數十年來所投入的海外神社調查研究，更持續發表有〈「海外神社」研究序說〉（《歷史評論》602，2000）及（《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觀変容》神奈川大学評論ブックレット：2013）等結合田野調查及史料分析，展開環境、景觀的神社遺跡研究。另一方面，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同成

社：1994），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朝鮮神宮・台湾神社と祭神》（弘文堂：2004）、青井哲人《植民地神社と帝国日本》（吉川弘文館：2005）等數本體系性研究專著的問世，從殖民宗教政策、宗教學、建築學角度持續深化該領域的考察。在以上列舉的成果之外，不論在臺灣或日本，各種針對神社遺跡或戰前神道發展的論考也日趨豐富，但是多數關心多集中於殖民宗教政策、遺跡現況報導等面向，至於透過宗教遺跡現今的存在實態及遺產、資產面向的考察仍不多見。

基於以上對相關研究著重的現況取向，本研究將聚焦於今日現存於臺灣的日本神社遺跡作為文化資產、觀光資源被保護、利用、詮釋的現況發展，全文扣除前言與結語，共由三個章節構成，第二章節從臺灣歷史發展下的宗教受容談起，並針對現存於臺灣各地的日本宗教遺產進行說明。第三章節將概說成為文化資產保護下的日本神社遺跡，具體選擇鹿野神社社殿重建、臺中神社大鳥居復原等幾處具代表性的神社遺跡近來發展情形，說明日本神道宗教遺跡在臺灣社會呈現的多樣性。第四章延續前章節的討論，以金瓜石神社近年來從基礎研究調查到透過祭典活動、遺跡修復、文化展示等面向所進行的系統性文化資產保護工作為例，探討金瓜石神社從單純的一座戰前的宗教遺跡如何加以資產化，進而綜觀從金瓜石神社至鹿野神社、臺中神社大鳥居等宗教遺跡發展所反映的舊帝國日本宗教遺產的現況及其存在意義。

貳、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宗教發展

回顧臺灣的發展歷史，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相繼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鄭氏政權及清帝國的統治，

可謂首度大規模的外來宗教移植期，當然在此也無法避免需提起在鄭氏王國、清帝國取得臺灣島治權之前，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勢力帶來的西方宗教，只不過比起鄭氏與清兩大漢人政權伴隨著軍事統治而帶來的移民，那些十六世紀前後傳來的西方宗教有關的遺跡至今已不再。至於前述的鄭氏、清政權及伴隨移民帶來的各種政經、人文、宗教等活動遺跡則成為一九世紀日本領臺之前，首度全面性落腳於臺灣全島的文化遺跡，其中有至今仍持續傳承發展的媽祖信仰、真武信仰、王爺信仰、觀音信仰、有應公崇拜等宗教信仰傳統，還可見寺廟建築、祭典廟會等有形無形的文化展現，可謂初期漢人政權帝國擴張下帶給臺灣的宗教文化資產。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大日本帝國伴隨馬關條約簽訂開始領有臺灣，這是日本首度的海外殖民並統治異民族，日本帝國隨著治權的落實、人群流動、商業交流、宗教傳布等對臺灣社會產生全面的影響，其中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伴隨著日本對臺統治的腳步，首度大規模移植海外。不論是神社神道、國家神道、教派神道或是民俗信仰 神道宗教在日本統治期間，不僅其宗教設施神社被廣泛建造於全臺各地，神道宗教之祭神、信仰、祭典等蘊含於神道下的信仰文化亦隨之散布落腳於臺。一方面，日本佛教也同步傳入臺灣，追溯日本佛教入臺的濫觴，可從西元 1895 年（明治 28）9 月曹洞宗於臺北龍山寺設立布教所談起。日本佛教在日本治臺的五十餘年間，共計有曹洞宗、淨土宗、日蓮宗、真言宗高野派、天臺宗、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淨土真宗大谷派、臨濟宗妙心寺派等共計 8 宗 14 派來臺布教。各個宗派在臺灣各地設置了寺院、布教所及各種相關設施，配合著各種布教手法在這塊新領土上深根發展，也與臺灣既有的明清佛教相互間產生影響。

¹ 關於海外神社的研究，以中島三千男近幾十年來展開的大日本帝國舊統治地區調查研究最具代表，譬如：〈海外神社〉研究序，歷史評論 602，1993 年；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觀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3 年；海外神社跡地から見た景觀の持続と変容。神奈川：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2014 年（編著）等著作內容相當豐富具參考價值。

相較之下，神道（Shinto）為日本的固有宗教，是融合了大和民族精神文化及常民生活慣習所發展而成的宗教信仰。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受日本列島風土、環境、文化、情緒的滋潤，與外來宗教、文化元素的影響，孕育出屬於日本的民族宗教。一方面，神道信仰獨特的發展環境及信仰特徵，也與日本人的生活習慣、思考模式、價值觀感構成密不可分的关系。這種與日本文化相容共生的非制式性宗教信仰，呈現與同屬大乘佛教的明清佛教、日本佛教的發展極為不同。神道從日本本土傳入臺灣的途徑及在臺的傳播，其一多半指向殖民統治者為政治目的所展開的宗教移植，這類型可謂國家神道體制下的神社創建，從西元 1901 年落成鎮座的臺灣總鎮守官幣大社臺灣神社，或是更早於西元 1897 年改制舊延平郡王祠的開山神社被視為濫觴。日後特別從西元 1935 年前後起，隨著臺灣總督府主導的民風作興運動、皇民化運動推波助瀾之下，發動所謂一街庄一社的神社設立風潮。數年間臺灣全島各地紛紛設立神社，肩負起各地區皇民化及視為精神生活教化等要津²。在此暫且不論如天理教、金光教、黑住教等近世展開的教派神道，那些基於來臺日人的信仰需求而設立，比起國家神道重視的政治、思想支配、教化等功能，這些由移居臺灣的民間日本人自主創設的神社，不僅宗教設施興建多基於現實信仰所需，其供奉的祭神與宗教祭典模式、營運機制也與當時統治當局扶植的神社明顯不同。但是，事過境遷不論是當時受政府支撐具崇高社格的神社，或是基於信仰需求而建立的社祠，歷經統治者更替及戰後數度的神社建築處理政策，今日這些宗教遺跡呈現不同形式分散於各地。

關於戰後臺灣對於日本神社建築所採取的處理政策，可說伴隨著政治情勢、社會環境變化而

來。第一階段是以西元 1946 年 1 月行政長官公署所頒布的《行政院訓令各縣市政府拆毀日偽及漢奸建築塔碑等紀念物》為依據，從接收日本在臺資產中，選擇紀念性遺跡、神社等建築物來改造為社會救濟、公益用途的設施，譬如將嘉義神社的遺址改造作為醫院之用。第二階段在西元 1952 年，臺灣省政府下令撤除廢止日式石燈籠及日本年號，至於西元 1954 年臺灣省政府再公告在不妨礙景觀及廢物利用為前提下，允許鳥居、石燈籠等建築物的改造使用。這項政策受到臺日斷交的影響，導致在西元 1974 年再面臨一項巨大轉折。內政部發布《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記念遺跡要點》，命令各縣市政府針對現存的神社進行全面性的撤除。在這樣的情況下，造成全臺各地神社建築受到空前大規模的破壞（林承緯 2014b：21-22）。當然，在此環境下仍有部分的神社遺跡因各種原因倖存下來，譬如幾乎完整保留當年社殿原貌的舊桃園神社，或是留下相對完整神社基礎輪廓的金瓜石神社、通宵神社、建功神社、嘉義神社、圓山水神社、望鄉神社等，這是神社遺跡在前述 1950 至 1980 年間，被當時政府當局視為帝國殖民遺跡加以破壞改裝之下的結果³。只不過，



【圖 1】保留完整桃園神社社殿結構的桃園忠烈祠⁴

² 關對於日治時期神道宗教政策及皇民化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各種宗教措施的說明，可參照：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的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年一書有較為完整的討論。

³ 關於神社建築於戰後所受的改建破壞，可參照林承緯、黃士娟《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之規劃研究案結案報告書》新北：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以及中島三千男等，2014。海外神社跡地から見た景の持続と変容。神奈川：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等書籍。

⁴ 本論所用的圖版皆為筆者及研究助理實地調查所得，為求篇章簡潔，以下將不再一一註記說明。

近來一股從歷史、文化甚至藝術角度來看待這些伴隨前朝遺跡的觀念日趨成熟，以宗教遺產之姿成為臺灣這塊土地珍貴的文化資產而加以保護甚至再利用的日本神社遺跡，這個觀念近幾十年不僅日趨普及，對宗教遺產的運用手法也隨著各遺跡屬性有不同，甚至還出現嘗試復原神社建築原貌的發展，下一章將選擇幾項具代表性的事例進行說明。

參、文化資產保護下的神社遺跡與神社重建的動向

臺灣自 1982 年施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起，開始有系統藉由法律來保護具文化、藝術、歷史價值的文化資產，特別是對於有形、物質性的資產維護投入相當大的力量。至今具文化資產身分的神社遺跡約有二十餘項⁵，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桃園忠烈祠（舊桃園神社）為桃園市定古蹟，前身為開山神社的延平郡王祠登錄為臺南市歷史建築，金瓜石神社則是新北市定古蹟。除了這幾座現存狀態完整的神社遺跡，其他已登錄／指定為文化資產的日本神社遺跡，多數僅剩下鳥居、石燈籠、犬、基礎及部分附屬建築等。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新北市登錄歷史建築「猴硐神社鳥居」、新竹市縣定古蹟「新竹神社殘蹟與附屬建築」、嘉義縣定古蹟「原嘉義神社暨附屬館所」、花蓮縣登錄歷史建築「豐田神社參道與遺構（碧蓮寺之周邊設施）」、新北市定古蹟「海山神社殘跡」、臺中市登錄歷史建築「鰲峰山營區及原清水神社遺構」、雲林縣歷史建築「北港神社社務所暨齋館及附屬」等。除了神社遺跡被視為保護主體的文化資產之外，像是圓山水神社就隨著主設施草山水道一併被納入臺北市定古蹟「草山水道附屬設施」之下進行保護。

從以上列舉已納入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措施的遺跡名稱中，清楚可知這些神社設施的現況多呈現非完整荒廢的殘跡狀態。當然除了這些具文資身分的神社遺跡，全臺各地還殘存了著為數眾多的日本神道相關遺構，這些遺跡早已隨著戰後來自官方或民間加諸的破壞改建，喪失了呈現過去曾是神社的完整特徵。不過卻也有幾處的神社遺跡，隨著近年臺灣政治情勢趨緩、社會環境的開放，地方鄉土熱潮掀起的一股日治人文熱助長下，造就出如臺北市的紀州庵、西本願寺廣場，或是臺南市的林百貨、鶯料理等，全臺各地不少日治建築再利用的文化設施成為了當地著名觀光景點。甚至還各地還出現不少營造日本風格及主打日治鄉愁的文化商業設施，這種社會氛圍及效應也反映於年年增加的訪日人數⁶。筆者認為在這種時空背景下，臺灣社會此時若出現日本神社遺跡重建復原的情況，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這樣的社會趨勢在近來便反映於臺南林百貨的修復，當時臺南市政府不僅修復了林百貨主體建築，也一併維修並部分復原頂樓的稻荷社遺跡。目前林百貨經營業者於神社遺跡旁設置賣場，其中便販售以稻荷神使狐狸為圖案設計的明信片，同時將這座神社遺跡作為林百貨重要的觀光景點。或像



【圖 2】位於林百貨頂樓的稻荷社遺跡

⁵ 文化資產指定登錄情形查詢自臺灣文化資產局網頁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ultureAssetsAction.do?method=doEnterTotal&menuId=310&siteId=101> 瀏覽時間 2014.02.11 22:30

⁶ 2014 年訪日人數高達 282 萬人次，相較十年前 (2004) 當時的 108 萬人次，成長達二倍多，若再對照臺灣現今的人口 2345 萬 (2015 年 5 月)，顯示 2014 一整年即有 12% 臺灣民眾前往日本。資料引自日本政府觀光局 (JNTO) 統計資料 http://www.jnto.go.jp/jpn/reference/tourism_data/visitor_trends/ 查詢時間 2014.02.14 22:10

是臺灣博物館營運的前臺灣總督府南門工場的展示中，即製作一座神社模型來說明往昔曾坐落在廠區的久須乃木社歷史。除此之外，2014 年由臺東縣鹿野鄉公所提案，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規劃重建的鹿野鄉社，可說是臺灣第一座日本神社重建之例，雖然在帛琉、塞班、天寧島等幾處過去曾是日本委任統治地的南洋群島早以出現日本神社重建復原的例子⁷，不過在實質施行殖民統治達半世紀的臺灣，這種深具日本象徵的神社復建仍涉及政治敏感，的確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這座著手重建的日本神社位於臺東縣鹿野鄉龍田村，該地戰前為臺東製糖株式會社於大正 4 年（西元 1915 年）私營的日本人移民村，設置於這座名為鹿野村的「鹿野村社」（近來多被通稱為鹿野神社或龍田神社）⁸，鎮座於大正 10 年 6 月 15 日，祭神為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四神，例祭日為 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1939）。該神社並無社格，屬於鹿野村這座移民村私設的神道信仰設施，



【圖 3】林百貨明信片上可見稻荷神使狐狸的圖案

也因此神社在格局及設施上都相當有限。這座神社隨著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原本的社殿、鳥居等神社物件遭受變賣破壞殆盡，僅剩的社殿基座上被改建為中國風格的涼亭，只不過如此對照全臺各地可謂平凡常見的日本神社遺跡，於戰後所受的處置卻在 2014 年出現大轉折。這一座坐落於東臺灣論規模及當年社格皆非相當具代表性的鹿野神社遺跡，將重建恢復當年的神社樣貌。而且這項重建工程獲得地方官民雙方的同意，並由當地也就是鹿野鄉公所主導運作。2014 年 5 月 26 日，臺灣國內重要媒體如中央社、自由時報、聯合報、公共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分別以：「龍田日本移民村 神社重修⁹」、「保留基壇 鹿野神社原貌復建¹⁰」、「拆除僅存日本神社基座？鹿野鄉親反對¹¹」、「不拆除基座，90 年鹿野神社將修復¹²」、「臺東日式神社重建 擬除舊基座惹議¹³」標題接連報導，顯示這項位於臺灣東部偏鄉一處日治時期小型神社遺跡重建所受的矚目。

在此我們藉由以上列舉的媒體報導的標題用字，初步可見該事件被討論的並非日本統治時期設置的神社是否重建與否，而是將重建視為理所當然的處理，甚至要求這項重建盡可能需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避免破壞目前僅存的基座結構。《中央社》報導是這樣描述這項神社重建的緣起：「日本政府規劃的移民村－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保留一個日本神社基座，縱管處將重新整修，成為台灣最完整的神社和鳥居。（中略）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斥資新臺幣 5000 萬元，重新修建鹿野神社和鳥居，特別邀請日本建築師，重現傳統神社

和鳥居，地方希望以修復替代重建，且不要破壞原基座。」藉此報導明確指出這項日本神社重建工作事由縱管處，也就是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¹⁴這個政府機構主導，不僅編列了高達 5000 萬的重建經費，並為了重建傳統神社與鳥居，還專程遴聘了日本建築師，目標打造「臺灣最完整的神社和鳥居」。關於採取的修復施工做法，這篇報導也寫到：「縱管處今天表示，修復工程將保留原有基座，只針對破損部分進行補強手法，外觀以水泥砂漿噴砂處理。鳥居工程部分，委由日本專門繪製神社的專業設計師設計，完全依照日本神社傳統平面模式選址。縱管處強調，龍田的鹿野神社修復後，將是台灣最完整的神社，成為地方的觀光景點。」藉此可知，還原當年神社樣貌，保留遺留原件，並透過原物保有的意義與迫近日本傳統的作法，可說是這項前所未有的日本神社重建的施工原則。

肆、從金瓜石神社遺址保護、祭典再現、神社展示到鹿野神社與臺中神社大鳥居重建的發展

延續上一章的議題，如此容易與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記憶連結進而引發政治效應、歷史理解的神社重建工程，在當時臺灣社會輿論與神社重建地區居民有何反應，我們就以立場偏向保守的媒體《聯合報》報導為例。「花東縱管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今年開始修復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內具 90 年歷史的「鹿野神社」基臺，計畫依當年神社原有樣貌，重新打造鳥居等硬體，重現當年風采，屆時將是台灣第一座進行歷史建築整體復原的日式神社。¹⁵」透

過這段對神社重建的新聞背景報導描述，凸顯縱使對日本統治理解，政治立場不同的媒體趨向，也相當平實的描述報導這項新聞的來龍去脈。除此之外，《聯合報》也描述了這項工程期間各方參與者的爭論：「傳聞施工廠商有意拆除舊基壇，硬體要全數重建，引發當地民眾反彈。居民昨天邀集縱管處、鄉公所人員座談；縱管處否認傳言，指絕不會拆除基壇，還會以高標準施工，村民才稍加放心。（中略）施工顧問公司張姓代表表示，這將是台灣第 1 個日式神社復原工程計畫，是指標性案件，盼恢復當年神社風采外，也連結村內的老建築、日式宿舍等，形成帶狀的觀光歷史空間，且不只是景點，也是居民群聚空間。¹⁶」報導顯示這項神社重建過程的溝通及衍生的爭議主要在於前述的舊基座保留與否，在縱管處、鄉公所、施工單位及當地居民的座談溝通下，似乎凝聚出保留原基座並採高標準恢復重建的原則。這點在施工單位所述的：「台灣第 1 個日式神社復原工程計畫，是指標性案件」，以及「盼恢復當年神社風采」的認知與原則下，可知這項日本神社重建工作，縱管處與地方政府主要著眼於觀光效益，至於在地居民對神社重建的期許則可歸納有地方歷史記憶塑造及觀光帶來的區域繁榮等理解。



【圖 4】鹿野神社重建全貌

⁷ 關於戰後南洋群島出現的幾座日本神社重建，可參照：中島三千男，2013。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觀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一書。
⁸ 這座位於日本人移民村內的神道宗教設施，戰前正確的社名為「鹿野村社」，只不過諸如村社、社等用稱與神社的區別，並非臺灣社會廣泛可理解的概念，因此，多數人們稱之為鹿野神社，或因位於龍田村之故而稱為龍田神社。本文為統一用詞，即一併統稱為「鹿野神社」。

⁹ 龍田日本移民村 神社重修，中央社。2014 年 5 月 26 日。

¹⁰ 保留基壇 鹿野神社原貌復建，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27 日。

¹¹ 拆除僅存日本神社基座？鹿野鄉親反對，客家電視臺。2014 年 5 月 26 日。

¹² 不拆除基座，90 年鹿野神社將修復，聯合報。2014 年 5 月 27 日 B2 版。

¹³ 臺東日式神社重建 擬除舊基座惹議，公共電視臺。2014 年 5 月 26 日。

¹⁴ 「花東縱谷風景管理處」為臺灣第五個國家風景區，政府在 1996 年在維護自然生態與珍貴觀光資源的前提下，行政院於 1997 年核定花東縱谷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為東部地區繼 1986 年成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外，另一重要的國家級重要風景名勝主管政府機關。

¹⁵ 不拆除基座，90 年鹿野神社將修復，聯合報。2014 年 5 月 27 日 B2 版。

¹⁶ 不拆除基座，90 年鹿野神社將修復，聯合報。2014 年 5 月 27 日 B2 版。

戰前神社重建的情形在戰後七十年的臺灣，的確是一項經常被提起卻未曾實踐的事情，譬如瑞芳的金瓜石神社、蘇澳的金刀比羅神社、花蓮的鳳林神社等戰前神社遺跡，近年各地居民接連出現重建的聲音，甚至本論撰寫當下，臺中市政府也計畫將臺中神社大鳥居重新豎立修復，作為臺中的地標。政府預計投入 200 萬重建鳥居，以「共同許願讓鳥居站起來！重拾城市光榮感！」為活動口號。臺中市市長親自指出：「市府從原臺中公園臺中神社鳥居的修復為起點，透過歷史的調查，找出鳥居原樣貌及原址，重建鳥居當年風貌，讓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與歷史意涵的鳥居可以重新站立在臺中公園，最快預計今年底修復完成，希望成為臺中人心目中永遠的地標。¹⁷」這項日本統治期宗教遺跡重建修復之例，相較於前者的鹿野神社，雖然僅是一座鳥居的復原重組，不過由地方行政首長起頭，立足於歷史文化甚至城市光榮感這種歷史詮釋，表現出臺灣面對戰前日本宗教遺跡不同於中國、韓國等國家的理解認知。至於 2014 年 5 月底展開的鹿野神社重建工作，在 2015 年 2 月已完成木造社殿與鳥居的建造，兩者皆從日本訂做再來臺進行組裝，顯示「重現傳統神社與鳥居」如此重建恢復的施工原則。這是神社重建計畫預定於 2015 年 3 月底完工，縱管處長洪東濤與立委劉耀豪昨實地會勘後，說明該神社完工後會成為開放空間，讓民眾參觀，但不會供奉神明。（自由時報：2015）。透過這幾起臺灣各地正熱烈展開的日本宗教遺跡再建之例，再為檢視省思過去被視為殖民統治、皇民化、軍國主義、敵國優越遺物等負面的戰前神道宗教設施，在現今臺灣社會中所呈現的不同樣貌。而日本神社遺跡在臺灣的現狀，也從戰後至今的保留與否的價值論述，進到重建回復當年樣貌的處理模式。除此之外，日本宗教遺跡在臺灣社會呈現的情況，除了硬體的保存或是修復重建，透過活動展演甚至是針對

其祭典文化、神社信仰辦理展覽的做法動向，位於北臺灣的金瓜石神社近年在這方面具重要的指標意義。



【圖 5】鹿野神社新社殿與舊基座

金瓜石聚落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從日治時期開始便應豐富的金銅礦產而盛極一時，當時甚至享有東北亞第一金山的美譽。今日的金瓜石礦業開採已走入歷史，轉型成為國內重要的觀光景點，也因當地保有的豐富人文景觀與自然環境，於西元 2003 年在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推動下，成為第一批正式公布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¹⁸。「水金九礦業遺址完整地保存產業遺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吸引經濟、歷史、地質、植物等學者的研究興趣，區內的人文資源—聚落景觀、歷史空間、民俗祭典（包含太子賓館、日式房舍建築群、黃金神社、勸濟堂）；自然景觀—地形資源與水景資源；礦業地景—礦區、坑口、礦業運輸動線與冶煉設施等文化資產，生動地記錄一部臺灣礦業發展史，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近年來，由於礦業停採後，聚落生活的空間紋理漸漸遭到破壞，部分聚落景觀，如當年日籍高級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因年久失修而部份遭到拆除、礦工聚落也因改建而出現與景觀不協調的西式建築；曾是金瓜石聚落脈動的纜車道、索道，因停工拆除而難以重現，面對社會與經濟的快

速發展，金瓜石聚落正處於脆弱狀態，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五項。¹⁹」在這段入選說明中，可見民俗祭典、黃金神社都被納入為詮釋水金九礦業遺址文化價值重要的一環。其中，特別是被民間俗稱為黃金神社的金瓜石神社，可說是反映金瓜石聚落礦業興衰起伏與居民心靈寄託最重要的宗教設施。

金瓜石神社又稱為黃金神社、山神社、金瓜石山神社，創設於西元 1898 年（明治 31）3 月 2 日，供奉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祭神。這座神社雖然產權屬於台灣電力公司，其周邊實際產權也多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不過肩負起金瓜石在地資源的維護、管理的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亦將金瓜石神社遺址納入該博物館營運範疇下，藉此呈現完整的金瓜石地區礦業文化及人文景緻。西元 2012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活化金瓜石神社，委託筆者針對這座日治時期的神社遺跡進行規畫研究及示範執行。這項針對金瓜石神社遺跡的日本神社再利用計畫，共分成兩大方面展開，其一為歷史背景及信仰文化的基礎研究，主要針對金瓜石神社的創建背景、祭神信仰源頭（特別是與日本島根縣金屋子神社的分靈關係）、神社信仰與在地產業的關聯，以及當年所傳承的祭典內涵進行調查掌握。另一面向的研究著眼於神社建築與座落位置的議題，特別是金瓜石第一代、第二代神社



【圖 6】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計畫

建築興建情形、遷移與否，同時也將各時期神社構建、設施展開系統性的紀錄還原²⁰。在對這座神社遺跡完成內涵有充分掌握之下，預計不同於過去臺灣常見的遺跡保存的有形文化財保存做法，而計畫透過動態的祭典文化的重現來發揮宗教遺產具有的價值。

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計畫擬定初衷，在於思考如何透過有形性建築體、遺跡構成的場域氛圍，搭配文化動態性活動來還原再造，呈現出當時金瓜石神社當時的風景印象，提出了「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名稱。其目的大致可歸納如下：（1）開啟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動態型展示的新方向，（2）透過有形具象的古蹟來呈現當時礦山居民的宗教信仰生活，（3）重現活絡在地歷史記憶等取向。基於這三項預期目的，該計畫嘗試針對金瓜石神社當年祭典盛況的模擬重現，藉此來提升市定古蹟金瓜石神社具有的文化內涵。金瓜石神社現今樣貌並非完整，雖然今日於神社遺跡中仍留下一座大鳥居及部分的石燈籠、社殿殘件，不過神社主體建築及犬、手水舍等設施已殘缺散逸。縱然如此，由於神社座落一帶的地景環境仍保留部分日本神社的氛圍，加上那些殘留的神社遺跡仍具備文化價值。也因此，透過史料文獻、訪談調查為依據來還原的以奉納樽神輿再現為核心的祭典活動，



【圖 7】「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重現祭典樽神輿巡行

¹⁷ 臺中公園鳥居重新站起來 林市長：進一步重拾城市光榮感，臺中市政府新聞稿。2015 年 3 月 6 日。

¹⁸ 2003 年公布名稱為「金瓜石聚落」，不過在為求潛力點名稱更能符合世界遺產推動之標準，2011 年經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決議將「金瓜石聚落」改稱為「水金九礦業遺址」。

¹⁹ 關於世界遺產潛力點「水金九礦業遺址」的入選說明，參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世界遺產潛力點網頁資料。http://tw.hoch.gov.tw/taiwan/intro.aspx?id=6&lang=zh_tw#ad-image-0 瀏覽時間 2014.02.19 20:30

²⁰ 關於金瓜石神社綜合性的考察研究及再利用計畫實施過程，可直接參閱：林承緯《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新北：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4，以及林承緯、黃士娟《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之規劃研究案結案報告書》新北：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

構成這場以無形文化為主軸的文化資產再利用活動。

首度「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於 2012 年夏天舉行，辦理之後獲得廣泛的社會好評回響，除了當時吸引數百名民眾前往參與，地區居民多數也給予正面評價及認同。館方將這項日本宗教設施的活動列為該館往後例行博物館重點社會推廣活動，同時也製作了日式御守作為該館特色商品，並且構思進一步以展示呈現的可能。這樣的計畫歷經半年的籌畫期，在黃金博物館執行展示規劃，筆者參與協助下，於 2014 年 7 月起辦理「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特展」²¹。這項展示如展覽名稱所見，包含了現存的金瓜石神社的宗教遺跡及該神社過去傳承的山神祭，展示內容除了透過老照片、看板文字，從臺灣的神社創建歷程、金瓜石神社的歷史沿革、山神祭祭典內容專題進行展示，同時依照調查研究成果製作 1:50 縮小比例的金瓜石神社模型。並且也從民間收藏家借展臺中神社兒童神轎、新竹神社祭典繪卷等實際的戰前文物，藉此補足缺乏相關歷史性物件的展示內容。這個展覽活動不儘是該館首度以神社為展示主題，也是臺灣第一次公立博物館策劃日本神社與祭典的展覽，展示企劃初期在如何能兼顧臺灣社會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



【圖 8】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展

確有所顧慮。然後，另一方面是如何將臺灣人似曾相似的日本神道信仰與祭典文化藉由展示呈現，也是這個展覽面臨的挑戰。

因此，透過圖像表現出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祭神形象，以神社模型製作來呈現今日已不再的神社全貌，還有針對過去曾參與金瓜石神社祭典的耆老進行訪談並拍攝成影片於展場播放等，都是這場展覽採取的展示手法。將近四個月的展期吸引了眾多參觀者，同時臺灣各傳媒也報導了這項展覽。倒是所有的報導多朝向正面有意義的文化歷史展示來理解，還有原先顧慮的政治效應與意識型態的難局也沒出現。在這項特展結束不久，以金瓜石神社的研究為基礎，撰寫而成的《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專書也隨之出版問世，成為貫穿金瓜石神社近年從基礎研究、遺跡保護、祭典再現、展覽推廣階段下的結晶，可說是臺灣至今針對日本宗教遺跡進行最多元的應用發展。當然從剛落幕的金瓜石神社這場博物館展示及專書出版，到仍在發展中的鹿野神社重建與臺中神社大鳥居修復等，臺灣社會對於戰前日本宗教遺跡的理解與應用上，呈現出不同於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及南洋群島也曾受日本統治且殘留著日本宗教遺跡的國家。



【圖 9】金瓜石神社模型 (1:50)

²¹ 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展期為 2014 年 7 月 4 日至 10 月 26 日

伍、結語

以上本文首先著眼戰前傳承於臺灣各地的日本宗教傳統的發展至戰後消逝的歷程，接著針對今日仍存於臺灣各地的戰前宗教遺跡現況及存在價值進行說明，最終選擇了近年接連出現的日本神社重建、大鳥居修復，以及透過研究調查、祭典規劃、博物館展示、專書出版等方式，將戰前宗教遺產視為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而加以活用的現象展開考察。神社可謂日本神道甚至日本人重要的表徵，往往對外國人而言，神社代表的是日本，坐落於帝國日本舊統治的神社，往往被視為烙印著日本統治記憶的象徵物件。在朝鮮半島、中國大陸、樺太島、南洋諸島等舊日本殖民地、委任統治地或佔領地，當日本戰敗，帝國日本體制崩解之下，神社迅速地走入歷史，坐落於日本海外的數千座神社喪失原有的功能，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在強烈地政治因素驅使下，絕大多數的神社受立即性摧毀破壞，為得是清除屬於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一方面，像在南洋諸島則出現極為不同的情況，中島三千男《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觀変容》指出現今出現重建的六座海外神社全部集中於南洋諸島。然後，本文透過近來田野調查獲知 2014 年在臺灣東部出現日本神社重建的情形，除此之外，雖然戰後臺灣也因政治因素至少有兩度大規模破壞日本宗教設施，特別是神社的



【圖 10】神道神職為鎮安堂飛虎將軍神輿開光

部分。不過在各地仍留下可觀的遺跡。這些過去的宗教遺跡在臺灣進入文化資產保存時代，一開始雖顯得格外緩慢，日後一步步成為法律保護的對象，歷史、文化、藝術等特徵，讓這些狀態並非完整如原貌的神社遺跡，成為政府指定登錄下的古蹟、歷史建築。

雖然臺灣國內面對戰前的議題，仍常出現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其中日本神社被視為壓抑臺灣人宗教傳統及皇民化運動的因素，只不過這樣的認知在這一、二十年來，學術界及臺灣社會對於戰前的理解已趨成熟，對戰前統治的褒貶已相當的理性。這點也反映於戰前宗教遺產紛紛成為文化資產保護對象的情況。在此氣氛之下，近來分別出現日本神官來臺主持日本人神明（鎮安堂飛虎將軍）神轎開光儀式²²與辦理神輿巡行，而在東臺灣除了本論提到的鹿野神社重建，台肥花蓮廠「海洋深層水園區」也針對廠區內一處神日本神社遺跡展開重建工程，在 2015 年 6 月完成了社殿重建及鳥居、參道的重建，日後將做為園區的景點之一。然而這波的神社重建浪潮似乎尚未停歇，2015 年 7 月在南臺灣地處偏遠的牡丹鄉山區，一座曾經坐落在原住民部落的神道社祠遺跡，不僅神社社殿即將重建復原，更預計以三日時間在現地舉行日本神道完整的



【圖 11】鎮安堂飛虎將軍神輿巡行遶境

²² 位在臺南以供奉戰前日本軍人為主神的鎮安堂飛虎將軍廟，獲得日本人奉納一頂仿日本風格的神轎，並於 2015 年 3 月 10 日分別由臺南當地法師及遶道而來的日本神道神職人員，分別採用臺灣民間信仰與日本神道的儀式為神輿開光與潔淨。2015 年 4 月 30 日這座神轎在約 200 位來自日本的參與者簇擁抬行下，參與當地大廟海尾朝皇宮往府城四安境下大道良皇宮謁祖進香遶境，一行人浩浩蕩蕩繞行臺南市街。

神社鎮座儀式²³，這可說是戰後以外在臺灣前所未見的神道宗教儀式重現。在此先不論這些接連而來的神社重建甚至神道宗教儀式舉行產生的後續效應為何，至少這些的發展動向已足以反映戰前遺留在臺灣的日本宗教遺產不僅止於具象形體的保存，在戰後七十年後的臺灣，這些議題持續受世人矚目。像在鹿野神社重建上可見國家風景區及地方政府強調的是觀光景點塑造，而尚在發展中的臺中神社大鳥居復原是否基於「重拾城市光榮感！」這條宣示口號，相當值得矚目。金瓜石神社的部分從基礎研究、遺跡保護到祭典再現、展覽推廣等進路，彷彿傳達的是日本神社遺跡於當地的存在意義，文化資產與觀光資源是否能兩立，取徑可否兼顧並進。再回到現實社會對戰前臺灣理解與歷史記憶的形塑，相信本論提出的幾項發展趨勢及事蹟，以提供一道值得重新思索檢討的方向。

參考文獻

- 小笠原省三，1953。海外神道史上卷。東京：海外神社史編纂會。
- 小笠原省三，2005 復刻版。海外の神社 並にブラジル在住同胞の教育と宗教。東京：ゆまに書房。
- 辻子実，2003。侵略神社—靖国思想を考えるために。東京：新幹社。
- 中島三千男，1993。台湾の神社跡を訪ねて，歴史と民俗，10:74-123。
- 中島三千男，2000。〈海外神社〉研究序説，歴史評論，602: 45-63。
- 中島三千男，2013。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観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中島三千男等，2014。海外神社跡地から見た景観の持続と変容。神奈川：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
- 井上順孝，1985。海を渡った日本宗教—移民社会の内の外。東京：弘文堂。
- 青井哲人，2005。植民地神社と帝国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
- 佐藤弘毅，1997。戦前の海外神社一覧 -1- 樺太・千島・台湾・南洋，神社本庁教学研究所紀要，2: 145-213。
- 佐藤弘毅，1998。戦前の海外神社一覧 (2) 朝鮮・関東州・満州国・中华民国，神社本庁教学研究所紀要，3:133-220。
- 佐藤弘毅，1999。資料紹介戦前の海外神社資産一覧《宗教団体の在外資産調査》の報告書をもとに，神社本庁教学研究所紀要，4:133-192。
- 近藤喜博，一九九六復刻版。海外神社の史的研究。東京：大空社。

23 這座預計重建於牡丹鄉高士村的高士神社，是在佐藤健一這位具神職身分的日人奔走下，實現這座神社遺跡的重建工作，2015 年 7 月 19 日起，於野牡丹神社公園內將以三日時間舉行：地鎮祭、上棟祭、大殿祭、河原大祓、火切祭、招魂之儀、鎮座祭、御鎮座奉祝祭、神樂奉納等神式祭儀。關於高士神社鎮座祭儀及鎮安堂飛虎將軍日式神轎等近年出現的日本神社重建與神道儀式的專題考察，為避免模糊本論核心議題的討論，日後將另闢專文進行說明。

- 林承緯，2012。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林承緯，2013。臺北稻荷神社之創建、發展及其祭典活動，臺灣學研究，15:35-65。
- 林承緯，2014a。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新北市：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 林承緯，2014b。戰後臺灣における神社建築の理政策と金瓜石神社の再利用計画について，非文字資料研究，32。
- 林承緯、黃士娟，2012。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規畫計畫成果報告。新北市：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 菅浩二，2004。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朝鮮神宮・台湾神社と祭神。東京：吉川弘文館。
- 陳玲蓉，1992。日據時期神道統御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臺北：自立晚報社。
- 稻宮康人，2012。帝国後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観変容—稲宮康人写真展図録。神奈川：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
- 新田美子，1997。大連神社史—ある海外神社の社史，東京：おうふう。
- 嵯峨井建，1998。満州の神社興亡史。東京：芙蓉書房出版。
- 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編，1933。臺灣社寺宗教要覽（臺北州ノ巻）。臺北：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
-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1939。台湾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昭和 14 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 蔡錦堂，1994。日本帝国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
- 藺田稔、橋本政宣編，2004。神道史大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

- 龍田日本移民村 神社重修，中央社電子版。2014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405260213-1.aspx>
（瀏覽日期：2014/02/24）
- 保留基壇 鹿野神社原貌復建，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27 日。
- 龍田日治神社復原 完工後將開放，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14 日。
- 拆除僅存日本神社基座？鹿野鄉親反對，客家電視台。2014 年 5 月 26 日。
<http://web.pts.org.tw/hakka/news/detail.php?id=110667>（瀏覽日期：2014/02/27）
- 不拆除基座，90 年鹿野神社將修復，聯合報。2014 年 5 月 27 日（B2 版）。
- 神社沒供神 村民：缺精神信仰，聯合報。2014b 年 5 月 27 日（B2 版）。
- 台東日式神社重建 擬除舊基座惹議，公共電視台。2014 年 5 月 26 日。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9939>
（瀏覽日期：2014/02/27）
- 臺中公園鳥居重新站起來 林市長：進一步重拾城市光榮感，臺中市政府新聞稿。2015 年 3 月 6 日。
- 復刻百年建築 台肥花蓮廠內神社展新貌，中央社電子版。2015 年 6 月 26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506260295-1.aspx>
（瀏覽日期：2014/06/27）

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

A Study of Taiwan Traditional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李建緯 Chian-Wei Lee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摘要

飾品是人們裝飾自我，顯示個人對身體高度興趣的鮮明證據。它反映了社會象徵、宗教信仰、審美品味與佩戴者的身份地位。金銀之所以被製成飾品，與其材質幾項優點有關，即審美價值（光澤度）、經濟附加價值（稀有度）、不易生鏽（抗氧性）以及加工容易（延展性高）。

本文主要透過文獻、考古出土實物與傳世文物，探討臺灣金銀飾品的造形、工藝與飾身方式的發展概況與特色。臺灣金銀首飾從原本原住民具有的地方色彩，自明清漢人遷臺以後，其造形、工藝遂深受大陸地區影響；其後，20 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臺灣現代金銀首飾製作概念上，受歐美金工藝術影響，強調設計理念與大量生產，而過去以手工打製傳統金銀飾品的方式，於是逐漸式微。

整體來說，臺灣所見傳統金銀飾品使用時機，通常屬於其人生中的過渡階段，即出生、成年、結婚、死亡。這一方面可能與黃金本身的正面的、光明的意涵有關；另一方面也隱含了經濟層面的禮物交換有關，具有一種雙方互惠的契約內涵。

關鍵字：臺灣、金銀飾品、原住民、漢人、過渡階段

Abstract

Jewelry is personal adornments that people wear to decorate themselves, a distinct evidence showing people's high interest on their body. Jewelry reflects social symbol, religious belief, aesthetic taste and a wearer's social status. The reason that gold and silver is made into jewelry is associated with some advantages of the material itself: aesthetic value (gloss), economic added value (rarity), resistance to rust (oxidation-resistance) and feasibility to process (malleability).

This stud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cultural relics and unearthed antiquities aims to discuss shape, workmanship and evolution of profiles and features of jewelry decoration. Taiwan aboriginal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had originally their own aboriginal style. However,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fter the immigration of Han people into Taiwan, the art of shape and workmanship received deep influ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from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the art of traditional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became less important afterwards 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jewelry art, more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design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Therefore handiwork jewelry gradually fell into decline.

In conclusion, the opportunities to use traditional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in Taiwan are usually during some transitional stage of life, such as birth, coming of age, marriage and death. This aspect may be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and brightness of the nature of gold;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lies gift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imension and with regards to a certain nature of engagement.

Keywords: Taiwan,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aboriginals, Han people, transitional stage

壹、前言

就臺灣當代金工飾品創作風格來說，其主要遵循著歐美的工藝美術傳統；¹ 其實臺灣本土自鐵器時代以後，便已開啟了貴金屬製品的使用。然而，目前對臺灣早期貴金屬飾品的認識與研究，仍相當有限。一方面是因為相關材料稀少；另一方面，飾身研究這類非關國家道德或歷史大事的瑣事，常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因此一直以來總難以進入學術研究範疇中。

近年來隨著學界對身體研究的關注，金銀首飾的使用情形與其發展，也逐漸受到重視。「首飾」一詞，漢劉熙的《釋名》提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貳副，兼用眾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而曹植的《洛神賦》亦有「戴金翠之首飾，墜明珠以輝軀。」的說法。可見到了漢、六朝以後，首飾作為女性飾物名稱，已基本確立。

有關中國金銀飾品的研究，一類是從通史角度出發，如懷特（Julia M. White）以時間發展為論述主軸，上始於石器時代下終於宋元明，簡述飾物在整個中國的發展歷程，如流行款式、裝飾題材、文化交流等。² 邦克（Emma Bunker）專以金屬首飾為對象，指出不同金屬在各時代的發展情形，以

及金屬飾品的加工技術。³ 而關善明、孫機《中國古代金飾》（2003），則更完整地以通史的方式介紹中國歷代黃金飾品造形，討論的材料主要是關善明的個人收藏，並佐以中國考古出土材料為說明。⁴ 此外，坊間也有為數不少通論性的金銀首飾相關出版品。⁵

另一類則是從斷代或專題方式切入，例如，日人加藤繁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 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1927）的〈唐宋時代之金銀器飾〉，透過唐宋時期的文獻，列出了唐代金銀飾品種類；⁶ 而 Hugh Scott 於《中國藝術的黃金時代：活潑的唐朝》（1982）第五章〈珠寶首飾〉亦觸及此一議題。⁷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2000），係研究明代金銀飾品的重要參考文獻。⁸ 黃正建的〈唐代的耳環—兼論天王戴耳環問題〉（2008）一文，提出唐人不戴耳環的觀察；⁹ 揚之水除了針對宋以後女性首飾，進行名稱上的考證，¹⁰ 其《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2010、2011）三卷中的前二卷，更詳考宋、元、明代首飾的類形、樣式、紋飾設計與製作工藝，使用如南宋末年《百寶總珍集》等文獻，為首飾分類正名，廣而深入地陳述金銀首飾材料，並援引其它出土文物、壁畫與繪畫材料中對應之圖像為對照。¹¹ 李建緯的〈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種類、性別與功能

- 1 李建緯，〈從物質觀、技術與飾身角度詮釋傳統與當代金工之傳承與變革〉，《藝術學報》第 7 卷第 2 期，2011 年 10 月，頁 31-59。
- 2 Julia M.White, “Development of Objects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China,”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Art Museum, 1994. pp.13-29; Julia M.White, “Images and Imagination in Personal Ornament,” in *Adornment for the Body and Soul: Ancient Chinese Ornaments From The Mengdixuan Collection*,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65-76.
- 3 Emma Bunker,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pp.31-54.
- 4 關善明、孫機，《中國古代金飾》，香港：沐文堂美術出版社，2003 年。
- 5 黃能馥、蘇婷婷，《珠翠光華：中國首飾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王苗，《珠光翠影》（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年 2 月）。
- 6 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 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之第六章〈唐宋時代之金銀器飾〉（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日文發表於 1927 年），頁 336-364。
- 7 Hugh Scott, “chapter V Jewelry”, in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t, The Lively T'ang Dynasty*,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82, pp.37-77.
- 8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
- 9 黃正建，〈唐代的耳環—兼論天王戴耳環問題〉，《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3 輯（2008 年），頁 1-5。
- 10 揚之水，〈玉釵頭上鳳〉，《古詩文名物新證（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頁 136-159；揚之水，〈明代頭面〉，《古詩文名物新證（一）》，頁 160-205。
- 11 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4 月）；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8 月）。

為中心》（2013）一文，則企圖釐清唐代金銀飾品種類、裝飾部位與性別的差異性，並進一步闡述唐代金銀飾品在整個中國金銀飾品發展中轉變的關鍵地位，以及女性在金銀首飾使用上的優勢。¹² 杭海的《妝匣遺珍》（2014）以民間收藏品為主，整理了明清時代至民國初年的女性銀首飾，將之分成髮飾、耳飾、項飾、手鐲、戒指、佩飾共六類。¹³ 其它著作甚繁，本文此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揚之水於 2014 年發表的《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三冊，係在《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的基礎上，將對象集中為六朝至清代的金銀首飾，透過考古、文獻和圖像的交叉比對，各章節分述金銀飾品朝代與種類，可謂是目前研究中國金銀首飾最完整的專書。¹⁴ 其中的第二、三冊，大量討論了明清首飾的實物、圖像與文獻資料，可做為本文討論臺灣漢人金銀飾品發展的參考。

相關於中國大陸的金銀首飾豐碩的研究成果，臺灣在金銀首飾的討論則相對較少。《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1972）一書，內容提及漢人金銀飾品種類，主要是髮飾（笄、簪、花簪），另還有腳鐲、金項鍊、金手鐲、戒指、耳環等。在使用時機上，有嬰兒周歲、小兒祈求成長配戴「綰綰」、女性結笄之禮、訂婚、壽辰以及喪禮。¹⁵ 其內容並非研究性質，而是一種民間習俗的紀錄彙編。

其後，簡榮聰先生編著的《臺灣銀器藝術》（1987）上下二冊，大量使用第一手材料，圖片 700 多幅，文字達 20 餘萬字。其中第三章的〈銀

器之種類與藝術探討欣賞〉，有相當大篇幅銀質首飾的報導，係目前對於臺灣金銀首飾研究最全面的一本專著。¹⁶ 也是後文在早期漢人金銀首飾討論的參考資料之一。

另經濟部工業局所編《黃金與飾品》（1994），其中的〈中國與臺灣之黃金發展史〉一章，對於文獻中提到的臺灣產金、以及日人對於九份、金瓜石的開礦、黃金等利用，有不小篇幅的報導。但關於金銀飾品部分，則寥寥數筆帶過。¹⁷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案》（1995）〈配飾〉一節，發表了收藏於北投文物館內的 10 件清末至民初銀飾。她指出，清代女性飾品如耳環、項鍊、手環與腳環等，雖有純金，但由於經常鎔鑄再造，故以銀器為大宗；此外該文也提到兒童配戴金銀鎖片、或未成年配戴脖子上的「綰綰」等類的宗教類飾品。¹⁸

另陳光祖、李坤修的〈臺灣地區出土金器芻論〉（2007），係目前關於史前原住民黃金製品的分布與種類分析，較為完整的研究專論。該文整理出臺灣發現金器的遺址，有十三行文化（臺北十三行遺址、宜蘭利澤簡遺址、花蓮崇德遺址）、三和文化（臺東大麻里舊香蘭遺址、卑南鄉巴蘭遺址）、靜埔文化（臺東縣長濱鄉八桑安遺址）、蘭嶼甕棺葬文化（蘭嶼 Imourud 聚落）、以及淇武蘭舊社遺存。¹⁹ 該文除了討論臺灣黃金遺存來自菲律賓巴丹地區「黃金文化」的可能性與疑點，分析相關遺址黃金原料的來源問題，並概略討論了臺灣地區出土金器的工藝技術。

在蘇世雄的〈傳統金工及飾品文物之美〉（2011）一文，作者根據高雄市立美術館藏一批約 200 件的傳統漢人飾品，透過其材質、工藝技法、圖案種類等內容，進行分類與描述。²⁰

綜觀上述目前臺灣金銀飾品研究，主要集中在漢人的物件上；然而，就臺灣金銀飾品的整體發展概況來看，在大陸金銀細金工藝傳入臺灣之前，本地就已存在不少貴金屬飾品，如臺東白桑安遺址、臺北八里十三行文化等史前遺址，以及稍晚的各族的原住民配件等。是故，臺灣金銀飾品的發展，應分成兩個時段：前段屬於南島語族的金屬器時代；後段則屬漢人為主的歷史時代。隨著漢人自閩粵移居臺灣，人口數量增加，臺灣原住民的金屬工藝僅一小部分繼續發展（如蘭嶼），而漢人貴金屬工藝，則後來居上。

貳、原住民金銀首飾

（一）文獻資料

1. 外國文獻

過去認為臺灣黃金的開採始於日據時代。其實，從文獻來看，臺灣早期住民很久以前便已開採黃金，並製作成黃金製品。在 1582 年西班牙船長 Francisco Gualle 乘船自墨西哥出發，經菲律賓抵達媽港，同年 7 月 24 日由該港出發，通過臺灣附近，其航海日記引述華人說法，指出：

華人告余謂，該島稱 Islands Lequeos（Gualle 所指的 Islands Lequeos，實為臺灣東北角的雞籠），其地有金礦，島民時駕小舟攜野鹿 Venesoenen 皮革及小粒金，或極精細之工藝品運往中國海岸交易。²¹

從前文可知，16 世紀的西班牙人已認識到臺灣東北角有黃金，並有工藝品輸往大陸沿海地區。其後，1632 年（明崇禎 5 年）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艾斯基維（Jacinte Esquivel）所寫的《臺灣島備忘錄》也曾提到臺灣黃金的產地位於：「蛤仔難（今天的宜蘭），其地有聖大加利納灣（Santa Catarina）及聖羅倫佐村（San Lorenzo，今天的蘇澳港）。……該地有產量豐富之金銀礦…。」

另一方面，荷據時代的《巴達維亞城日誌》也見以下記載：

Formosa 南端的瑯嶠（Langkiau 即今天的臺灣恆春）十六村，附近聞有金礦……1638 年 1 月 22 日，上尉 Johan van Linga 率士兵一百三十人，乘戎克船三艘經由瑯嶠，赴東海岸卑南方面探查金礦。…2 月 1 日到達卑南附近，當時發現該地有力之人名為 Magal 者，戴著用金箔裝飾的帽，經銳意調查出處結果，始知該地以北三日半之行程地方，有名為 Danau（疑為花蓮溪）之河流，其旁散集 Ranginas Radangs（今花蓮吉野鄉）等許多傳有產金的部落，而 Danau 河附近之里漏村落住民藏有薄金片，金產自河中。²²

此外，《巴達維亞城日記》中也曾提及原住民在東部山地發掘到水晶器、純銅與金銅合金項圈各一件，如西元 1642 年 5 月的日記載：「上列盛土的盒子中，另有他卡布魯山（Tacabul）附近土番於掘山野時，可能多見之山地，水晶數個，及項環二個（金與銅混合者，及純銅者）。」²³

²⁰ 蘇世雄，〈傳統金工及飾品文物之美〉，《璀璨銀彩：館藏金工及飾品文物賞析》（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1 年），頁 9-30。

²¹ 轉引自中村孝志原著，賴永祥、王瑞徵譯，〈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臺灣文獻》第 7 卷第 12 期（1956 年 6 月），頁 526。

²² 中村孝志原著，賴永祥、王瑞徵譯，〈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頁 531。

²³ 陳光祖，〈從歷史文獻看臺灣早期的「考古」發現〉，《田野考古》第 6 卷（1998 年 12 月），頁 41。

¹² 李建緯，〈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性別與裝飾功能為中心〉，《史物論壇》第 16 期（2013 年 6 月），頁 33-79。

¹³ 杭海，《妝匣遺珍》（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 9 月）。

¹⁴ 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年 9 月）。

¹⁵ 張炳南監修，《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 年），頁 6、20、60。

¹⁶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 年 11 月），頁 51-188。

¹⁷ 經濟部工業局編，《黃金與飾品》（臺北：經濟部工業局，1994 年），頁 12-19。

¹⁸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案》（臺北：南天出版社，1995 年），頁 266-269。

¹⁹ 陳光祖、李坤修，〈臺灣地區出土金器芻論〉，《「2006 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7 年 5 月 5 日~6 日）。

另外，美國大使達飛聲 James W. Davidson 從 1895 年到 1903 年在臺期間採訪的資料，匯整撰成《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一書，其中的第 30 章〈臺灣的住民〉提到，鄒族有將銅或其他發光的金屬掛在胸前的現象；而卑南族戰士也有將銀元當成裝飾品實例。²⁴ 此外，達飛聲還發現，當他前往蘭嶼調查時，當地男性極為喜愛金屬手鐲，並以身上所有物件和他交換銀幣，原因是他們極為喜愛 pe lok（銀）和金。²⁵ 後文將進一步討論。

2. 中文文獻

關於漢人遷臺以前原住民的金銀飾品概況，尚能透過漢人文獻描述一窺其貌。宋・趙汝適《諸蕃志》有「流求國，……土人問以所產黃蠟、**土金**」的記載；元・汪大淵《島夷志略》也提到琉求是「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琉黃、黃蠟、鹿豹鹿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由於汪大淵指出其地係「自彭湖望之甚近」，故被認為可能是臺灣。不過，上述二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文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仍存在不小的爭議。

臺灣隸屬清廷以後，郁永河在康熙 36 年《番境補遺》提到：「哆囉滿產**金**，**淘金**出與雲南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於巨甕中。客至每開甕自炫，不知所用。進歲始有攜至雞籠、淡水易布者。」文中的「哆囉滿」為西班牙（Turboan）與荷蘭文（Turnmoan）音譯，為今日花蓮縣新城鄉立霧溪入海處一帶。²⁶ 從前文來看，清廷據臺初期，已認識到臺灣東北部產金的事實。

前文所舉為漢人文獻中關於臺灣金礦的記載，至於原住民配戴金銀飾品的資料，在臺灣地方志中的記載頗多，按其年代先後順序，分列如下。最早是蔣毓英於康熙 24 年（1685）所編《臺灣府志》卷五〈風俗志〉中提到，（諸番）「每歲春月，社必一舉，男、婦傾社而出，亦有以**銀銅**做飾，繡綺為衣者。」²⁷ 由前文可知，原住民不分男、女，皆配戴有銀、銅質物件，作為身體裝飾。

高拱乾於康熙 33 年（1694）所纂輯的《臺灣府志》〈風土志〉，也提到「男女皆跣足裸體，……各穿耳孔，其大可容象子，以木環貫其中。…**手帶鐲，或銅、或鐵所鑄**，多者至數十雙；且有以鳥翅垂於肩、以貝懸於象而相誇為美觀者。」²⁸ 不過，前文並未提到銀質。

諸羅知縣周鍾瑄主修，於康熙 56 年（1717）完成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中，「番俗」一條提到：「男女喜以瑪瑙珠及各色贗珠、文具、螺殼、**銀牌**、紅毛劍錢為飾；各貫而加諸項，累累若瓔珞。……約釧於手。男子煉鐵為之，曰劍脊、曰煙殼；以多為美，疊臂彎之上下，色光如銀。婦女，束洋鐲、銅起花鐲，或穿瑪瑙為之。」²⁹ 文中所提的對象是中部原住民。和高文不同的是，除了鐲子，還提到了銀牌一類的形制。

《鳳山縣志》（康熙 58 年）指出：（番俗）「女髮稍長，斷其半，以草束之；齒用生草染黑，穿耳孔，以木環貫其中，手帶鐲，或銅、或鐵。（中略）臂環，以鐵為之。形如煙殼聯串二三十環，銚亮如銀，束至手彎以為飾。」³⁰ 這裡指的是南部的原住民。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康熙 61 年，1722）〈北路諸羅番八〉，針對沙轆、大肚、牛罵等社的習俗，有記載：「婚姻曰三問。男女先私通投契，男以**銀錫**約指贈女為定，曰貓六。」

乾隆 6 年（1741）由劉良璧所纂輯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對原住民裝飾有更清楚的描述：「男女皆跣足裸體，……兩腕好帶**銅鐵釧**，多者至十數雙，且有以雉尾及鳥羽插髻垂肩，尤嗜瑪瑙珠及各色贗珠、文貝懸於項，累累若瓔絡，相誇為美觀者，複製二鐵卷如小荷葉，名曰『薩鼓宜』；繫於左右手腕，腕上先帶三稜鐵鐲，走送公文時，兩物相擊撞，叮噹遠聞，瞬息間已十數里。亦有製一鐵卷，中加一鐵舌，繫於腰間，搖步徐行，鏘若和鸞；騁足疾走，則周身上下金鐵齊鳴。」³¹ 從前文來看，並未提到金、銀一類材質。

道光年間出版的《彰化縣志》卷九〈風俗志〉「番俗」一條，有載「小錢為飾，各貫而加諸項，累累若瓔絡。……女裝之侈，數倍於男，惟跣足無首飾耳。**約釧於手**，男子煉鐵為之，曰劍脊，曰煙殼，以多為美，疊臂彎之上下，色光如銀。婦女束洋鐲、銅起花鐲或穿瑪瑙為之。」³² 以及「男女喜以瑪瑙及各色贗珠、文貝、螺殼、**銀牌**，紅毛，半線以上多揉樹皮為裙，白如苧。」³³ 從內容來看，其說法與《諸羅縣志》大同小異。而二本志書的描寫對象，應是中部平埔族。

道光 17 年（1837）《噶瑪蘭志略》卷十四〈雜識志〉：「內山土番以金絲纏繞、橫斜作魚，懸之項頸間，名曰『金鯉魚』，以相誇耀。番割用銅絲仿製，與番貿易，臥贗易真。出金之地，終莫得而

詳也。」透過考證，噶瑪蘭族的西勢社番以金絲透過纒絲、纏繞方式，製作魚形的掛飾，懸於脖子上；而黃金的來源，卻無法得知。³⁴ 根據陳光祖、李坤修研究，金鯉魚應是淇武蘭遺址舊社文化發掘出來的金箔片、金線一類的文物。³⁵

光緒 25 年的《安平獻雜記》提到（番婦）「不插簪珥，不掛耳鉤。如是出外宴飲，則用銀鍊為髮辮，每條重須五、六兩，纏於頭前，左右各插銀簪一枝，並佩掛耳鉤一對（所掛耳鉤與粵婦一律）（中略）其所最重者，銀手鐲、玉戒指。有錢之家，番婦所掛手鐲，每個有重至三十兩左右者。其戒指輒系馬鞍式白玉所製，更銀製耳扒、齒托，或五樣、或三樣不等。每一串連鍊，長約二尺餘，掛於胸前。」³⁶ 文中所稱四社番，即平埔族。由於他們在清晚期和閩粵漢人雜居，風俗受其影響，故也開始出現插銀簪、戴銀鐲與玉戒指等漢俗，但以銀鍊為髮辮或戴連鍊之俗，則屬其特色。

透過上述文獻，臺灣藏有黃金的事實很早以前便被認識——不論是外國或漢人文獻中，皆提及原住民使用金銀飾品的事實。其中，外國文獻多半關注黃金與黃金飾品；而漢人文獻中，除了蔣毓英、黃叔瓚、周璽、或《安平縣雜記》提及「銀」飾品，其他漢人文獻中原住民金屬飾品中，多以銅、鐵一類的材質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人文獻中對於原住民金屬飾品的描述，多是以一種旁觀角度，指出其外觀上的特殊性，或帶有一種「獵奇」的角度來觀看之。不過就上述文獻對我們瞭解早期原住民金銀首飾的種類與造形的幫助，實相當有限。因此，下一節將透過考古出土材料或傳世實物，說明漢人移民臺灣之前原住民的金銀飾品造形與種類。

²⁴ James W. Davidson（達飛聲）著、陳正三譯，《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出版，2014 年，初版 1903），頁 678。

²⁵ James W. Davidson（達飛聲）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頁 689。

²⁶ 詹素娟撰，「哆囉滿」一條，引自「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nrch.cca.gov.tw/twpedia>，點閱日期：2015 年 7 月 2 日。

²⁷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1 月），頁 61。

²⁸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1 月），頁 187。

²⁹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156。

³⁰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81、83。

³¹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102。

³² 〔清〕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3 年 6 月），頁 296。

³³ 〔清〕周璽，《彰化縣志》，頁 298。

³⁴ 李宜靜，〈論清代臺灣府諸羅縣產金傳說〉，《康寧學報》第 13 期（2011 年），頁 31。

³⁵ 陳光祖、李坤修，〈臺灣地區出土金器芻論〉，《「2006 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7 年 5 月 5 日 ~6 日），頁 4-5。

³⁶ 〔清〕未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58。

（二）實物資料

目前關於史前時期金銀飾品種類，從形態來說，有金箔、金線加工品、金箔嵌玻璃珠、銅製包金飾品……等，其功能有耳飾、手環、器表裝飾、以及功能不明者，由於陳光祖與李坤修已見專文，³⁷ 此不贅述。下文僅就其中較為完整報導、且具清晰圖像資料之遺址與原住民金銀飾品，進行簡述。

1. 臺東靜浦文化

白桑安遺址位於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白桑安社區西方 400 公尺、海拔高度約 65 至 85 公尺的海階平臺上，被認為是距今約 1500 年。在探坑中發現 2 座墓葬，其中 B1 墓葬隨葬品相當豐富，黃金箔片便是出於此墓（圖 1）。根據考古簡報判斷，墓主是一位年輕人，隨葬品除了有黃金箔片 1 件，另還有月牙形青銅項飾 1 件（圖 2）、鐵器 4 件，身體兩側有銅鈴 2 件，散佈於棺內的小琉璃珠 16230 顆（圖 3）、瑪瑙珠 32 顆。³⁸ 琉璃珠的數量相當驚人，顯現其等級很高。

根據發掘簡報，金箔片作弓形，出土時扭曲壓疊，攤平後作 V 字。兩端橫長 38 公分、中軸線最寬處 10 公分，箔片厚約 0.1-0.3 釐米，重約 2.95 公克。器面有紋路，略見有長條格狀紋。因金箔太薄，無法獨立成立，故應是附屬於木質飾物上。³⁹ 透過外形判斷，此物應是以錘鑄成片狀後，再於金片上鑿刻出圖案。這種作法顯示，製作者對於黃金的性質應相當熟悉。



【圖 1】臺東長濱文化白桑安遺址出土黃金箔飾，筆者攝於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圖 2】臺東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青銅項飾，筆者攝於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圖 3】臺東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琉璃珠，筆者攝於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³⁷ 見陳光祖、李坤修，〈臺灣地區出土金器芻論〉。

³⁸ 葉美珍，〈臺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試掘工作簡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第 1 冊，民國 82 年（1993 年），頁 30-58。

³⁹ 葉美珍，〈臺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試掘工作簡報〉，頁 35。

前文所引《巴達維亞城日記》，記錄了荷蘭人接觸到東部原住民時，當時就已發掘出金銅合金項飾。據此可推測，白桑安文化所見金箔片，很可能也是項飾的一種，但與後來的東部原住民，在文化上未必是直接繼承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兩端窄、中間寬的半月形金質片狀飾物，也見於商代至東周時期中國的北方地區。商晚期有黃河東西一帶冀、陝北地區，如商晚期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圖 4）、⁴⁰ 保德林遮峪，⁴¹ 陝西甘泉縣下寺灣鎮商墓⁴²……等；春秋晚期的北京延慶軍都山玉皇廟 M250、M151、M174 三座男性貴族墓鎮（圖 5）、⁴³ 春秋戰國之際的內蒙和林格爾新店子 M43、⁴⁴ 春秋時期的青海大通孫家寨 M42、M21 男子合葬墓、⁴⁵ 以及戰國的河北省陽原縣高牆鄉九溝村等，皆發現有作環形或半圓形素面金質飾件。



【圖 4】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金「弓形器」，商代晚期，尺寸 29.8 公分，圖版：《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器》金銀器（一），圖 4。

白桑安文化的金環飾兩端內折，外形和延慶軍都山、青海化隆卡約文化的環形金飾明顯不同，卻與山西石樓桃花莊、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基金片末端內折，頗有呼應；然而，大陸地區所見皆屬素面，而白桑安金環上的鑿刻紋，未見於大陸類似的金飾上，應屬不同的裝飾概念，在發展上也應屬於不同文化系統。

2. 臺北八里十三行文化

十三行遺址位於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聚落之所在，東北方距淡水河約 1.5 公里，西方為臺灣海峽該遺址最早是由地質學家林朝榮於 1957 年發現，1989 年因八里污水處理場即將興建於遺址上，由中研院史語所臧振華與劉益昌進行搶救發掘。金器發現有 24 件，其中圓形片狀金飾 21 件（內有腐朽物，原應是耳飾）、長方形片狀金飾 2、管形金飾 1；此外，還有銀器 1 件。⁴⁶ 從上述出土金銀飾品功能來看，係以耳飾為大宗。



【圖 5】北京延慶軍都山玉皇廟出土金環，春秋晚期，筆者於延慶博物館拍攝，2012 年 10 月。

⁴⁰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1960：7），頁 52。

⁴¹ 吳振錄，〈保德縣發現的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4），頁 62-64。

⁴² 王永剛、崔風光、李延麗，〈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3），頁 17。

⁴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 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327-332、頁 562-566、701-705。

⁴⁴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03），頁 3-14。

⁴⁵ 王國道、崔趙年，〈青海卡約文化出土的金器〉，《故宮博物院院刊》，總 109 期，（2003：5），頁 43-48。

⁴⁶ 臧振華、劉益昌，〈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年），頁 114。

3. 原住民金銀飾件

此處所稱的原住民，指的是漢人遷臺以前居住在臺灣本島上的南島語族。清領臺以後依其歸順漢人的程度，將南島語族分成「生番」與「熟番」；而日人又在清廷的分類邏輯下，將原住民族分成「高山族」（生番）與「平埔族」（熟番）。從傳世文物來看，使用貴金屬飾品的原住民，不論是高山族和平埔族，皆有發現。

和臺灣其他原住民相較，舊稱紅頭嶼的蘭嶼達悟族（舊稱雅美族）配戴大量金銀飾件，在 19 世紀末美國人與日本人的調查，便已注意（圖 6）。20 世紀以後，陳漢光、鮑克蘭（Beauclair）與施翠峰等人的研究，皆有專文探討。從種類來看，當地金銀飾品有專屬男性使用的銀帽（Sacopu）、銀兜（Buragats）；女性用的頭部飾物鉢卷、胸飾

（Purikulun 和 Rakarakts）；以及男女皆用的耳飾（Ubai）、臂飾（Puchinuken）與腕飾等。⁴⁷ 達悟族的頭飾主要是銀質頭盔，係在木架上串上一片片矩形銀片，為男性所佩戴，帽上通常有二孔作為眼睛窺視之用；胸飾類有三種，即繭形胸飾（作∞形，有金銀兩種材質）、半月形胸飾（在木片貼上金屬銀片，男性老人佩戴）與珠串胸飾（在三圈瑪瑙或玻璃珠外圍再加上）；臂飾係以穿繩將銀掛在手腕手臂上，已婚者佩戴；腕飾則飾以繭形金片或銀片掛在手上，男女皆戴。⁴⁸

施翠峰指出，銀帽使用時機為新造的獨木舟下水儀式（船祭）時所戴（圖 7），主要是驅魔儀式上使用。不過，除了男性成年男子，甚至小男孩也使用，其使用時機並不限於新船入水儀式。⁴⁹



【圖 6】穿戴銀飾片的達悟族男子，圖版：《中研院民族學集刊》27 期，圖版 8-1。



【圖 7】達悟族銀帽，圖版：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年，頁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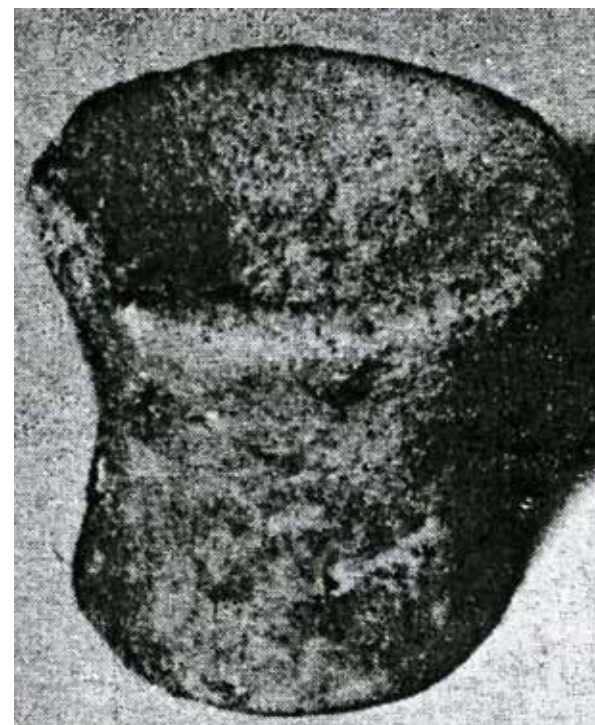
⁴⁷ 陳漢光，〈雅美族的金銀文化〉，《文獻專刊》第 5 卷第 2 期，（1954 年），頁 16；Inez De Beauclair（鮑克蘭），“Gold and Silver on Botel Tobago: The Silver Helmet of the Yami,”（蘭嶼雅美族的金銀工藝與銀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7 期（1969 年），頁 121-128。

⁴⁸ Inez De Beauclair（鮑克蘭），“Gold and Silver on Botel Tobago: The Silver Helmet of the Yami,” 頁 121-128。

⁴⁹ 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年），頁 121-123。

關於蘭嶼島上金銀原料的來源，有幾種說法：一是來自菲律賓、二是來自於當地蘭嶼、三是來自於大陸。⁵⁰ 根據鮑克蘭的調查，雖然蘭嶼島上有微量金砂，但應該是與外界交易所獲得之物，而且還發現有陶埕鍋（圖 8），因此證明當地有自行製作金銀製品的能力。⁵¹ 而施翠峰認為，達悟族擁有白銀的冶煉與製造技術，應該不超過 150 年。⁵² 但這個說法，已被蘭嶼 Imourud 聚落發現的蘭嶼甕棺葬文化打破。

除了達悟族，其他的族群如鄒族，在婦女手上經常會配戴一種向漢族商人購買的金屬手鐲、首飾與耳飾等，過去因其色白，型態較粗，而且在造形上運用扭絲、菜瓜鬚、鑿刻等漢族銀飾常見的



【圖 8】鮑克蘭於蘭嶼島上採集的埕金埕鍋，圖版：《中研院民族學集刊》27 期，圖版 4-1。

工藝，故屢屢被誤解為銀飾，⁵³ 其實應是白銅（圖 9）。位於東部地區的卑南族，對於金屬飾物的喜愛，更為明顯，不僅存有大量的白銅首飾鍊子、白銅手鐲、頭部也滿飾白銅飾品，男女皆然，其來源可能也是向漢人商販購買。⁵⁴ 甚至日治時代資料照片「臺東呂家社原住民少女舊照」，照片中，也可見頭插花簪、身戴項圈、胸佩等金屬飾品的卑南族少女。⁵⁵ 平埔族雖然傳世文物少，馬偕也曾採集到一種女用首飾，被稱為「猴頭銀棒胸飾」，⁵⁶ 顯示使用金屬飾物，並不限於高山族。比對《安平縣雜記》記載，平埔族也佩戴銀飾件，尤其是女性。

根據上述的實物材料，比對文獻如康熙 24 年《臺灣府志》的「男、婦傾社而出，亦有以銀銅做



【圖 9】施翠峰採集鄒族達邦社婦女白銅手鐲，圖版：《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頁 71。

⁵⁰ 陳漢光，〈雅美族的金銀文化〉，頁 14-15。

⁵¹ Inez De Beauclair（鮑克蘭），“Gold and Silver on Botel Tobago: The Silver Helmet of the Yami,”（蘭嶼雅美族的金銀工藝與銀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7 期（1969 年），頁 121-128。

⁵² 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頁 123。

⁵³ 李俊德編，《八卦山史蹟文物展圖錄》（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頁 107。

⁵⁴ 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頁 70、131。

⁵⁵ 見「臺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FB 粉絲頁。

⁵⁶ 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頁 139。

飾。」；康熙 33 年《臺灣府志》的「手帶鐲，或銅、或鐵所鑄，多者至數十雙。」；或乾隆 6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男女皆跣足裸體，……兩腕好帶**銅鐵釧**，多者至十數雙。」可見當時漢人見到了原住民族，其穿戴白銅等金屬製品數量甚眾，對地方志書採集者而言，印象極深。最早誤以為是銀、銅一類材質，其後已知是銅、鐵等材質。臺南三舍內遺址發現有鐵環一類的墓葬（A-B1）的陪葬品，其文化推測屬西拉雅族，⁵⁷ 可能是文獻中所描述的「兩腕好戴銅鐵釧」一類飾品。

參、漢人金銀飾品

有關漢族金銀飾品，清代素有「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為然矣」⁵⁸之說，顯示不論是漢族或滿族，清代婦女有配戴首飾的習慣。由於明清時期臺灣的漢人承襲了中國大陸的傳統，在首飾的使用上，自然不例外。整體來說，漢人女性飾品的使用的比例比男性高，而且也最重視髮飾與首飾。⁵⁹

（一）文獻資料

臺灣歷史時代以後漢人服飾雖因時、地而異，但大體上和大陸相同，女性有簪、頭針、或手鐲、腳鐲、耳環、戒指；男性則以戒指為多。從漢人遷臺開墾初期雖困苦，女性亦隨大陸之俗，通常佩帶有一簪一珥，最早見於《諸羅縣志》的「婦女過從，無肩輿，則以傘蒙其首；衣服必麗，**簪珥必飾**，貧家亦然。」⁶⁰ 文中顯示，臺灣初期雖歸清廷管轄，

但不論貧富，皆崇尚華麗，與內地風俗不同；尤其是富家千金，常在飾件上加上珠玉，價值千金。

同樣地《鳳山縣志》（康熙 58 年）對臺俗尚侈之風，也多所批評：「即廝役牧豎衣曳綺羅，雖販婦村姑粧盈珠翠，男不耕而食者有之，女不織而衣者有之。」⁶¹；《臺灣縣志》（康熙 59 年）雖未記載首飾穿戴方式，同樣也提到臺人「俗尚華侈，衣服悉用綾羅。（中略）衣必麗都，飾必華豔。」⁶²

到了乾隆年間，臺灣所見地方志書，已不再強調遷臺漢人習俗的奢侈。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 6 年）提到：「納采，簪珥綢帛，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止煩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仔。」⁶³

周璽編纂，於道光年間刊行的《彰化縣志·漢俗》云：「凡議婚，……訂盟用庚帖及**金銀釧**，名曰『文定』；……貧無力者，男家母嫂姆孀，造女家規媳，但用**銀簪**親插其髻，名曰『插髻』。…婦入婿門…拜舅姑，賜以**金銀**。」⁶⁴

《噶瑪蘭廳志》（咸豐 2 年，1852）有曰：「婚禮……無力者只送**銀簪一副**，名曰「插簪子」；蓋即納采也，及笄送聘，則用**番銀**，……小兒彌月，亦以糖品**銀釧**為賀。」⁶⁵ 以及「蘭人雖貧，男不為奴，女不為婢，家徒四壁，有男女則無坐食，婦人出門，荊**釵**裙布，亦不外假。」⁶⁶

同治年間成書的《金門縣志·雜俗》有云：「自古風氣質樸，數年來漸侈：女手足飾金銀，村婦偶出門亦須羅綺。」⁶⁷ 該書對於金門女性飾以金銀之風氣，語帶批評，但內容卻未記載嫁娶時穿戴銀飾等習俗。

由林豪編纂，光緒 19 年刊行的《澎湖廳志》曰：「如二姓允諾，行訂盟納采之禮：富者**手鐲**一雙，檢婚錢二百文；貧者**頭簪一對**或**戒指一雙**，檢婚錢一百二十文。」⁶⁸「凡生育男女，（中略）邀新外甥到家，親朋有送**銀牌手鐲**如內地者。」⁶⁹ 從文獻來看，澎湖人民對金銀飾品的重視程度，甚於其他府廳。

光緒 25 年的《安平獻雜記》提到「納采，簪珥綢帛，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止煩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子。」⁷⁰ 其說法與《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相同。

連橫的《臺灣通史》（大正 10 年）卷二十二〈風俗志〉提到「婦女首飾，多用**金銀**。**一簪一珥**，隨時而變。富家則尚**珠玉**，價值千金。纏足少艾，或以**金環**束腳，旁繫小鈴，丁冬之聲，自遠而至，月下花間，如聞環佩矣。（中略）歸清以後，悉遵清制，（中略）婚時，男子紅帽袍褂，而女子則**珠冠**霞佩，蟒襖角帶，端莊華麗，儼然明代之宮裝。」⁷¹ 結婚之際，「納采之禮，俗曰『插簪』。男家以金簪一對，繫朱絲，置於盒內，或用**銀簪**，視其貧富。（中略）納徵之禮，俗曰『完聘』。男家具婚書聘金，介以**鳳冠**、蟒襖、衣裳、繡靴、**金鐲**、珠

花及大餅、糖品之屬，送至女家。」⁷² 文中大量提到金、銀，顯示日治時代百姓的消費能力，比清代漢人更高。

由上述文獻可知，有關臺灣文獻中的金銀飾品相關記載，大多集中在民間婚嫁時機，男方必須為女方準備金銀首飾，多數清代志書也多強調該點。而這種傳統其實自宋代以降，便已存在，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嫁娶》就有「且論聘禮，富貴之家當備三金送之，則金釧、金、金帔墜者也」記載。臺灣嫁娶，貧者起碼要有銀簪二件，而富者則不限。

（二）實物資料

1. 明鄭時期

民國 42 年在臺南地區清理的幾座明鄭時期墓葬，是研究臺灣早期漢人金銀飾件極為重要的材料。臺灣發現的 36 座明墓中，26 座位於臺南市，其中出有金銀首飾的分別是洪夫人墓、黃公墓、許懷冲夫婦墓與許申墓。洪夫人墓出有銀戒指 1 枚；同樣在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的「黃公墓」，則出有銀髮簪一件（圖 10），全長 13.6 公分，簪首尖圓呈鳥首狀，兩側有圓點狀突鼓，寬 0.7 公分，重 11 克。⁷³



【圖 10】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明顯考黃公墓」銀髮簪，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⁶⁷ 〔清〕林焜熿，《金門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396。

⁶⁸ 〔清〕林豪，《澎湖廳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312。

⁶⁹ 〔清〕林豪，《澎湖廳志》，頁 314。

⁷⁰ 〔清〕未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10。

⁷¹ 〔日〕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189-191。

⁷² 〔日〕連橫，《臺灣通史》，頁 608。

⁷³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114-115。

⁵⁷ 李匡梯計畫主持，《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臺南縣政府委託，中研院史語所執行，2004 年 11 月），頁 99。

⁵⁸ 〔清〕李漁，《閒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53。

⁵⁹ 孫彥貞，《清代女性服飾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37-45。

⁶⁰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31。

⁶¹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80。

⁶²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57-59。

⁶³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93。

⁶⁴ 〔清〕周璽，《彰化縣志》，頁 280-281。

⁶⁵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頁 189-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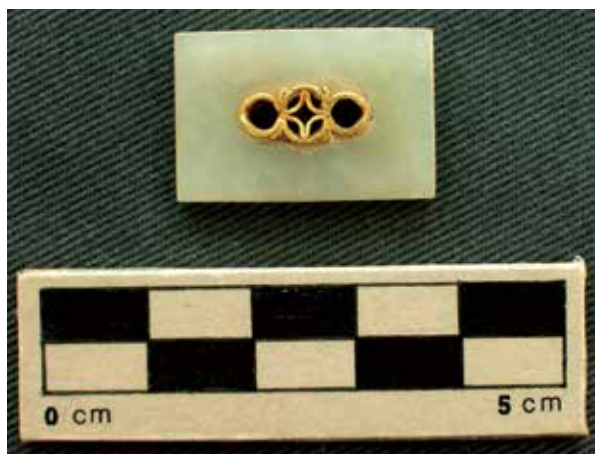
⁶⁶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191-192。

許懷沖夫婦墓發現金銀首飾最多，屬男性金銀首飾有銀（？）束髮冠1件，女性有金耳鉤1對。⁷⁴許懷沖夫婦墓的金耳鉤（分別長2.42、2.53公分），造形上為勾耳的細金線作S形，前端焊有一空心圓球之物，但二件圓球皆已凹陷（圖11）。在圓球末端皆見有有乳凸狀，原先應焊接有另一圓球；亦即是原來應是葫蘆造形之金耳墜。

在束髮冠部分（圖12），冠前後寬、左右窄，頂部有五道凸梁，冠下的正、背面各有一穿孔，係作為以簪固定頭髮之用。其位置相當特殊，與大陸



【圖11】金耳鉤一對（女性），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南明時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圖13】許申墓，出有荷包嵌金玉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所見前後窄、左右寬的束髮冠造形略有不同。冠上隱有織品痕跡，推斷可能是原來所罩的巾幘殘痕。⁷⁵

另有許申墓，出有荷包嵌金玉束（圖13），扁長方形白玉片，長2.5公分，厚0.33公分，中央的錢幣紋，係有鏤空黃金處理。這類物件，應是荷包上的束具，係作為束緊荷包帶口的一種配件。根據實際所見材料，一般臺灣清代荷包束口多屬玉質（圖14），許申墓的荷包嵌金玉束飾以黃金，顯示其消費能力更高。



【圖12】銀（？）束髮冠，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南明時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圖14】臺北市北投文物館，清代繡花荷包，束口處為白玉，圖版：筆者拍攝。

⁷⁴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1953年9月），頁490；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頁113-114。

⁷⁵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頁111。

臺灣漢人早期這種穿金戴銀的傳統其實與明清時代大陸沿海有關。明末福建《紹武府志》「簪珥必珠玉，……甚至鏤金銀以為器…」⁷⁶原本尚儉之風逐漸追求奢靡「女飾似擬於妃嬪，俳優至有黃金橫帶者。」⁷⁷考古實物亦可找到呼應的證據，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明代墓出土一對葫蘆形金耳環（圖15），與許懷沖墓的金耳勾幾乎一樣，⁷⁸而這種葫蘆形金耳環在宋代首飾中已見。根據揚之水⁷⁹的考證，這類耳環因為二珠相累，故又稱「二珠環兒」。

許懷沖墓的另一件銀質冠頂，同樣可在南京中華門外鄭府山明墓雜寶紋金包髻、南京江寧殷巷沐昌祚基金束髮冠（圖16）見到類似造形。⁸⁰這些證據皆說明了臺南市南明墓出土的金銀首飾，具有明代風格。

2. 清代

關於清代以後金銀首飾的用途，比起前一階段更廣泛。不論是婚嫁（項鍊、戒指、髮簪與頭冠）、嬰兒彌月或周歲（金銀鎖片）、為長輩祝壽、神明生辰或還願（金牌或金身），甚至是親人逝世，也都使用金銀飾品。



【圖15】明代葫蘆形金耳環，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出土，圖版：《明朝首飾冠服》科學出版社，2000，頁140。

根據簡榮聰研究，清代銀飾種類主要是作為頭飾用，其種類有：（一）冠：如女性使用的鳳冠、兒童所帶的太子冠、狀元及第帽，以及男性帽頂所用的頂戴等皆屬此類，其中鳳冠使用最多，造形也最繁複；（二）髮類飾：有單股的簪或雙股的釵，特別是以大量金銀珠翠點綴之金銀簪（圖17），插於婦女包頭上，如文獻提到「用珠網束髮，下垂珠結寶石數串，兩鬢亦以珠花、珠結、珠蝶等捧之。」⁸¹簪釵一類的造形，在清代臺灣所見首飾中最為多元（圖18），材質上搭配有翡翠、白玉、寶石、珊瑚、翠羽、珉瑯、珍珠、珊瑚等，工藝上則大量使用掐絲、鑲絲、打造、鑲花，題材有花卉、鳥蟲、吉祥圖案、神獸、人物、魚族、樓閣、佛教圖像等；除了簪釵類，其它頭飾還有步搖、梳背、扁方、帽花、花鈿等，但數量不及簪釵一類；（三）耳飾類，有耳環、耳墜等，部分造形複雜，如黃金博物館藏耳墜二對，使用了大量的鑲絲工藝（圖19左一、左二）。⁸²



【圖16】明天啟5年金束髮冠，南京江寧殷巷沐昌祚墓，圖版：《明朝首飾冠服》，頁53。

⁷⁶ 韓國藩等，萬曆《邵武府志》卷十，風俗，頁18。轉引自徐曉望主編《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61。

⁷⁷ 邢址，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風俗，頁44。轉引自徐曉望主編《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頁364。

⁷⁸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40。

⁷⁹ 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三）》，頁606。

⁸⁰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頁49-54。

⁸¹ 〔清〕葉夢珠，《閩世編》，轉引自孫彥貞，《清代女性服飾文化研究》，頁42。

⁸²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頁51-114。



【圖 17】新北市黃金博物館所見鑲金銀釵與簪，清代晚期至日治早期，圖版：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圖 18】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所見清代鑲金銀簪，下圖銀含量 82.9%、銅 12.8%，圖版：筆者拍攝。



【圖 19】新北市黃金博物館所見鑲金銀耳墜與戒指，清後期至日治時代，圖版：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除了頭飾，另還有頸部裝飾的（四）項飾：有項鍊（圖 24）、項圈、胸佩（圖 20）等；（五）腰部裝飾的金銀腰帶、腰佩（圖 22）、香墜子等，上述配件佩繫在腰間，也具有緩步作用，行走發出聲音；還有手部裝飾的（六）釧、環、鐲等（圖 21、23）；以及（七）手指裝飾的戒指（圖 19 右一）、指甲套等；（八）腳部裝飾，如腳環等；（九）其他類，如鈕釦等。⁸³ 整體來說，這些銀飾品的種類、造形或紋飾，皆屬於中國大陸傳統。

透過 XRF 金屬成分檢測，⁸⁴ 以萬和宮文物館藏銀飾為例，成分中銀含量相當不一致，有從 93%（圖 22）、83%（圖 18 下、圖 23）、65%（圖

20）、57%（圖 20）、或其它施測的 3 成，甚至有不合任何銀成分者（圖 21），顯見清代到日治時代銀飾的銀含量並無一定標準，甚至有以銅代銀的現象。

部份銀飾也有結合西方銀幣之實例，例如臺中萬和宮文物館所見的填珐瑯蝴蝶形銀項圈（圖 24），在鍊間垂掛的 10 件小飾片中，上方 6 件左右對稱之圓形飾件，實為西方錢幣（番銀），其它則為葉形飾片。這種銀鍊上串掛錢幣的作用，係臺灣民間為祈求孩童能順利長大之習俗。下方垂掛的蝴蝶形垂飾經成分檢測，其銀含量為 57.5%、銅 41.2%；銀幣的銀含量較高，達 85.6%、銅為 13.6%。



【圖 20】麒麟送子鑲金銀胸佩（牌飾），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銀含量 65.2%、銅 18.2%，其他金屬含量 16.2%，筆者拍攝。



【圖 21】填燒珐瑯鑲金扣環手鐲，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銅含量 50.6%、銀 25.5、鎳 23.8%，筆者拍攝。



【圖 22】銀腰佩，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本體銀含量 93%、銅 6.3%，筆者拍攝。



【圖 23】鑲金手鐲，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銀含量 82.6%、銅 11.35%，筆者拍攝。

⁸³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頁 51-188。

⁸⁴ 本文所列各件文物成份檢測分析，採用 α 6500- 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Alloy Plus，檢測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18 日。

填珐瑯蝴蝶形銀項圈上的錢幣正面為側面人頭像，周圍寫「EDWARD VII KING & EMPEROR」，字體中央挖孔以串接銀鍊（圖 24 右）；背面中央寫「5」，周圍寫「STRAITS SETTLEMENTS • FIVE CENTS 1910」。透過其西元年款可知，銀幣頭像應為英國國王愛德華 7 世；另一枚則落 1920 之西元年款。透過上述的銀幣可知，填珐瑯蝴蝶形銀項圈之造形雖屬清代常見者，但其年代應為日治時代。



【圖 24】填珐瑯蝴蝶形銀項圈，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日治時代，筆者拍攝。



【圖 25】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有銅質鑲金鳳冠，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⁸⁵ [清]徐珂，《清稗類抄》第 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196。

⁸⁶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府城登錄文物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期末報告書》，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辦理，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09 年 1 月，頁 92-93。

在上述的清代金銀飾品中，最複雜的莫過於鳳冠，主要使用於結婚時，平日不用。清代徐珂在其《清稗類抄》指出「無論品官士庶，其子弟結婚時，新婦必用鳳冠霞帔，已表示其為妻而非為妾也。」⁸⁵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有銅質鑲金鳳冠一件（圖 25），器長 30 公分，寬 30 公分，重 173 克，器身主體為圓弧形帽框，框內有鏤空之卷草紋，並加以點翠。帽框正面鑲有三開間之塔閣，兩側為飛鳳、仙人童子等題材。原物定為明鄭永曆年間，由於和清代婦女首飾常見之鑲絲點翠鑲珠工藝、點翠等技法呼應，應是清代文物。⁸⁶值得注意的是，鳳冠上有「彩鳳」二字方款，應為作坊名稱。

至於清代臺中林家傳世的「五品以上命婦鑲金鳳冠」（圖 26）高 36 公分，寬 32 公分，在鳳冠上以鳳凰為主體，塔牌鑲有「聖旨」二字，鳳冠周邊環視銀花，並有「奉天誥命」四字圓牌。無獨有偶地，林家同樣收藏一件新娘鑲金鳳冠（圖 27），高 24 公分、寬 30 公分，製作不及前者精細，但中央也見有「皇恩」二字牌。⁸⁷

這類鳳冠和中國大陸所見明清鳳冠一脈相承。北京定陵出土的明萬曆孝端與孝靖兩位皇后四頂鳳冠，冠上分別有 12 龍 9 鳳、9 龍 9 鳳、6 龍 3 鳳



【圖 26】臺中林家所藏舞品命婦鑲金鳳冠，圖版：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上，頁 53。



【圖 27】臺中林家新娘鑲金鳳冠，圖版：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上，頁 53。



【圖 28】明代晚期孝端皇后鳳冠，明定陵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筆者拍攝。



【圖 29】清初期「奉天誥命」金鳳冠（南京博物院），江蘇豐縣沙河果園李衛墓出土，筆者拍攝。

⁸⁷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上，頁 53-54。

除了實物，臺灣清代的金銀飾品圖像也見於臺灣民間的祖先畫像或寺廟彩繪中的婦女形象。筆者於彰化大村鄉貢旗村賴環翠堂與武魁祠採集到的 8 幅祖先畫像，其中 4 幅女性畫分別是 14 世何坤貞畫像（圖 30）、第 15 世鄧慈惠畫像（圖 31）、第 16 世劉嗣音畫像（圖 32）與第 17 世蕭忍畫像（圖 33）。透過大村賴氏祖先畫像題贊與族譜可知，四幅畫作年代分別是嘉慶末年、同治 8 年（1869）、清末以及大正 12 年（1923）。



【圖 30】14 世何坤貞畫像（嘉慶末年），耳飾改繪，原為耳墜。筆者拍攝。



【圖 32】16 世劉嗣音畫像（清末），筆者拍攝。

14 世何坤貞畫像，頭戴 3 鳳金冠，鳳冠上方中央為一樓閣造形之頂簪，鳳冠左右兩端簪上鳳紋金步搖，戴有金耳飾；15 世鄧慈惠畫像，頭戴金質鳳冠，冠之中央為冠上有文字，中央為「奉天」，由右至左書有「誥命安人」，鳳冠左右兩端有步搖簪，雙耳佩戴金質耳墜；16 世劉嗣音畫像，頭戴金質五鳳冠，鳳冠上綴有紅色繡球，可能受到戲服的影響。而中央為一樓閣造形之頂簪，鳳冠左右兩端有錢幣紋的金步搖，雙耳佩戴金質耳環；17 世蕭忍畫像頭冠表現手法，與劉嗣音幾無二致，雙耳也佩戴金質耳環。



【圖 31】15 世鄧慈惠畫像（同治 8 年），筆者拍攝。



【圖 33】17 世蕭忍畫像（大正 12 年），筆者拍攝。

上述四幅畫像的鳳冠與首飾造形，代表了清代中期至日治時代，漢人對其女子在正式禮儀上應有穿著打扮的想像，其中的鳳冠造形，與江蘇豐縣李衛墓出土者相似；至於頭部兩側的步搖簪，與霧峰林家所藏五品命婦鑲金鳳冠以流蘇裝飾的手法，略有不同。其他民間常見的女性祖先畫像首飾，大約也有相似的配件，顯示金銀首飾不只是身體外表配件，更是正規場合與社會位階的表徵。

新竹新竹市長和宮門口彩繪宮娥形象（圖 34），頭戴步搖簪、鳳形女冠、冠前有金頭箍，腰間有明式腰帶。步搖簪插在宮女頭部兩側，各為單股串珠，下接一似玉璜構件，其下再分成三股，末端則有小圓珠，色白似白玉或珍珠一類寶



【圖 34】新竹市長和宮門口彩繪宮娥形象，頭戴步搖簪、鳳冠，筆者拍攝。

石。其形象並非滿族女子的首飾，係漢族女性裝飾傳統，且應是延續自明清時代婦女的傳統。⁸⁸

在彰化大村祖先畫像或門口彩繪宮娥中步搖簪，筆者於北京故宮珍寶館展示的「銀鍍金串珍珠流蘇」見到類似實物（圖 35），可見步搖在清代也稱為流蘇。而長和宮宮娥圖像中的白色，可能是仿珍珠材質的一種表現。

另外，針對清代文獻中屢次提到「納采，簪珥網帛（中略）送銀簪二」等說法，顯示清代應當遺存大量的銀飾品；然而，透過清代漢人墓葬的金屬飾品出土實際情形來說，如臺南水交社墓葬、⁸⁹雲林嘉義的古笨港遺址⁹⁰，似乎仍是銅質飾品佔多數。



【圖 35】北京故宮珍寶館展示清代「銀鍍金串珍珠流蘇」，筆者拍攝。

⁸⁸ 孫機，〈明代的束髮冠、笄髻與頭面〉，《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二版），頁 303-333。

⁸⁹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09 年 11 月。

⁹⁰ 何傳坤、劉克竑，〈雲林縣及嘉義北港溪古笨港遺址「崩缺溪」地點搶救考古調查及評估計畫〉，行政院文建會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2003 年 5 月。

3. 日治時代以後

日治時代初期，不論工藝或造形，金銀細工係承襲晚清作法，故種類與形態基本上和清代並無太大差異（圖 36、37）。值得注意的是，日人在明治 30 年代對臺灣的一份經濟調查資料《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中，⁹¹ 透露出金銀飾品的研究訊息：明治 34 年（1901）8 月，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從安平與廈門間的運貨收費表中，有提及到「珠玉及金銀細貨」的收費標準；同樣地，明治 35 年（1902）2 月，香港三井物產會社從安平與香港間的運貨收費表中，也提及到「珠玉及金銀細貨」收費標準（千分之六）。⁹² 上述的事實反映安平、廈門與香港間，有金銀飾品交易的事實，也說明大陸金銀飾品進入臺灣，安平是個重要的集中點。

根據日人的調查，將當時所見的臺灣社會分成上等（一年生計費 5,000 日圓以上）、中等（一年生計費 1,200 日圓以上）與下等（數百元至百餘元不等）。上等社會女性結婚所使用的金銀裝飾品等相關費用，高達 400 日圓以上；中等社會則約為

百圓；下等社會因貧窮，則未使用。其配戴種類，上等社會中的男性有黃金印文戒指、金銀錶、金錶鍊或鑲金錶鍊；女性則佩戴黃金髮飾（金簪）、耳飾（帶珠耳鈎）、手環（一對）、指環、腳環、項鍊等。上述各種金銀飾件，價位往往動輒 3、400 日圓。中等社會男性基本不配戴金銀飾件，女性有金戒指、耳環與簪，銀手環，其價格和上等社會差異很大，如金戒指價 13 圓、金耳環一對 16 圓、銀手環 8 圓等。至於一般商家或下等社會，則無消費金銀飾品的能力。⁹³

到了日治時代後期，在首飾製作上逐漸標準化。比方說，開始出現一些產品目錄，有各類首飾的設計圖，可提供匠師設計靈感的參考樣稿，如黃金博物館內所藏的打金簿即是。種類上如簪、釵、鳳冠一類已退出飾品的舞臺，而以項鍊墜子、耳環、戒指為主流；其設計概念也逐漸擺脫了清代常見的圖像，並以抽象幾何紋或捲葉花卉一類的西洋風格為主，常搭配有寶石。⁹⁴ 日治時代晚期因太平洋戰爭，金屬物資缺乏且受到控管，故金銀飾品發展有短暫的中斷。



【圖 36】日治時代銀鑲金手鐲，圖版：《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



【圖 37】日治時代鳳首鑲翠銀鑲金耳環，圖版：《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

⁹¹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東京：三秀舍，明治三十八年五月），頁 539-541。

⁹²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 365-367。

⁹³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 517-599。

⁹⁴ 楊運福、高傳棋、吳茵著，《臺灣百年生活圖錄第一輯・廣告時代・第五冊技藝傳承》（新北蘆洲市：博揚文化編輯部，2010 年 1 月），頁 25-31。

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在臺灣傳統習俗中仍保持有婚嫁中使用金銀飾的傳統。比方說，女子出嫁，男方需為女方準備金銀飾品，而娘家也會為出嫁女兒準備嫁妝，通常以金銀首飾為主。這除了表達娘家對女兒的心意，也讓女兒在出嫁後經濟困頓時能有後盾。因此，金銀首飾既是臺灣婦女的共同記憶，首飾也常被視為一種具有「女性氣質」的物件。⁹⁵

（三）漢人金銀飾品的製作

有關清代初期的金銀飾品的製作，文獻中並未提及。從漢人開發與生產條件來看，很可能是由中國大陸進口的。明確的是，最遲在清代晚期，臺

灣已有製造金銀首飾的匠師，如《安平縣雜記》指出：「銀店司阜：一切婦人首飾釵釧、環簪及什用銀器，均資製造。」⁹⁶ 一般認為，清代臺灣金工師父大多來自閩南；然而，筆者曾於粵東潮州打銀街上，見有傳統打銀匠師與工具（圖 38、39），其中，是否曾有一部分銀匠移民來臺，待日後深入調查；另根據林衡道的調查，彰化市早期有一部分金銀匠來自福州。⁹⁷ 整體來說，臺灣清代金銀首飾的加工方式和近似大陸地區，有鑲花、鏤空、拔絲、縲絲工藝，尤其是鑲刻工藝更是銀匠最常使用的技法（圖 40），少數則有鑄造製作。



【圖 38】廣東潮州打銀街上所見傳統銀器打製工具，圖版：筆者 2014 年 1 月拍攝。



【圖 39】廣東潮州大銀街上所見傳統八卦護身銀符，圖版：筆者 2014 年 1 月拍攝。



【圖 40】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銀鎖片（清晚期至日治時代），打作、鑲刻工藝細部。

⁹⁵ 西方人類學家米德研究，男女性氣質是由文化所塑造的，因此，裝扮自我讓日記看起來美觀，有是一種由社會所塑造的行為（Margaret Mea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 1935）。另拙作指出，中國自唐代以後金銀飾品逐漸具有女性氣質。（李建緯，〈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性別與裝飾功能為中心〉，頁 33-79）。

⁹⁶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9 月），頁 83。

⁹⁷ 林衡道，〈彰化市的手工藝〉，《臺灣文獻》（第 31 卷第 1 期，1980 年 3 月），頁 107-133。

根據日人的調查，日人治臺以前的金銀工平均年薪約為 350 圓，治臺後（明治 36 年）為 750 圓；相較於苦力雖高出 2 倍有餘，但只比轎夫、染工年薪稍高，⁹⁸ 顯示金銀工的收入在 19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初，並非特別高。

此外，日治時代初期（1901-1909 年）臺灣臺南、打狗、安平、大稻埕…等 23 座城中，統計 6,509 家店舖中，登記有「銀店」者，在臺南 24 家、鳳山 2 家、安平 1 家、東港 2 家、西螺 10 家、鹽水港 9 家、朴仔腳 7 家、北港 14 家、嘉義 12 家、阿猴 2 家、斗六 5 家、鹿港 15 家、彰化 10 家、北斗 8 家、臺中 5 家、葫蘆墩 11 家、大稻埕 20 家、臺北城內與艋舺 12 家、基隆 7 家、宜蘭 5 家、新竹 13 家、滬尾 3 家，合計共 197 家，數量占當時調查店舖的 3%。⁹⁹ 從上述數量觀察，可看到清末至日治初期金銀器的消費大城，分別是臺南、大稻埕、鹿港、新竹、臺北艋舺、彰化等，而消費人口的數量，與打銀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若從銀店數量來說，臺南、大稻埕與鹿港，應是日治時代臺灣打銀匠的主要集中地。



【圖 41】鹿港鄭應諧先生工作桌

以府城來說，忠義街與民權路交叉路口一帶，曾是整個臺灣傳統金銀細工的重要聚集地點，因此素有「打銀街」之稱，在日治時代也稱為「白金町」。後來不幸毀於二次大戰。其中幾位匠師如蔡石蟬的鑿花銀器，皆名聞一時；¹⁰⁰ 然而，隨著工業時代進步，大量機械製品的泛濫，擠壓了傳統金工匠師生存空間，目前臺南打銀街已不復當日盛況。

在鹿港，以鄭應諧為代表（圖 41、42）。他迄今仍從事金器打製，除了繼續製作傳統金飾，如鹿港湄洲二媽的金質雲肩，便是出自其手藝，近年來更將其製作從傳統首飾，轉向黃金創作等題材。然而，目前一般銀樓中的金銀首飾已很少見到這金銀打作工藝。大多是採用大量生產的鑄造法製作，千篇一律，已失去金銀細工的巧妙變化之美。而金工創作模式，也從過去師徒制轉變成為學院的養成教育。¹⁰¹



【圖 42】鄭應諧打作金銀鎖片所用的模子

⁹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 467。

⁹⁹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三卷，（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92-420。

¹⁰⁰ 林明德編，《臺灣工藝地圖》（臺北：晨星出版，2002 年），頁 260-262。

¹⁰¹ 陳威志，《1985 年以來臺灣的大學院校金工藝之發展》，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30-33。

目前，臺灣傳統金銀手藝，似乎僅保存於傳統宗教類文物的製作上。如府城林啟豐仍繼續從事神帽的製作，如新港奉天宮媽祖神像的多件銀質神帽（圖 43），即是出自其手藝。¹⁰² 另府城金銀匠師蘇啟安、蘇建安除了製作金銀神帽，也曾修復臺南大天后宮鎮殿媽祖手上所持的銀質圭板（又稱七寶神笏）。¹⁰³ 但這類飾品屬於神明飾品類的宗教文物，已非生活飾品範疇。

肆、結論：金銀首飾作為身體裝飾中的社會再現

在所有打扮中，金銀器因稀少，故它經常又代表了社會身份的再現。我們看人通常第一眼是從頭（臉）開始，其次再往下看胸腰，最後才是足部或四肢，因此以金銀來裝飾這些視覺焦點部位更具畫龍點睛、事半功倍之效。加上黃金本身永不褪色的光澤，因此它之所以逐漸成為和玉並駕齊驅的佩件首選材質，除了是因為金本身的象徵性，更是因為外觀上具光彩奪目的視覺優勢。



【圖 43】府城林啟豐所製作神帽，新港奉天宮二媽使用。圖版：筆者拍攝。

每種社會都有自己的習俗，在一定社會或一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身體裝飾方式和其它社會或時期的身體慣習是不同的。有鑑於此，金銀首飾裝飾傳統之所以會有差異，乃基於各地傳統的不同，在中國古籍中也見此種體認。因此，黃金白銀與身體之間發生的身體技術，反映的正是不同的文化再現與慣習。

從金銀飾品種類來說，原住民與漢人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系統。原住民早期比較偏好黃金製品，或許與其自然形態比白銀容易提煉有關，由於這一階段資料較少且未成系統，故其來源待日後更豐富的材料釐清。隨著明清時代漢人遷臺，銀器比例逐漸提高。整體來說，臺灣貴金屬飾品種類與大陸亦步亦趨，造形上也深受漢人飾品的影響，甚至清代中期以前多是由大陸直接輸入，因此與其飾品幾無二致。但是，清代漢人的金飾數量相當稀少，以銀飾居多，不排除當中有不少是銅鑲金飾品。



¹⁰² 李建緯，〈女神的容顏：新港奉天宮媽祖神像造形研究〉，《臺灣文獻》第 66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60-65。

¹⁰³ 方賓秀，〈蘇啟安、蘇建安宗教金銀細工製作〉，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10 年。

透過文獻來看，漢人文獻中的金銀飾品多是在約定婚期的時刻使用，而且是由男方提供女方飾物（身體裝飾權）；原住民則極少被強調其使用時機，多是一種外觀上的描述，而且描述方式不脫套用先前志書的說法，欠缺一種脈絡性的觀察；換言之，在臺漢人的金銀飾件，被強調是在某種社會契約中被使用；至於原住民飾品，則是以一種帶有漢人角度的獵奇心態被描述。

以臺灣漢人所見金銀製品配戴時機來說，在其一生中的過渡階段，即出生、成年、結婚、死亡。為了讓過渡階段能順利通過，世界各民族經常會衍生成各種過渡儀式讓通過的過程更順利。有趣的是，臺灣民間經常會在親友面臨過渡儀式互贈金銀首飾，如彌月、訂婚與聘金、死亡（老人嫁妝）、神明生日等時機：一方面與黃金本身的正面的、光明的意涵有關；另一方面也隱含了經濟層面的禮物交換有關，具有某種契約的性質。根據 Marcel Mauss 的理論，交換（échange）和契約（contract），可以透過一種「禮物」的形式達成，表面上是自願的，但實際上卻是義務性的。¹⁰⁴ 贈送他人金銀飾，其背後的社會成因是要加強彼此連結：收受方對於金銀飾品的贈予方，具有回饋的義務性。因此，金銀飾品表面上雖然是一種身體外觀的修辭，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整個社會運作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潤滑劑。

參考文獻

（一）史籍

〔清〕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清〕李漁，《閒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53。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清〕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3 年 6 月）。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文建會，2005 年）。

〔清〕林焜熿，《金門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清〕林豪，《澎湖廳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清〕徐珂，《清稗類抄》第 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1 月）。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1 月）。

〔日〕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6 月）。

（二）期刊

中村孝志原著，賴永祥、王瑞徵譯，〈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臺灣文獻》第 7 卷第 12 期，（1956 年 6 月）。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03，頁 3-14。

王永剛、崔風光、李延麗，〈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3。

王國道、崔趙年，〈青海卡約文化出土的金器〉，《故宮博物院院刊》，總 109 期，（2003）：5，頁 43-4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 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1953 年 9 月）。

吳振錄，〈保德縣發現的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4，頁 62-64。

李宜靜，〈論清代臺灣府諸羅縣產金傳說〉，《康寧學報》第 13 期（2011 年），頁 21-38。

李建緯，〈女神的容顏：新港奉天宮媽祖神像造形研究〉，《臺灣文獻》第 66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37-106。

李建緯，〈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性別與裝飾功能為中心〉，《史物論壇》第 16 期（2013 年 6 月），頁 33-79。

李建緯，〈從物質觀、技術與飾身角度詮釋傳統與當代金工之傳承與變革〉，《藝術學報》第 7 卷第 2 期，（2011 年 10 月），頁 31-59。

林衡道，〈彰化市的手工藝〉，《臺灣文獻》第 31 卷第 1 期，（1980 年 3 月），頁 107-133。

陳光祖，〈從歷史文獻看臺灣早期的「考古」發現〉，《田野考古》第 6 卷（1998 年 12 月），頁 13-66。

陳漢光，〈雅美族的金銀文化〉，《文獻專刊》第 5 卷第 2 期，（1954 年），頁 13-21。

黃正建，〈唐代的耳環—兼論天王戴耳環問題〉，《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3 輯（2008 年），頁 1-5。

葉美珍，〈臺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試掘工作簡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第 1 冊，民國 82 年（1993 年），頁 30-58。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1960）：7。

（三）專著

James W. Davidson（達飛聲）著、陳正三譯，《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出版，2014 年，出版 1903）。

不著撰人，〈舊珠新寶：歷史賦新意，古董首飾鑒金歲月〉，《蘋果日報》，（2010 年 9 月 26 日），B8 版。

方賓秀，〈蘇啟安、蘇建安宗教金銀細工製作〉（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10 年）。

王金華、唐緒祥，《中國傳統首飾》（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 年）。

王苗，《珠光翠影》（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年 2 月）。

王興平，〈明朝命服制度與南京出土王公貴族妝飾文物〉，《明朝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4。

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 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之第六章〈唐宋時代之金銀器飾〉（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日文發表於 1927 年），頁 336-364。

何傳坤、劉克竑，《雲林縣及嘉義北港溪古笨港遺址「崩缺溪」地點搶救考古調查及評估計畫》，（行政院文建會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2003 年 5 月）。

¹⁰⁴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 archaïques," in Année Socio-logique, n.n.l. 1923-1924, pp.30-186.

吳茵編著，《臺灣百年生活圖錄第一輯廣告時代》第五冊・技藝傳承，（臺北：博揚文化，2010年）。

李匡悌計畫主持，《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臺南縣政府委託，中研院史語所執行，2004年11月）。

李俊德編，《八卦山史蹟文物展圖錄》（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杭海，《妝匣遺珍》（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9月）。

林明德編，《臺灣工藝地圖》（臺北：晨星出版，2002年）。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南京市博物館編，《金與玉：公元14-17世紀中國貴族首飾》，（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年）。

施翠峰著，《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年）。

孫彥貞，《清代女性服飾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頁37-45。

孫機，〈明代的束髮冠、荻髻與頭面〉，《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頁303-333。

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案》（臺北：南天出版社，1995年）。

高玉珍、王慧珍編輯，《鹿港民俗文物》，（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5年）。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

張炳南監修，《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年）。

粘碧華，《首飾設計百種》（臺北：雄獅美術，2007年）。

陳光祖、李坤修，〈臺灣地區出土金器芻論〉，《「2006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7.5.5-6）。

陳威志，《1985年以來臺灣的大學院校金工藝術之發展》，（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9月）。

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8月）。

黃能馥、蘇婷婷，《珠翠光華：中國首飾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楊連福、高傳棋、吳茵著，《臺灣百年生活圖錄第一輯・廣告時代・第五冊技藝傳承》（新北蘆洲市：博揚文化編輯部，2010年1月）。

經濟部工業局編，《黃金與飾品》（臺北：經濟部工業局，1994年）。

臧振華、劉益昌，《十三行遺址搶就與初步研究》（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

鄭文章，《南瀛民間器物誌》第二章〈衣飾器物〉，（新營：臺南縣文化局，2002年），頁105-173。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府城登錄文物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期末報告書》，（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辦理，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09年1月）。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09年11月。）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東京：三秀舍，明治三十八年五月）。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三卷，（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年11月）。

關善明、孫機，〈隋唐金飾〉，《中國古代金飾》，（香港：沐文堂美術出版社，2003年）。

蘇世雄，〈傳統金工及飾品文物之美〉，《璀璨銀彩：館藏金工及飾品文物賞析》（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1年），頁9-30。

（四）外文參考資料

Beauchair, Inez De. “Gold and Silver on Botel Tobago: The Silver Helmet of the Yami,”（蘭嶼雅美族的金銀工藝與銀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7期（1969），pp.121-128。

Bunker, Emma.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pp.31-54.

Bunker, Emma.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pp.31-54.

Julia M. White, “Images and Imagination in Personal Ornament,” in *Adornment for the Body and Soul: Ancient Chinese Ornaments From The Mengdiexuan Collection*,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65-76.

Mead, Margaret.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 1935).

Scott, Hugh. “chapter V Jewelry,” in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t, The Lively T'ang Dynasty*,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82), pp.37-77.

Tait, Hugh. “Introduction,” in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Jewelle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6), pp.11-13.

White, Julia M. “Development of Objects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China,”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Art Museum, 1994), pp.13-29.

White, Julia M. “Images and Imagination in Personal Ornament,” in *Adornment for the Body and Soul*, (the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pp.65-76.

文化資產教育與博物館

Heritage Education and Museums

江明親¹ Min-Chin Chiang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摘要

2014 年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中首度將「文化資產保存教育」納入中央政府法規。而歐美各國亦早已於 90 年代廣泛討論文化資產教育之議題，歐盟並於近年內陸續完成文化資產教育的政策與研究計畫。文化資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看似簡單易懂，然而當運用在言談中，往往涵蓋分歧甚或可能相互衝突的認知。究竟文化資產教育是什麼？和歷史教育有什麼不同？而臺灣 90 年代以來發展的鄉土教育，和文化資產教育指涉的內涵是一致的嗎？究竟文化資產教育在變動快速的當代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而作為社會教育及文化資產最相關的文化機制之一環的博物館又應該如何應對前述文化資產教育的發展和需求？

關鍵字：文化資產教育、遺產教育、博物館、公民教育、鄉土教育

Abstract

In Taiwan, education reg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was first included as part of central govern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hen an amendment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was announced in 2014. However, a number of Euro-American countries had already begun the discussion on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in the 1990s. For example, 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polici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on this subject in recent years. The term ‘heritage education’ may sound straightforward enough, but when people apply this term in discussion their perception of this term may cause them to refer to different or even conflicting concepts. What is heritage education anyway? How is it different to historical teaching? Is the content of local culture education, which was started in the 1990s in Taiwan,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concept of ‘heritage education’? In our fast-chang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what kind of role should heritage education play? How can a museum, the most relevant party within the macro-environ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and demands for heritage education?

Keywords: heritage education, museum, historical teaching, civic education, local culture education

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前言

1990 年代，無論歐洲或臺灣同樣出現文化遺產的熱潮，前者是在冷戰結束，共產政權逐一解體的衝擊下，由歐洲理事會主導將文化遺產作為化解族群紛爭、自多元文化中取得歐洲認同的政策方針，啟動培養歐洲公民的文化資產教育計畫；而同樣在後冷戰結構下的臺灣，歷經長期禁錮的戒嚴時期，於此時重新建立斷裂已久的人與土地的關聯。1990 年代以來的二十年，可謂臺灣的「地方時代」，中央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縣市政府開辦博物館、舉行各種文化節慶，各地方文史工作室蓬勃發展，文化保存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1993 年，鄉土教學活動正式納入小學課程，1994 年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使中學生需修習鄉土藝術活動等課程，2003 年更頒訂「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要點」。總體而言，無論歐洲理事會的「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或者臺灣 90 年代以來的「鄉土教育」，皆期待透過身邊的環境、人的生活與文化累積的物質紋理，讓新的世代得以更理解、貼近家園社群而產生共感，尊重多元文化，並且以此延展而與更廣大的世界連結，培育具有社會關懷和行動力的公民。同時，兩者在教學方法上皆強調跨專業領域的合作，尤其身為文化資產守護與詮釋機制的博物館更是扮演教育的核心角色。

距離鄉土教育啟動超過二十年，離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發布施行也已邁入第四個十年，2014 年，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中首度含括「文化資產保存教育」²，而傳統藝術文化資產亦將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程綱要³。於此關鍵階段，應得檢視文化資產教育的內涵並了解他國發展狀況，以作為規劃推動的參考。本文並將以黃金博物館為例，討論博物館作為文化資產教育機構的潛力和挑戰。

貳、文化資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⁴的定義與內涵

文化資產教育的定義多元，參考 1980 年代晚期至 90 年代初期，美國歷史保存信託（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對於文化資產教育的定義，大約如 Kathleen Hunter(1988)所言，文化資產教育為「一種認識歷史和文化之教與學的方法，此方法將自物質文化與人文居住環境所獲得的資訊作為教學的主要資源」⁵Hunter 在 1992 年發表的報告中，將上述定義作更完整的延展：「[...] 此方法藉由自然與居住環境、物質文化、口述歷史、社區工作、音樂、舞蹈、文獻等所獲得的資訊，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在地遺產，並且使我們和其他文化、區域、國家以及全世界產生連結」（Lambert 1996）。上述定義不認為文化資產教育應該被作為一項教學的主題（subject），而應該視為方法（approach），幫助歷史文化主題的學習。文化資產可作為一種更為活潑感性的方式，透過就在身邊的建築、可見的物件、人群的生活記憶等，拉近年

² 修正條文第 11 條：「為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各級學校於相關課程中為之。」參考行政院官方網站：<http://www.ey.gov.tw/>（2015 年 6 月 9 日連結）
³ 「適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的編擬與制定，藝術領域的內涵與教學不宜侷限於西方藝術內容與表現形式。衡量世界趨勢以及鄉土教育成果，將傳統藝術文化資產的守護觀念以及藝術核心價值，依學習階段分別融入學習表現與課程內容，引導教材編輯，讓孩子可以透過欣賞與體驗臺灣多元傳統藝術文化資產的表現形式及核心價值，培育人文關懷，社會參與及公民美學的涵養。」引自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傳藝再生入課綱，學習多元展薪傳說帖》，頁 10。
⁴ 本文的「文化資產教育」係譯自 Heritage Education，並依我國法定名稱而訂，以探討在我國教育文化情境脈絡中實踐之可能性。Heritage Education 原譯為「遺產教育」，涵蓋文化、自然、法定遺產、在地社群認同的遺產等廣泛面向，本文之「文化資產教育」以文化性資產為主，含括法定文化資產以及雖不具法定身分，然具有文化資產教育價值之各類項。論及歐美等國情境時，「遺產教育」與「文化資產教育」並用，而專指我國脈絡時以「文化資產教育」為主。
⁵ 作者自譯，原文為：Heritage education is an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history and culture that uses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human and built environments as primary instructional resources（Hunter, 1988）。

輕世代與過去的距離，產生共感和連結。此定義的文化資產教育形式主要仍是以實地參訪文化資產以輔助歷史文化知識的吸收、建立情感的連結為主，進而產生守護的動機。

文化資產教育亦是 90 年代前後歐盟各國討論教育政策議題時關注的焦點，歐洲理事會 1998 年的政策建議，將文化資產教育定義為：「一種植基於文化資產的教學方法，融合積極主動的教育方法、跨學科教學法，在教育與文化領域間形成合作關係，並且運用最多樣的表現與溝通模式」⁶。由此定義來看，文化資產教育以文化資產作為教育資源，其教學特質在於「表現性」（performative）以及「跨域性」。前者基於文化資產包含有形、無形，得以觸發五感等豐富的素質，當代並已發展出各種詮釋手法，使運用文化資產的教育方式較為活潑多元；而後者則強調文化資產教育並非一門學科，而是能夠融合於各個學科中的教學方法，例如常見的歷史和地理教學融合建築和自然文化資產，美術教學融合傳統藝術等，甚至數學、天文學等亦可運用文化資產為教學資源。

Tim Copeland 在 2005 年歐盟委託的研究案中⁷，更進一步提出文化資產教育方法的三個層面：(1) 關於文化資產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Heritage）；(2) 透過文化資產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Heritage）；(3) 以文化資產為目的的教育（Education for Heritage），分別說明如下：

- (1) 關於文化資產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Heritage）：將認知能力應用於特定的文化資產範疇與地理空間，亦即對於文化資產項目本身的認識。
- (2) 透過文化資產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Heritage）：運用認知與情意能力於特定的文化資產範疇與地理空間－亦即將文化資產作為跨學科（cross-curricular）的媒介，例如透過文化資產學習天文學和數學等；而同時間，跨學科的學習也能夠幫助學習者認識文化資產本身。

- (3) 以文化資產為目的的教育（Education for Heritage）：在特定地理空間範疇中運用認知、情意及行動導向的能力。學習者不僅能夠更為多元的與文化資產產生互動，發展保存管理策略，並且與自身的文化背景產生連結，甚而與其他人分享。

而在「遺產教育與公民權」（Heritage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一文中，Copeland（2004）亦指出遺產教育的意涵：

1. 遺產教育並非單一學科，而是一種教育的類型。
2. 使用跨文化的方法，希望使學生能夠認識並欣賞物質與非物質的文化資產，以達到：
 - (1) 能夠指認不同規模範圍（scale）內的文化資產，例如在地的文化資產有哪些，屬於國家的有哪些，世界上其他地區有什麼樣的文化資產；
 - (2) 能夠發掘不同人群之文化遺產的相似性，也能夠尊重和悅納其不同之處；
 - (3) 因而能夠反擊種族主義、仇外、暴力、激進的國族主義以及不寬容。
3. 而由於文化資產教育並非學科而是方法，因此必須運用各種不同的學科方法和專業：
 - (1) 文化資產教育本質上是建構式的，植基於原始資料和一手經驗以提出問題並進而解決問題。而其進行方式經常是合作式的活動，所以是社會建構式的；

- (2)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是終身學習的；
- (3) 對於各種學科課程的發展有所幫助。

上述幾個定義，文化資產教育皆不被認為是一「學科」（subject），而是一種「類型」（type）或「教學方法」（approach）。第一個定義將文化資產教育視為歷史文化教學的輔助方法，歐盟於 1998 年的定義較其擴大並強調文化資產運用於教育上的豐富表現性。Copeland 則延續歐盟透過文化資產教育以養成歐盟公民的政策目標，分析文化資產教育與公民教育的構面，以及兩者在概念上的連結與學校教育內實踐的可能性。在教育現場，文化遺產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接觸，立體的經驗，因此對於該遺產是怎麼被選擇成為文化資產的、誰決定的、決定的過程、目前面對的問題、可以怎麼解決等作討論，亦是公民教育中批判思辨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參、歐盟與荷蘭文化資產教育的發展

1989 年起，歐洲政策建議（Recommendation）第 R (98)5 號議案為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正式通過，並以「歐洲遺產課程」（European Heritage Classes）計畫為首，開始推動一系列遺產教育計畫（Branchesi 2007）。此實反映後冷戰情勢的轉變和軍事衝突、歐盟範圍的調整和內部的人口與移民問題。歐洲各國面對殖民時期延續的移民與族群問題，歐盟亦面臨建立歐洲共同認同的焦慮：如何透過文化遺產「異中求同」，並且在相互理解彼此的族群文化中尋求對話與融合，遺產教育成為關注。1993 年歐洲理事會之維也納高峰會各國領袖共同宣布追求和平與人權，1995 年即於布魯塞爾舉行「文化遺產及其教育意涵：寬

容、好公民以及社會融合的一項驅動力」座談會（Council of Europe 1998），分享討論各國實行上述歐洲文化遺產課程計畫的經驗和所獲，而文化資產作為一種方法，輔助歐盟的年輕世代學習成為歐盟的好公民，亦即尊重人權與文化多樣性，並且有助於社會融合。2004 年非政府組織 Europa Nostra 在歐盟支持下舉辦的「遺產與教育：歐洲觀點」論壇亦延續其方向，尤其就同年歐盟於海牙之政府鋒層研討會「文化與學校：跨歐盟藝術與遺產教育政策」（Culture and Schools: Policies for Arts and Heritage Education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所觸及的議題，提供民間的觀點。而遺產教育受到焦點關注，與荷蘭擔任 2004 年歐盟主席國有密切關係。荷蘭自 1990 年代起即意識到遺產教育與歷史教育的關係，並於 2006 年正式將文化遺產相關機構如博物館和保存組織等納入其國民教育歷史課綱的配合教學資源，亦希望將此經驗在歐盟各國推動。

1986 年荷蘭修訂中學課程，將學生的生活環境（living environment）列為各科教學的義務，希望導引其更為認識身邊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以進一步了解相關物件和現象。這樣的目標也同樣含括於 1998 和 2006 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課程修訂中，而這兩次修訂直接明確指涉「遺產」（heritage）（Savenije 2014, 12）。尤其 1996 年起荷蘭政府的「文化與學校」（culture en school）政策正式啟動後，許多政府部門特別強調融合遺產於教育中，成為學校與博物館合作的動機，多項博物館和文化資產場址被列為歷史綱要各子題的配合單位。

2011 年，荷蘭學者對於文化資產教育的定義與上述並無太大差異，然而其在當代社會所面對的挑戰和衍生議題更為多元：一動態（dynamic）的定義更為強調。而當文化資產被納入正式學校教

⁶ 作者自譯，原文為：“ ‘heritage education’ means a teaching approach based on cultural heritage, incorporating ac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cross-curricular approaches,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employing the widest variety of mode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Recommendation No. R (98)5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heritage education)

⁷ 研究案名稱為：Europea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heritag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育課程時，如何在課堂裡回應文化資產所帶來的多元議題，成為挑戰（Van Boxtel, Klein and Snoep 2011）。不可諱言，上述對於文化資產教育的政策關注多半基於認同的建構，如歐盟對於歐洲認同—共享的歷史文化的強調。然而經過近三十年的討論，文化遺產的概念意涵早非靜態、單一：「文化遺產是動態的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文化遺產是現在的過去（the present past）」等已是當代研究者共同分享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文化遺產皆是為現在服務，並且都牽涉到「選擇」的問題：誰選擇何者可列入值得保存？誰決定要呈現哪個過去、強調誰的認同？因此當政策制定者擬定歷史文化教育政策時，已不可能大大方方的強調乾淨單一的民族認同。荷蘭學者提出文化資產進入教育現場所面對的兩大挑戰：如何平衡認同（共同性的建立）和多樣性的需求；以及如何在融入過去和保持一點距離客觀看待過去間找到平衡。後者涉及文化遺產發展過程以來，歐洲傳統學界對於文化遺產的不信任態度。

肆、文化資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歷史教育（Historical Teaching）與公民教育

「『歷史』和『遺產』以前被認為是對立的。在今天，很多人在討論歷史文化的時候，反而對於歷史再現的複雜多樣和兩個『領域』間的銜接比較有興趣。如果所謂的對立真的存在於教育脈絡中，那可能會導致『歷史教學』（historical teaching）和『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之間—人為的（artificial）—區別：

—教室裡的歷史教學所教的過去是一連串原因和結果組成的抽象過程，而遺產教育所呈現的過去是人的故事的蓄積；

—歷史教室中使用教科書，而遺產教學則使用物質與非物質的過去集合；

—歷史教學鼓勵知識的延伸以及理性思辨，而遺產教育鼓勵過去的經驗和認同的發展。」（Klein 2011: 15）

荷蘭的歷史教學目標強調的是歷史學的方法與看待歷史的態度，前者為學習運用歷史學的方法以分析解決問題，後者則為學習以客觀批判的角度對於議題進行思辨。在這樣的教學前提下，文化資產教育往往顯得太過於感情用事，因此在文化資產納入歷史教學的過程中不乏質疑的聲音。如引文所示，一般認為文化遺產能夠牽動的是屬於人／人群故事與記憶的內容，因此比較引人入勝，同時牽動個人情感甚至導引情緒，運用於教育上較具表現性。如此一來，有其優點亦有潛在危機，優點在於較為活潑、能夠引發學習興趣，並且激起認同和守護的意願；但也同時，若某一過去的主觀認同和情感依附過於強烈，也可能對其他的多元認知和思辨產生排斥。然而在持續討論後，許多教育者能夠理解和認同歷史教學與文化資產教育相互援用的可行性和必然重疊性，但也因而時時保持警戒在教學現場尋求平衡，以更計畫性的方式運用文化資產資源。尤其在「困難的遺產」（difficult heritage）的教學方面（Van Boxtel, Klein and Snoep, 2011）。

除了運用於歷史教學，許多研究者亦關切文化資產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Tim Copeland（2004：71）提及遺產教育與民主公民教育之關係為：

1. 公民權包含對於文化資產的權利與責任；
2. 文化資產提供公民權一個文化的向度，（使學習者）：
 - (1) 對於當代的議題能夠理解，而此理解來自於不同文化的過去之相關經驗和知識；

- (2) 能夠切實理解每個人群的文化需求，以及如何以社會與族群平等思考其意涵；
- (3) 能夠了解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衝突的原因和可能的解決方法；
- (4) 能否對於文化資產決定過程有一批判性的認知；
- (5) 了解文化資產的價值和倫理觀如何影響人群的決定與行動；
- (6) 進而能夠發展出自身關於文化議題，以及這些議題如何影響政治、經濟和環境議題的理性觀點。

就此而言，文化遺產與公民教育是相互涵構的，文化遺產教育不僅只具有親近性，使學習者能夠「直觸」（touch）過去，感覺自己與過去的連結，在 Copeland 的討論中呈現幾個觀點：（1）理想的文化遺產教育還要能夠提供觀看的距離，讓文化遺產的接觸經驗是思辨的，也是包容參與的（inclusive），其教學並非單向知識傳遞，而是多元觀點的，學習者也參與其中的。（2）文化遺產必然是現在中心的，對文化遺產所代表的貫時性軌跡越了解，我們越能夠理解當代現象的緣由和發展脈絡，也能夠越了解看似不合理文化現象有其原因，進而發展包容的態度和思辨的應對方法。

伍、博物館、文化資產教育與「困難的遺產」：黃金博物館的角色

博物館是文化遺產的保存守護機構，同時也因為具備詮釋的角色和任務，一則使過去和現在得以在特定空間範疇相遇，產生連續性（continuity）感受；二則亦提供觀看的距離，透過教育材料的設計，衍生思辨的可能性，因此博物館是學校進行文化資產教育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而黃金博物館區域性文化資產保存的特性，使其教育角色的獨特性更為凸顯。

黃金博物館位於新北市瑞芳區的金瓜石，於2004年開館，正值臺灣文化與在地意識蓬勃發展的時期，亦是民間和公部門共同投入文化資產保存的關鍵階段。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施行，19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啟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地方文化館及世界遺產潛力點等計畫，金瓜石地區皆獲得補助。黃金博物館的發展理念，正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文化保存與社區參與的脈絡。2004年開館之初，以黃金博物園區為名，強調區域型態的「生活環境博物館」（或譯生態博物館，原文為ecomuseum）理念，非屬一名一館之傳統博物館思維。此源於規劃顧問團隊的日本專業背景之影響，轉譯1970年代法國ecomuseum之概念，將其詮釋為文化資產（heritage）、社群（community）及博物館（museum）之三重複合模組。黃金博物園區發展計畫，正是文化資產保存（修舊如舊）、社群參與和生活文化以及以博物館經營作為保存發展策略的落實。因此，在發展主軸上，黃金博物館始終是區域文化資產的守護者和教育者。

「生活環境博物館」的規劃理念，也闡明黃金博物館有別於其他博物館的最重要特性－其守護的是「活的」（living）文化資產。博物園區的核心發展範圍內仍是居民活動的場域，郵局、警察局位在其中，居住聚落亦在咫尺。黃金博物館最吸引人的風味，在於日治時代就留存的紅磚牆、階梯、老樹以及穿越其中感受到的時間感。在這裡，處處能與過去相遇，這正是文化資產教育研究者所提到文化資產經驗的兩大質素：「連續性」（continuity）與「情感的介入」（emotional engagement）（Savenije 2014）－在這裡，過去與當下同時存在，使人直接體會到當下的我與過去的連結，這正是過去臺灣人始終斷裂的「歷史感」；而與物、與人的體驗，給予和「過去」直接接觸的親近感受，亦能夠激起情感的投入，提高學習和參與的動機。也因此，黃金博物館所守護的文化資產，不僅僅是被指定、登錄的法定文化資產，或者修復後作為詮釋教育導引的各館舍，也包含區域內的生活紋理，生活紋理和時間感越而減損，博物館的獨特性即越而消失。

此外，黃金博物館極為難得的保有、並置不同歷史階段的物質紋理，是發展多元文化教育的極佳場域。金瓜石地區主要發展自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是殖民政府極力經營的金礦產區。戰後礦業資產由國民政府國營企業接收，在銅礦生產方面亦為可觀。殖民時期以來逐步興築的礦業建築和相依發展的聚落型態，並且因為始終由國營企業管控，土地皆為國有，聚落紋理改變有限，物質和景觀風貌仍舊維持其完整性。也即因此，其文化資產貫時性的層理仍然可見，尤其在如何理解殖民歷史、建立多元文化及人權教育的層面上具備豐富的教學資源。

金瓜石的聚落發展依循日本殖民階級序列規劃，由礦業會社依據總督府規範主導整體發展（波多野想 2015），而今日的建築與聚落紋理仍然保有其完整性：位於聚落最頂端的金瓜石神社以及核心區的太子賓館，屬於最上層階級，並已於 2007 年公告為古蹟；同屬於聚落核心區的管理階層宿舍－四連棟則以建築法紀念性建物的身分予以復舊並開放參觀；核心區以外，包含主要的礦業工作區和臺籍礦業人員生活空間、溫州寮等宿舍區，目前列為新北市古蹟的為 2005 年公告的「金瓜石礦業圳道及圳橋」。而曾被稱為「督鼻仔寮」的二戰戰俘營，則規劃為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如此完整的層理，反映金瓜石地區層疊而多樣的記憶：日籍管理人員與工作人員於日式宿舍區的生活記憶（戰後此結構為外省籍管理階層承接）、臺籍工作人員在蜿蜒山徑與坑道的居住和工作記憶、溫州人等外來移工的記憶、二戰戰俘的記憶等，無疑是文化資產教育討論多元文化的最佳場域，亦是臺灣歷史教育最豐富的教學素材。於此，不同社群記憶的發掘，挑戰了權威論述（authorised discourse），並且以物質證據為基礎，我們更可思辨怎麼樣的歷史敘事更能解釋留存於在地的物質脈絡、哪些過去被選擇呈現、哪些過去是沉默的、為什麼。

在多元的記憶面向中，戰俘營遺址可說是「困難的遺產」（difficult heritage）的代表性議題。1942 年起，日軍將來自大英國協盟軍的戰俘（英國、加拿大、澳洲等）陸續送到金瓜石，在極惡劣的環境下強迫進行挖礦等勞役，許多戰俘喪生於此。然而這段記憶始終沉默，直到臺灣戰俘營協會持續的關切和努力，2005 年，在原戰俘營遺址處設立了戰俘營公園，近年來更在新北市府的支持下改為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然而即使硬體建設有成，每年十一月能夠回到遺址出席紀念儀式的戰

俘因年邁而越來越少。此外，如 BBC 記者觀察，即使數百公尺外的博物館園區訪客如織，戰俘營遺址卻極為冷清，其並以「差點被遺忘的二戰盟軍戰俘」為名（對應戰俘營協會及博物館內解說之 Never Forgotten），玩笑式地提醒這段歷史仍舊沉默。⁸ 沉默的原因，或許我們可以透過 Sheppard（2010）對於「敏感的歷史」（sensitive history）的說明加以理解，其認為「敏感的歷史」有三種特質：(1) 其內容和苦難的事件（traumatic events）有關；(2) 學習這段歷史的人和被呈現的這段歷史的主角有關聯；(3) 這段歷史主題受到某種道德的質疑（a moral response）。戰俘營的過去，在金瓜石不容易被言說，一方面是日軍曾建築地下坑道，嚴格隔離在地居民與戰俘；一方面則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許多在地員工亦是日人的雇員，曾參與控管戰俘。時空轉換，當選擇再現時，往往只有維持某種表面敘事以避免挑起敏感性。然而這也同時放棄了文化資產教育與人權教育的寶貴機會，而當戰俘皆年邁離開人世，究竟這終戰紀念園區能夠留給金瓜石和臺灣人的價值意義何在？

一位參與荷蘭奴隸交易文化遺產教學研究計畫的成員，就某位教師反映在教奴隸交易主題時不願意帶學生參訪阿姆斯特丹的相關遺址，因為會引起罪惡感時，他這麼回應：「對我而言，它（所引起的罪惡感和責任感）正強調了在教育系統中處理奴隸議題的重要性，在教育系統裡，學生被鼓勵以批判思考參與議題，並且尋找它在十八世紀經濟和社會脈絡中的位置。他們也能夠將這些感受到的情緒放在一個有意義和結構性的脈絡內來思考，例如，鼓勵學生思考過去和現在的關係，思考奴隸在社會記憶中的角色，打破本質主義裡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二分法，因為其經常主導歷史意識並且導向分

⁸ BBC 中文網（2015 年 7 月 7 日）：「臺灣的抗戰：差點被遺忘的二戰盟軍戰俘」。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07_wwii_taiwan_alliance_pow_history（2015 年 8 月 13 日連結）

參考文獻

- Branchesi, L. (Ed.), 2007. *Heritage Education for Europe: Outcome and Perspective*. Roma: Armando.
- Copeland, T., 2004. Heritage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Heritage and Education-A European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a Nostra Forum, 1 October 2004, pp.67-72.
- Copeland, T., 2005. *Europea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heritag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Council of Europe.
- Council of Europe, 1998. *Proceeding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 factor for tolerance, goo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russels: Council of Europe.
- Hunter, K., 1988. *Heritag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Studies*. Eric Digests.
- Hunter, K., 1992. *Heritage Education: What's going on out the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Lambert, C.A., 1996. *Heritage Education in the Postmodern Curriculum* (Unpublished MSc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Sheppard, M., 2010. *Difficult histories in an urban classroo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 Savenije, G. 2014. *Sensitive History Under Negotiation: Pupils' Imagination and Attribution of Significance While Engaged in Heritage Projects* (PhD Thesi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Van Boxtel, C., Klein, S. and Snoep, E. (Eds.), 2011. *Heritage Education: Challenges in dealing with the past*. Amsterdam: Erfgoed Nederland.

- 波多野想，2015，明治30年代瑞芳及金瓜石礦山之設施與空間配置的實際狀態。黃金博物館學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 姚誠，2000，從意識到認同：談臺灣鄉土教育的建構。課程與教學季刊，3(3)：1-16。

以博物館為管理平臺發展工業遺產旅遊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例・臺灣／金瓜石

Museum as the Platform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Jinguashi, Taiwan

蔡宗雄 Tsung-Hsiung Tsai
臺北市商業處處長

Director, Taipei City Office of Commerce

蘇憶如 I-Zu Su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摘要

1895～1987年近百年的開採發展，曾經是亞洲第一金山「金瓜石」，礦業停產後，經濟人口遷離，工業廠辦的遺構以及無經濟能力遷移的居民留在這被遺忘而式微衰敗的環境中；山城因為產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的移民因礦工職災病變、天然災害，而帶來了不同的信仰及生活民俗，且經歷了日治及戰後不同的社會型態，衍生出本個案多種居民於工業聚落共融生活的獨有樣貌。

為保存這礦山工業生產序列遺產及礦山居民生活的態樣，本研究冀能以臺灣第一個以生態博物館為管理平臺並發展旅遊經濟的個案「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研究主體，嘗試紀錄、了解本個案於2005年成立後，歷經10年的營運，政府、居民與觀光客之間的競合與合作關係，並探究如何在僅有1,300人口的工業遺址創造161萬人/年的遊客？及於2013年成為臺灣最重要的10大觀光特色小鎮的源起與經營的重要變革，提供發展工業遺產旅遊之參考。

關鍵字：生態博物館、工業遺產、住民合作、遺產旅遊、自明性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95 to 1987, Jinguashi was widely known as the most premium gold mine in Asia. However, following the close-down of the gold mines, the population who relied on gold-mining left. Only those deserted production sites and people who couldn't afford to emigrate remained in this forgotten and slowly decaying boomtown of yesterday. Back in its hay day, Jinguashi attracted a big amount of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due to the high demand of labor. On the basis of the abundant folk beliefs and customs brought by the immigrants,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Jinguashi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 as their forefathers attempted to fight against shaft disasters, mining related diseas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se historical factors together with the social influences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tim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ad turn Jinguashi a unique place where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origins settle down in this industrial town.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mining history of Jinguashi and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local cultu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Gold Museum, the first-ever ecomuseum that serves as a management platform to develop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local

economy. This research records the 10-year operation of Gold Museum which was founded in 2005 and the coopetition activities among government,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During the course, this industrial heritage with only 1,300 population experienced drastic transformation and has become one of Taiwan's top 10 tourist town (a survey result in 2013) that could attract 1.61 million tourists a year.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measures and changes conducted here as an exam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dustrial site tourism.

Keywords: Ecomuseum, historical industrial site, historical site tourism, identity

壹、緣起

工業遺產發展特色文化旅遊已成為國際重要趨勢，冀能兼顧遺產保護且達到公共教育與休閒娛樂的目的，近年來有很多案例是以博物館為平臺方式管理（Silberberg 1995）。例如英國 Ironbridge Gorge Museum 在面臨產業式微的過程中，保留部分舊有生產線廠房規劃為展場，既可降低開發成本也可維持原有的樣貌與特色，並串連周邊 Blis Hill Victorian Town 呈現維多利亞時期懷舊生活風貌，成功轉型發展文化觀光（JustinGreenwood 1990）。

英國於 1959 年召開第一屆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明確指出政府必須協助工業遺產研究，並應視為國家的歷史資產予以保護（MacNulty 1985, Herris 1989, Millar 1989）。1971 年法國的博物館學者 Georges Henri Riviere and Hugues de Varine 提出了“Ecomuseum”這個名詞，嘗試以博物館為管理平臺發展工業遺產旅遊（Silberberg 1995, Howard 2002, Kimeev 2008）。隨後，1973 年在英國 Ironbridge 召開第一個以工業遺產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並成立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簡稱 TICCIH。2003 年在俄羅斯 Nizhny Tagil 第 12 屆大會發表《下塔吉爾憲章》（THE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說明工業遺產的定義：「Industri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e remains of industrial culture which are of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rchitectural or scientific value. These remains consist of buildings and machinery, workshops, mills and factories, mines and sites for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warehouses and stores, places where energy is generated, transmitted and used, transport and all

its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places used for so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dustry such as housing, religious worship or education.」（TICCIH 2003）。敘明了在工業發展過程中所有為了工業活動建造的建築和構築物、工業生產過程、方法、技術與使用的工具，工業活動所處的城鎮背景以及形成的景觀，以及其他各種物質和非物質載體，都是組成工業遺產的重要元素（Davies 2004, Xie 2006）。

然而卻也有很多案例因為經濟無法自償獲利而關廠停產，廠房閒置荒廢，經濟人口流失，導致相關的工業生產過程、方法、技術不易保存，僅留下工業建築與構築物。近年來很多此類型的工業遺產被視為單純閒置空間再利用課題，常見以文化創意園區為管理平臺方式開發，隨著開放後新鮮感降低，產生了 serial reproduction 的危機（McKercher, Ho et al. 2005），而面臨參觀人次逐年減少的二次衰退窘境。因此，面對生產程序不易保存此類型工業遺產，如何發展文化觀光？亟需要藉由實際案例進一步探究。

本研究以臺灣第一個礦業工業遺產發展文化旅遊的金瓜石礦山為研究對象。本個案自 1895 年起以工業化方式生產金、銀、銅等貴金屬，直到 1987 年礦產枯竭停產，面臨經濟人口流失，房舍環境蕭條破敗的窘境。直到 1995 年政府為協助轉型發展文化觀光籌設「黃金博物館」，並於 2005 年開放，然而因為礦業生產過程、技術無法保存的狀況，開放第二年起，即面臨新鮮感消失，參觀人次逐年衰退的窘境。然而本個案歷經多次營運調整、變革後，2008 年迄今呈現參觀人次屢創新高的趨勢；因此本研究嘗試瞭解本個案近 10 年的變化歷程，希望能提供未來工業遺產發展文化旅遊的臺灣經驗及建議。

貳、研究方法與文獻回顧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政府與專家角色」、「社區與博物館關係」與「遊客參觀行為調查」進行觀察，主要透過下列方法：

2.1.1 資料分析

蒐集「工業遺產發展觀光」相關研究，比較各國的案例與本個案的差異；蒐集本研究個案的歷史文獻、政府及博物館的出版品與財務報表，藉以分析，瞭解礦業興衰背景，博物館的成立沿革及近來發展。

2.1.2 田野調查

金瓜石礦山建築、構造物現況調查，並針對當地耆老、意見領袖，以及博物館工作人員，藉以瞭解本個案發展的脈絡，近年來社區與博物館的關係變化。

2.1.3 問卷分析

以博物館 2006～2014 年所進行的 9,600 份「遊客參觀行為」問卷統計資料，分析遊客參觀行為及滿意度，並對照分析博物館營運財務收支及趨勢。

2.2 工業遺產發展觀光文獻回顧

回顧工業遺產研究中，許多案例是以工業遺產結合觀光旅遊產業的活化型態。例如 MINES AND QUAR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以英國威爾斯與西班牙的兩礦區案例比較研究，說明工業遺產發展觀光的四大面向為社會文化、運輸系統、生產程序及工業產物（Edwards 1996）；並依此四面向發展工業遺產旅遊，分析區域範圍的景點串連方式，並討論活化工業遺產發展觀光的機會及可能的衝突，惟此研究屬理論建構，較少討論實際執行的過程，較缺乏經濟與實際經營層面的討論。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說明相關 stakeholder and resident 也是轉型發展觀光成敗的重要因素（Perduce 1990, McKercher 1992, McKercher 1993, Dredge 2010, Daniel M 2013）。美國也有類似研究，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jeep museum in Toledo, Ohio，該個案指出縱使個案具有各種優渥的工業遺產發展觀光條件，然而過程中各種相關利益者意見的差異以及在地區民的認同參與度低，且缺乏有力可信的經營組織等因素，使得轉型發展觀光計畫，迄今仍處於規劃階段始終沒有落實（Xie 2006）。

2.3 以博物館為發展工業遺產管理平臺文獻回顧

1975 年法國的 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 是最早的個案，此個案包括 Le Creusot 和 Montceau-les-Mines 兩個城鎮，一個是製造軍火與火車的工業重鎮，另一個是產煤礦，產業相互支援發展。由於近來的產業衰退，為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結合在地一座十八世紀軍火 Schneider 家族的古堡為博物館總部，加上運河、煤礦、礦業學校、修道院、礦工住宅這五個衛星館周邊自然地景串連而成（Varine-Bohan 1973）。本個案創先將管理組織架構由傳統金字塔形式改變為扁平式，並引用社區人力採共同經營模式，由三個委員會共同管理：

一、Users' committee: 由不同社會專業領域、文化弱勢、社區文史團體組成，負責活動規劃及成果評量。

二、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ittee: 由博物館常設館員、講師、義工、專家學者所組成，負責研究、維護、展示等工作。

三、Management committee：由提供財源的地方政府部門、公私立企業或其它贊助團體代表所組成，負責財務與行政監督。

本個案具有創新實驗價值，但衍生委員會意見競合、衝突無法有效管理的問題。

同時期，在英國有 Open air museum、Neighborhood museum 等類似名詞，英國產生一系列社區或景觀博物館，之所以不想套用法國所創「生態博物館」的名詞，是因為英國在理念上，經營的客群對象不僅限於地區性，更希望提升到國際性，以經濟性考量吸引觀光客及外來投資，除了將文化資產及文化景觀加以保存維護外，還需要致力於對外營運開放，博物館除了服務社區，更重要的是吸引外地觀眾，才能創造足夠的營收，保證永續存活（Alfrey 1993, B, B et al. 2010）。以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 為例：「museum of fragmented nature that sought to tell a holistic story」（Alison J. Beeho 1995）。因此經營的客群對象不僅是國內地區性旅遊，更希望提升到國際性的層次，並藉以吸引外來投資（Millar 1989, JustinGreenwood 1990）。

無論是 Ecomuseum 或 open air museum，其共同的精神是「權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改變從「上而下」的策展方式，其目標在於協助辦理與社會文化、生態有關的計畫，這些計畫包括大規模的社區參與，維護社區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讓它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ossons 1989, Kimeev 2008）。

2.4 文獻回顧小結

回顧既往研究，普遍認為工業遺產是一種重要的旅遊資源，但是不當的管理及消耗終將枯竭，目前國際上有很多案例是以保留部分工業生產程序、廠房改建，串連周邊特色景點並獲得 stakeholder and resident 認同參與方式開發成功的案例；然而，有很多工業遺產因為無法保留工業生產程序、產

物，至相關保存與觀光活化計畫始終無法落實；目前仍較缺乏面對無法保存工業生產程序狀況下，工業遺產轉型發展觀光的成功案例研究。

參、歷史背景與金瓜石礦山建設發展

3.1 歷史背景

本個案位於臺灣北端基隆山周邊腹地，是臺灣最重要的貴金屬產地，由稜線畫分為西側九份（瑞芳）、東側金瓜石分屬兩大不同單位開發而來的礦區。臺灣於 1895 年中日戰爭戰敗割讓予日本，日本政府隨即展開礦山的規劃與開採，金瓜石礦區以工業化方式生產大量金、銀、銅等貴金屬，並於 1933 ～ 1945 年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經營期間產量達到最高峰，因此有「亞洲第一金山」美譽。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撤退，由臺灣政府接管礦區經營至 1987 年，因礦脈枯竭而停止開採，人口大量遷出，因此保存了二次大戰後山城聚落的懷舊風貌。

這樣的景觀吸引了臺灣電影導演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並於 1989 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因為片中出現許多九份礦區背山面海，眺望臺灣東北角海岸線層層山景沒入海面的特殊景觀（圖 1），以及金瓜石礦山樸實山城聚落景色（圖 2）。並陸續吸引一系列以樸實山城為背景的电影、廣告來此取景拍攝，也帶來體驗電影場景的觀光遊客。

隨著遊客增加，位於西側的九份，因為聯外交通較為便利且地勢背山面海，遙望無敵海景，長期由私人企業「臺陽礦業」主導開發，採礦及土地管理採層層分包利益共享的管理方式，因此承租居民擁有較高自主權，利用區域內屋頂櫛比鱗次山城



【圖 1】海岸線層層山景沒入海面的特殊景觀

巷弄特色建築（Huey-Jiun Wang 2014），沿街面投資開設茶藝館、餐飲、民宿、紀念品特色商家等，近 25 年來已逐漸發展成臺灣重要的山城海景熱門觀光景點。但因為過於商業化的開發，有許多人認為逐漸失去原有礦業山城的景觀風貌，十分可惜。

由九份向內延伸約 15 分鐘車程，翻越基隆山到達東側的金瓜石礦區，三面環山北面臨海，金礦產量豐富，長期以來歷經三家日本企業及臺灣政府公營企業化方式經營，以機能分區建設廠房、醫院、學校等社會福利設施及階級分明的宿舍區，經過近百年開採，因富礦脈逐漸枯竭致增加開採成本，逐年虧損終至破產，於 1987 年停止開採。相關的資產、土地清算後交由其他主管電力、糖業的國營企業代為管理，對該地區長期採限建、限制開發方式管理，因此該地區僅開放以整修舊建築物方式使用。因此在前述電影出名後，外來遊客及投資較集中於九份地區，金瓜石因為土地採保守管理方式缺乏投資經營者，且居民不擅長商業經營，致整體環境日益蕭條。

為改善日益式微的社區環境，1992 年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計畫，主動出資邀請專家進駐社區教導居民進行環境資源的盤點調查與紀錄，並進行老照片及口述歷史、故事徵集的工作，藉此過程



【圖 2】金瓜石礦山樸實山城聚落景色

逐漸凝聚居民對未來發展的共識，了解轉型發展礦業旅遊的重要性。經過三年的專家輔導及社區營造工作，居民們希望避免重蹈九份較商業化的發展模式，希望能參考英、法等國家的經驗，成立博物館發展工業遺產旅遊。因此，居民們主動遊說政府設置博物館，政府於 1995 年開始著手籌設「黃金博物館」，並於 2002 年將九份及金瓜石礦區周邊腹地擇定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水金九礦業遺址」，主動出資修復金瓜石礦區內保存狀況較佳的礦業建設，供做博物館核心館舍，並於 2005 年對外開放。

3.2 金瓜石礦區建設

礦區在日治期間（1895-1945 年）歷經三間日本企業所經營，在 1938 年間黃金產量達到最高峰，因此礦區主要建設多半於日治期間完成。金瓜石礦山主要有九個坑道（Pei-Chun 2011），從高程最高的為一號坑，數字的順序代表高程依序由高向下，一～四號坑因為以露天開採方式致相關設施遺構已不復見，另八、九號坑高程低於海平面之下，沒有地面建設，因此目前的遺址主要分佈在五～七號坑周邊腹地範圍（圖 3）：

A. 採礦作業區：一～四號坑露天開採區及五～七號坑道口、坑口辦公室、沖洗間、空氣運送壓風機。

- B. 宿舍及礦工住宅：所長宅、第一招待所（太子賓館）、幹部宿舍（二、四連棟）、游泳池、俱樂部（食堂）、洋式招待所（煉金樓）、監工宅（長街屋）、臺籍礦工宅、外勞工寮、戰俘營。
- C. 交通運輸系統：汽車公路、濱海鐵路、輕便鐵道、斜坡索道、架空索道。
- D. 基礎福利設施：總辦公室、中央供應社、學校、運動場、醫院、警察局、郵局、集會堂（電影院）。
- E. 主要加工區：碎石、選礦、鍊礦、化驗、沈澱採集、電力變壓等廠房、中央倉庫（機械、木工場）。
- F. 礦業地景：陰陽海與黃金瀑布、廢煙道、水圳系統、廢石丘、礦業相關的其他設施：祈堂商店街、火葬場、淨土宗社、神社、寺廟。

高程居中的五號坑是最主要的幹道，內部經過豎坑可貫穿其他各坑道，是設備與人員出入主要通道，因此在坑口周邊闢建礦山行政管理中心、階級分明的職員宿舍區、接待外賓的洋式招待所、休閒娛樂的俱樂部及警察局、郵局等基礎設施，向下延伸連接日籍學童之小學校（elementary school）、醫院、中央供應社等社會福利設施，向下連接臺籍礦工住商混合的市街（祈堂街）與礦工住宅群、臺籍學童為主之公學校及臺籍礦工信仰中心廟宇（勸濟堂）。

此外，利用高空、斜坡索道系統向下串連六坑及七坑口附近地區（今水湳洞），規劃為加工鍊製區，包括：碎石、選礦與鍊製等加工廠房及辦公室、宿舍與供應社等福利基礎設施，連接濱海鐵路系統通往基隆八尺門港口，運送出海赴日本精鍊。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臺灣政府成立臺灣金屬礦業公司接管相關廠房設施，大部分沿用日本企業的建設，相關環境樣貌並無太多改變，僅於 1971 ～ 1973 年間，為了改善鍊製廠產生廢氣（二氧化硫），故興建三條（每條約 1km）沿山稜線向上至本山頂排煙道遺址，形成特殊礦業文化景觀。上述的礦山樣貌於 1987 年停產結束營業後，封閉了廠房、辦公室、宿舍，其它基礎社會福利建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漸損壞，人口大量外移，剩下老人與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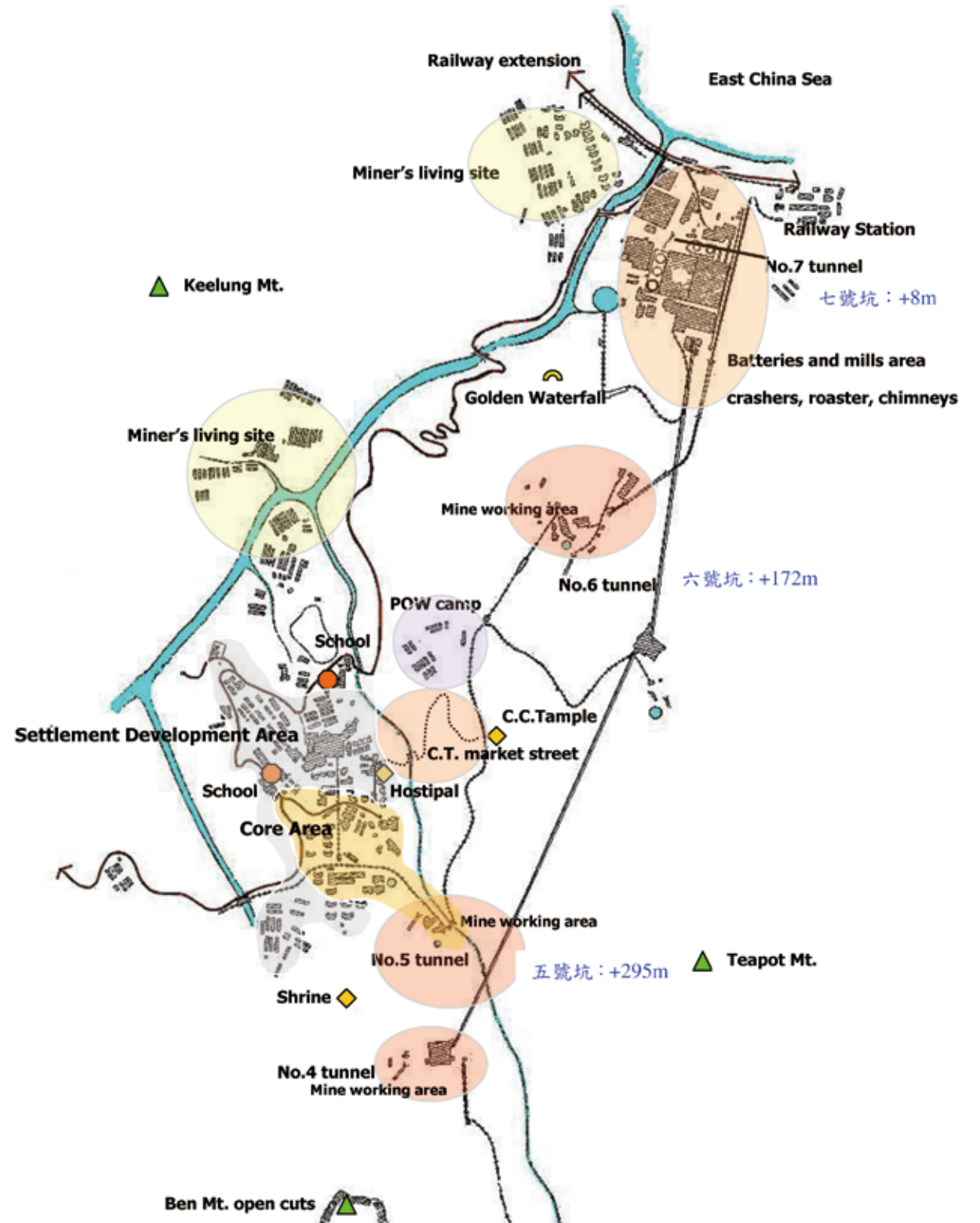
3.3 博物館籌設與開放

基於前述 1992 年間的社區營造工作，衍生後續 1995 年居民主動遊說政府規劃黃金博物館，2002 開始修建區內五坑周邊保存狀況較好的建設，成為博物館核心區主場館「黃金館」及五間衛星館舍，博物館於 2005 年正式對外開放。

主場館「黃金館」是由舊有礦場辦公室改建而成，內部展示了曾創金氏世界紀錄的第一大金磚（220.3KG）提供遊客體驗觸摸，並附設典藏品庫房及淘金體驗區（圖 4）。

「礦坑道展示館」，是以五坑既有舊坑道修復而成，是臺灣唯一對外開放觀光的礦坑道，長度約 200M，除了呈現礦場內礦脈的地質紋裡，也搭配模型呈現礦工鑽孔、引爆等礦場生產程序（圖 5）。

毗鄰上述礦區的「第一招待所」，原本是接待礦山貴賓的空間，修復完成後為臺灣少見保存完整的高級日式庭園建築，傳說是為了日本裕仁天皇訪臺所準備的臨時行館，所以又稱太子賓館，因為興建規模的稀有性，於 2007 年指定為市定古蹟。



【圖 3】金瓜石礦山配置圖



【圖 4】主場館「黃金館」由舊有礦場辦公室改建而成

繼續向下連接，「二連棟」為高級職員住宅區，區內多數為木造建築，無人使用後逐漸頹壞，大多僅剩建築臺基與磚造圍牆，目前以仿舊方式重建，提供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以「打工換宿」的方式進駐創作，藝術家提出駐村期間與居民、遊客互動的創作計畫，藉此以裝置藝術等方式妝點社區街道巷弄空間。

位於職員宿舍區中心設有磚造建築「俱樂部」，原是提供職員舉辦慶典、聚會、員工休憩交流的空間。為配合博物館開放需要，整修改建為「環境教育館」，內部展示在地特有的植物、礦石、地質剖面、礦場模型等，主要搭配教案提供學童校外參觀使用。

位於俱樂部旁設有二層磚造建築「洋式招待所」，日治期間原提供外賓住宿使用，臺灣政府接管後曾作為煉金工廠、銀行使用，因此也稱做「煉金樓」，目前一樓規劃為數位媒體的小型劇場，以模擬動畫方式介紹礦工採礦、娛樂消費的一日生活樣貌，二樓則為特展室。

「四連棟」位於二連棟宿舍區外圍，原提供為中階職員宿舍使用，為核心區內唯一臨街面保存狀況較佳之木造建築，整修後以恢復早期職員宿舍



【圖 5】「礦坑道展示館」為本山五坑既有舊坑道修復而成

生活的陳設方式開放參觀：第一間提供遊客體驗日式空間，拍攝婚紗、電影、廣告使用，第二間佈置為放映室，播放「四連棟」修復過程紀錄片、第三、四間分別為日治、戰後時期生活家具陳設，藉此呈現不同文化的生活樣貌。

上述博物館核心區開放初期，隨著遊客到訪，毗鄰職員宿舍區的舊商店街（祈堂街）開始有返鄉的居民或外來的新住民以修繕方式經營民宿及其附設咖啡廳、小吃店。

肆、博物館開放後的經營變革

博物館籌備期間致力於核心區場館修復，鮮少與社區互動，因此開放後第一年雖有 92.4 萬遊客，隨著新鮮感降低，前四年遊客逐年減少，因此博物館即著手調整經營方式，歷經幾次重要變革。

4.1 核心區周邊附屬性商業設施招商變革

博物館規劃初期，為減輕財政負擔及增加居民就業機會，博物館參考英國活化工業遺址案例，企圖將所需附屬商業設施以營運期 20 年方式招商委外經營，因此將核心區周邊頹壞的宿舍、醫院所在地，規劃為 132 房的日式飯店、3 間附屬餐廳

及 1 間文創商店。然而外來資金的投資造成居民經營的民宿、餐飲店受到衝擊，影響居民好不容易重新建立的生計。因此招商過程中屢遭受居民抗爭，致開館初期博物館與居民呈現緊張關係，且面臨 2007 ～ 2008 國際經濟危機，因此多次流標。

招商失敗後，2009 年起政府重新調整招商規模與內容，並承諾居民不再經營旅宿業，將原大型招商計畫分割成數個小型招商計畫，經營創意市集、文創紀念品、特色餐飲、DIY 體驗等，使當地居民也有機會可以承包，其後陸續開放有礦工食堂、山頂豆花、金采賣店、金水茶坊、鍊金咖啡、礦山冰館等特色店鋪，而其中「礦工便當」與在地居民承包的「山頂豆花」是近年來遊客到訪人氣最高的兩項特色餐點。隨著遊客增加，吸引返鄉及新移民與居民合作經營民宿及附設餐飲、紀念品店鋪，博物館與居民關係也逐漸改善。

4.2 博物館參觀售票經營管理方式的變革

核心區開放初期以售票並設置柵欄、管制點的方式經營，2008 年政府為鼓勵民眾參觀博物館，藉此促進區域經濟，改以免收門票方式經營，取消核心區周邊柵欄與管制點，毗鄰核心區周邊居民可以自由進出，也因此原有礦區之居民生活動線也得以恢復，於是居民住屋逐漸改變為店鋪，經營民宿及附設餐飲、紀念品店鋪，博物館與社區空間界線逐漸模糊，這些店鋪也以復古的風貌進行裝修，藉此吸引遊客消費，遊客開始川流於民居巷弄，博物館也開始在民居巷弄設置標示、解說牌、整修地坪鋪面、開辦社區課程，與社區逐漸形成夥伴關係，居民也投入社區導覽工作，而成為博物館穩定的志工。

4.3 推動社區金屬工藝產業方向的變革

初期本來為協助居民轉業，2005 年開始博物館嘗試引進金屬工藝技術，輔導在地產業轉型成為金工特色聚落，因此設置金工教室開始金屬工藝課程，讓居民可以進行金工文創工作，並於 2007 年起每兩年辦理全國的金工比賽。

由於該地區原屬貴金屬原礦產地，居民多屬勞工階級，百年來並無金屬工藝技術，且周邊並無相關產業環境，以致初期社區金工基礎人才培育後，反而離開社區往都市尋求發展，對地區經濟及觀光並無助益，因此相關課程自 2011 年暫緩辦理。

原為帶動地區經濟所引進的社區金工產業，已轉型為舉辦金工比賽，博物館於 2014 年策劃展覽將歷年比賽得獎作品赴日本金澤市展出，2015 年並擴大為國際賽事，將比賽提升為亞洲區最重要的金工國際賽事，藉此提升國際知名度成為博物館經營的另一項特色。

4.4 策展模式與典藏品政策變革

開館初期，展示以專家策展方式陳述礦山採礦歷史策劃常設展，隨著新鮮感消失，遊客逐年銳減。由於博物館與社區關係益增，2008 年博物館主動辦理以社區居民、民宿業者為主要參加對象的社區課程，透過定期聚會聯繫鄰里感情，規劃包括環境生態、民俗儀式、特色餐飲、文化資產、民宿經營等專題課程。另並以課程學員為基礎成立了博物館志工隊，2009 年起由志工自治團體負責規劃社區課程，擴大志工招募從事小型活動規劃與社區導覽工作。

近年來隨著社區志工參與博物館的活動日增，博物館也更加了解居民生活，並發現在地特有礦業的生活禮俗、祭典的多樣性，因此博物館開始調整策展方式，改以注重在地特有礦業生活，結合社區既有節慶活動能量與社區合作策展。另也調整藏品蒐藏方向，由初期的採礦產機具、工具、貴金屬飾品，逐漸轉向蒐集社區耆老口述歷史的調查、信仰儀式、風俗習慣、飲食文化等在地特有無形文化財的紀錄影像，並結合居民既有自辦的民俗節慶活動週期，規劃全年度的展覽活動，並與社區合作規劃相關教案、演講、遊程、表演、特展等系列性活動，藉以串連核心區周邊廟宇、神社、廢煙道等礦業地景及特色民宿。

此外，並鼓勵遊客透過 3C 載具將個人參訪博物館與體驗特色民宿的經驗上傳分享到博物館展場內影像平臺，透過 FACEBOOK 等社群軟體即時與展場內其他遊客互動，藉此更新展場內資訊並即時呈現周邊景點狀況。

4.5 博物館與地方居民的合作

隨著上述的變革，與居民互動日益頻繁，毗鄰核心區民宅開始模仿核心區建築風貌，進行整建並經營民宿、特色餐飲與紀念品店，博物館與社區界線逐漸模糊，居民也擔任博物館穩定的志工，因此有很多面向合作的可能性。

4.5.1 金瓜石媽祖遶境

礦山有高職災風險且多移民的特性，因此衍生出多元的信仰及風俗，以「媽祖信仰」為例，源自於中國沿海漁民，具有祈求出海平安收穫豐碩的意義，但隨著礦工移民播遷來臺，媽祖的庇佑範圍擴大到財運、健康、平安等，每年的農曆 3 月 12 日是媽祖的生日，礦山的居民們會以扛神轎方式通

過主要的巷弄、民居，象徵來年神明庇佑的意義，因為礦山的特有山勢地型，造成神轎人龍隊伍川流於山城狹窄巷弄的特殊景象（圖 6），堪稱為臺灣最艱辛的遶境活動。

此禮俗歷年來都由居民主動籌辦，礦區關閉後遶境路線也不再經過荒廢的廠區。博物館開放後隨著與居民的互動益增，2008 年起博物館主動邀請居民將遶境路線規劃穿越核心區主要幹道，嘗試恢復舊有礦區遶境路線，近年來博物館已成為約定成俗遶境必經的第一站，核心區幹道兩側腹地是遶境過程中唯一可供遊客聚集停留拍照、鑽神轎的開闊場域，因此很多遊客於前一晚入住周邊民宿以方便參與盛事。過程中周邊民居、民宿業者會提供免費的特色餐食、甜點讓遊客補充體力，遊客藉由參



【圖 6】媽祖遶境的神轎人龍隊伍川流在山城狹窄巷弄的特殊景象

與儀式過程祈求來年的平安，而過程中博物館協助側拍記錄、拍照、訪談耆老了解山城媽祖遶境的特色與意義，透過網站、展示等方式宣傳，經過觀察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外來遊客參與趨勢，遊客以鑽神轎祈求平安或徒步方式跟隨神轎遊行，穿梭於山城民居巷弄，隨著地勢狹窄且高高低低，形成特殊人龍穿越山城的景象。

4.5.2 關公節一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

臺籍信仰中心「勸濟堂」在每年農曆 6 月 23 日辦理關公生辰慶典「關公節」，對居民有象徵結拜兄弟相互照應來年平安的特殊意義，也成為在地重要返鄉團聚的日子（圖 7）。此外，日治時期為祈求採礦順利，依照日本習俗於礦山至高點設置金瓜石神社，後於 1933 年改建於五坑上方約 580 公尺處，每年聯合臺籍信仰中心勸濟堂舉辦山神祭典，是山城全年唯一的休假日。

二次大戰日本撤退後，神社被視為日本統治下的產物，臺灣大部份神社被摧毀移除，由於金瓜石神社位置附近仍留存有參拜道階梯、鳥居、石燈籠、拜殿地坪、圓柱遺構，雖非完整，但卻是臺灣現存少數日治時期神社遺構，被指定為「市定古蹟」；惟囿於早期臺灣社會氛圍視日本殖民統治設施為禁忌，博物館開放初期僅以遺構參訪方式設置靜態標示、解說牌，並未積極活用。

近年來透過社區耆老口述歷史調查，了解居民在求學過程經常需要登上神社集會，鳥瞰整座礦山，已是居民集體記憶的重要地標。隨著社會風氣改變、仇日情緒漸緩，博物館於 2011 年起嘗試結合在地「關公節」慶典，並延續活動精神舉辦「一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鼓勵遊客邀請好同學、朋友、姊妹淘、同學、死黨一起攀登金瓜石

神社遺址，過程中博物館與居民以行動劇方式嘗試恢復日治時期祭典樣貌，讓遊客體驗拍照，並於攀登神社遺址後團體合影，頒發象徵友誼長存的結緣證明；經觀察近三年遊客參加狀況，很多遊客會於前一天參加居民舉辦的關公節餐宴並居住於周邊民宿，隔日參加博物館辦理的攀登神社活動。博物館經過兩年的紀錄及研究，2014 年也特別配合於活動期間推出「山神祭典」特展，陳述過去多元族群共同居住於礦山的信仰及特殊生活樣貌，也因此造就「關公節」前後周邊民宿一房難求的盛況。

4.5.3 金瓜石 1942 追思紀念會

1942 年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殖民政府因害怕臺灣地方意見領袖與中國反日勢力勾結，因而展開逮捕地方仕紳，思想控管避免滋事之行動，礦區內重要的領袖人物均遭受逮捕、凌虐或甚至死亡，受害犧牲者約三十餘人，因為都是礦產重要菁英，因此造成礦產驟降，此事件雖然對當時礦山聚落社會造成嚴重衝擊，但因為發生在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政權移轉政治動盪不安時期，相關政治、人權問題為社會禁忌，居民習慣壓抑忌口。近年來博物館透過瓜山國小（公學校）校友會合作，利用校慶校友返鄉期間進行此事件口述歷史調查，並於 2012 年由社區居民主動完成專書出版工作，因而引發各界關注。



【圖 7】博物館結合在地關公節慶典，舉辦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

為了紀念此人權事件相關礦山菁英受難者，居民捐贈 15 公噸的金礦原石給博物館，博物館也藉由礦石捐贈儀式於博物館核心區內設置「1942 金瓜石人權事件紀念花園」，提供花園式的戶外展場，並輔以社區志工的解說，藉由金礦原石的雕塑物及花園陳設展示提供遊客追思，型塑戶外人權主題展場，並自 2014 年起，於每年 6 月第二週六舉辦「人權和平音樂會」，邀請居民現身說法還原事件原委及對後代生活的影響，並開放遊客報名參與體驗，強調寬恕面對過去傷痕的和平意義。

伍、參觀人數、營運財務與問卷統計資料分析

博物館自 2005 年開放，本研究利用官方參觀人數及財務報表資料，統計 2006 ～ 2014 年間 9,600 份遊客問卷，分析歷年來的營運概況及趨勢（表 1）。

5.1 參觀人數與營運收支

2005 ～ 2008 年開放前四年，因為著重於館舍的修復整備及附屬商業設施招商，博物館與社區顯少互動，甚至因為招募企業經營附屬商業空間，致博物館與居民關係緊張；且因為第二年起面臨遊客新鮮感降低，遊客逐年遞減窘境。2008 年起縮減招商規模，改變成數個小型特色餐飲、紀念品、DIY 教室，且承諾不再經營飯店，由社區提供特色民宿方式營運，並取消核心區動線管制，採免票與社區合作方式經營後，參觀人數明顯自 2009 年逐年成長 31%、17%、14%、7%、21%。

分析歷年營運支出情形，2005 ～ 2008 年營運支出平均每年約 7,930 萬元（106 元 / 人），2009 ～ 2012 年調整招商方式並納入核心區，周邊

社區民宿採與民居合作方式營運後，支出平均每年約 11,765 萬元（111 元 / 人），2013 ～ 2014 年隨著與居民合作模式日益頻繁，參觀人次穩定增加致外來投入社區經營特色商店與民宿增加，營運支出開始下降，平均每年約 10,075 萬元（68 元 / 人）。

在收入方面，2005 ～ 2008 年以門票收入為主，平均每年約 3672.5 萬元，開放第二年起隨著參觀人數遞減而逐年下滑。2009 年起，隨著改變與社區合作的營運方式，主要收入改變為 DIY 體驗（淘金、坑道）課程、紀念品銷售及各小型店鋪權利金，2010 年呈現谷底後，逐年成長 36%、24%、28%、24%；此外收支比雖然因為 2008 年起改採免收費方式致逐年遞減至 27.7%（2010 年），但隨著遊客逐季成長且各營運店鋪逐漸穩定後，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

5.2 遊客參觀行為及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蒐集彙整博物館官方 2006 ～ 2014 年「遊客參觀行為」9,600 份問卷統計資料如表 2，藉以分析遊客參觀行為及滿意度。

女性遊客較多約佔 66.1%，教育程度以大學以上為多數佔 67.5%，且近來有逐年升高趨勢，年齡集中在初入社會 26~45 歲及 19~25 歲大學以上學生族群佔 83%，國際遊客從初期 5.2% 逐年提升到 23.2%，有明顯增加趨勢。

有關遊客參觀資訊來源，2006 ～ 2010 年約 54% 主要透過口耳相傳獲知參觀資訊，近年隨著社群網站的發展，婚紗 / 電影協拍策略與社區合作影像行銷，2011 年起網路逐漸成為主要的資訊來源；此外，影像相關媒體如報紙、雜誌、電視也逐年升高，取代親友介紹口耳相傳方式。交通工具受限於

【表 1】歷年參觀人次及歷年收支 / 參觀成本表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參觀人次	924,390	793,263	664,694	665,479	874,479	1,026,248	1,167,203	1,252,415	1,339,683	1,617,309
收入 (萬元)	2905.5	4119.9	4069	3625.9	3146	994.5	1350.9	1679.2	2145	2659.6
支出 (萬元)	8100.1	7803.3	7337.4	8458.7	11048.9	12971.8	11162.7	11843	10485.6	9729.4
收支比	35.9%	52.8%	55.5%	42.9%	28.5%	7.7%	12.1%	14.2%	20.4%	27.3%
人 / 元	87	98	110	127	126	126	96	94	78	60

【表 2】歷年遊客參觀行為及滿意度分析表

		2006~07	2008~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性別	男	0.328	0.35	0.304	0.326	0.289	0.322	0.346
	女	0.644	0.65	0.663	0.674	0.711	0.668	0.654
年齡	18 under	0.116	0.09	0.102	0.095	0.071	0.073	0.065
	19~25	0.338	0.37	0.371	0.373	0.4	0.43	0.37
	26~45	0.44	0.46	0.436	0.459	0.447	0.441	0.481
	46~65	0.071	0.14	0.052	0.07	0.08	0.052	0.08
	65 above	0.026	0.08	0.02	0.03	0.02	0.04	0.04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0.084	0.06	0.036	0.049	0.041	0.027	0.03
	高中	0.185	0.16	0.13	0.135	0.147	0.091	0.098
	專科、大學	0.545	0.67	0.685	0.693	0.695	0.698	0.74
	研究所以上	0.094	0.11	0.118	0.122	0.117	0.184	0.142
國籍／居住地	外國籍	0.052	0.05	0.078	0.095	0.106	0.211	0.232
	臺灣	0.948	0.95	0.922	0.905	0.894	0.789	0.748
如何得知本館訊息（複選）	報紙、雜誌	0.283	0.27	0.17	0.247	0.41	0.398	0.411
	親友介紹	0.54	0.51	0.57	0.325	0.424	0.335	0.362
	電視	0.266	0.26	0.2	0.179	0.25	0.279	0.292
	網路	0.31	0.42	0.45	0.333	0.457	0.443	0.532
	其他（看板、廣播）	0.49	0.04	0.02	0.001	0.07	0.07	0.11
來訪交通工具	摩托車	0.051	0.07	0.07	0.056	0.044	0.042	0.041
	自有汽車	0.385	0.38	0.26	0.291	0.225	0.21	0.18
	遊覽車	0.153	0.07	0.05	0.095	0.136	0.18	0.18
	大眾運輸（公車、火車）	0.411	0.48	0.62	0.558	0.595	0.568	0.489
	金瓜石神社	0.247	0.28	0.25	0.163	0.204	0.309	0.401
知道的周邊景點（複選）	茶壺山	0.14	0.12	0.1	0.06	0.57	0.179	0.187
	勸濟堂	0.131	0.14	0.14	0.084	0.136	0.11	0.15
	基隆山	0.109	0.09	0.07	0.47	0.45	0.235	0.245
	九份	0.883	0.89	0.88	0.631	0.851	0.951	0.942
	水湳洞煉製廠區 / 煙道	NA	NA	NA	NA	NA	0.294	0.301
	無住宿需求	0.768	0.766	0.67	0.867	0.813	0.824	0.817
有隔夜住宿需求（民宿）	有住宿需求	0.232	0.234	0.33	0.133	0.187	0.176	0.183
	選擇九份周邊民宿	0.964	0.892	0.79	0.799	0.785	0.769	0.754
	選擇金瓜石周邊民宿	0.036	0.108	0.21	0.201	0.215	0.231	0.246
	滿意	NA	NA	NA	0.837	0.859	0.898	0.909
參觀博物館整體滿意度	普通	NA	NA	NA	0.112	0.138	0.099	0.088
	不滿意	NA	NA	NA	0.051	0.003	0.003	0.003

例假日塞車嚴重，53.1%為大眾運輸（火車、公車），且有明顯逐年攀高的趨勢，汽車及摩托車則呈現逐年遞減趨勢。

對於周邊景點的串連，發展較早的九份是到訪金瓜石公共運輸必經之地，因為外來投資熱絡朝向商業化發展，原有礦業發跡的特色逐漸被遺忘。近年來隨著博物館的開放，86.1%遊客會到訪九份且有逐年攀高的趨勢。此外，隨著「一起結緣、尋訪神社」、「媽祖遶境」串連周邊民宿規劃的健走遊程，使得周邊景點：金瓜石神社40.1%、基隆山24.5%、茶壺山18.7%、勸濟堂15%，也逐年呈現成長趨勢，藉由民宿規劃不同登山健走遊程，增加參觀山城的趣味及深度。

觀察遊客住宿需求及發展趨勢，歷年來平均21%到訪遊客有隔夜住宿需求，其中選擇博物館週邊民宿從初期3.6%逐年提升至24.6%（2014年），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係因近年來與居民合作策展行銷，陸續有「雲山水」、「緩慢」、「金礦山莊」等以自然健走、養身慢活、礦山藝廊等多元發展的特色民宿，區隔九份地區較商業化的市街民宿，因此近年陸續有返鄉、新移民投入民宿業的經營。此外，在整體滿意度方面，自2011～2014逐年自83.7%逐年提升至90.9%。

陸、討論

博物館開放初期策展內容偏重「上而下」專家策展方式，未能結合居民生活文化，缺乏在地特色，致前四年遊客逐年下滑，營運參觀單位成本逐年上升（80.9元/人、90.8元/人、101.9元/人、117.3元/人）的窘境。隨著遊客增加，收入也逐年成長，主要來自體驗課程售票、紀念品銷售與各

店鋪權利金；收支比自2010年的7.6%逐年成長為12.9%、14.2%、20%、27%，雖然仍較初期以售票為主要收入平均收支比46.6為低，但遊客明顯逐年成長，依據臺灣2013年官方旅客消費調查資料顯示，國內遊客消費1,293元/天，國外遊客7,282元/天（Bureau 2013），2014年148萬遊客將帶來約36億元的商機，對地區經濟活絡有明顯助益。

此外，隨著居民擔任志工參與博物館活動規劃並經營附屬商店，博物館營運支出自2011年起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並明顯減少每遊客單位成本，自每人102元/人下降至2014年65元/人，本個案相較於傳統博物館投入經費隨著遊客增長比例增加，明顯不同，個案中居民直接經營附屬店鋪並改善自宅環境提供遊客服務，以及對策展活動的認同，與近年所需營運支出減少、遊客倍增有密切的關係。

基於上述，2008年迄今博物館更積極尋求與居民合作方式，嘗試結合在地既有民俗節慶活動如迎媽祖、關公節串連博物館規劃的「義起結緣」攀登神社等活動，除了讓遊客實際參與在地礦山的特殊風俗民情外，更可藉由民宿、神社遺址以及展場內的歷史資料、生活器具、展品體驗拼湊當時礦山的樣貌。整體營運思考不僅著重於過去百年來礦業的歷史，更強調呈現在地特有的生活樣貌，透過民宿、特色餐飲感受在地特有人情風味，透過微電影、社群軟體的分享傳播，不同於傳統博物館扮演知識供給、支配角色。此外，這毗鄰的兩山城雖礦業背景相同，卻發展各自觀光特色（商業、文化）及互惠遊程，在九份可滿足遊客體驗傳統山城商圈、觀海景、品茗等消費性商業觀光需求；在金瓜石可探索礦業地景、歷史、特色民宿文化祭典，滿足深度文化體驗需求，有相互輝映加乘效應。

柒、結論

有越來越多的工業遺址嘗試轉型文化觀光以活化區域經濟，卻也經常面臨文化價值的真實性、完整性保存與觀光開發兩難的課題（McKercher, Ho et al. 2005）。各國嘗試以「博物館」為文化場域發展觀光的管理機制，然而「博物館」這個名詞源起最早仍是由當權者、專家以「上而下」指導式策展與活動設計，讓參觀者獲得經驗與知識的場域（Ertürk 2006）；近年來隨著「博物館」功能、需求的日益多元，進而出現了「下而上」的策展理念，強調在地性與地方特色的博物館，如法國的Ecomuseum，英國的Open air museum、Neighborhood museum等，然而博物館的財源與組織型態經常主導了博物館的策展史觀與角度，如何落實「下而上」的策展理念，而不致過於浪漫理想，實在需要一個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經驗。

本個案是臺灣第一個以籌設博物館並強調工業礦產遺址價值，進而發展文化觀光活化的個案。雖然，籌備初期仍是由專家駐點，以社區營造方式協助居民凝聚籌設博物館的共識，並由政府出資修復核心區建築，初期仍採「上而下」傳統博物館組織運作方式策展，相對於美國Jeep museum in Toledo個案（Xie 2006），有效的縮短博物館籌設到對外開放的時間，但展場陳設與活動設計卻與居民的期待有相當差距。2008年起博物館改變經營模式，拆除核心區管制柵欄恢復原有居民生活動線，並改變招商方式讓居民得以直、間接參與附屬商業設施經營，並擴大社區巷弄公共環境指標、鋪面環境清潔改善。遊客開始穿流於核心區與社區巷弄間，因而開始有返鄉、新住民以修繕臨街面民居空間經營民宿、特色餐飲。博物館並規劃社區課程方式提供居民諮詢、意見交流、分享平臺並藉此招募導覽志工，由志工主動規劃淨山健走、關公節、

媽祖遶境、1942追思紀念會等活動，博物館透過上述活動期間側拍紀錄、老照片的徵集與口述歷史調查，於次年活動期間在博物館展場配套策展，以特展方式說明民俗活動的緣起與居民生活的關係與意義，並與社區合作規劃消費體驗遊程讓遊客報名參與，藉此逐年減少政府挹注常設展更替，並逐漸轉變以社區人力、資金採合作經營模式，博物館與社區採伙伴關係逐漸落實「下而上」的策展理念，以發展礦區生活、地景特色為主軸之文化深度旅遊。

基於上述伙伴關係，居民們更加珍惜自處的環境場域價值，共同維護場域內的真實、完整性，並視為在地特有的生活樣貌與資產，遊客透過社區民宿、餐飲消費互動過程讓遊客體驗分享，並透過博物館製作的微電影、網站、3C搭配展場裝置、社群軟體等方式與遊客互動並宣傳。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經營方式歷經近十年的演化發展，居民從衝突抗爭等行為表達意見，博物館的角色已逐漸轉變為鄰居、伙伴關係，礦山的民居、生活樣貌逐漸成為主角，博物館扮演遊客服務、故事串連的配角，這模式與角色變化歷經多次的變革與滾動修正，成為本個案的策展營運特色。

此外，工業遺產發展觀光也經常面臨遺產價值保存與觀光開發兩難的問題（Bramwell 1993）。臺灣的世界遺產潛力點「水金九礦業遺址」範圍內的九、金兩座礦區，最初因為電影場景帶動了觀光發展，九份以依山望海的特殊山城條件，發展成觀景、品茗、消費為主的景點，雖滿足了遊客觀光娛樂的需求，卻可惜逐漸失去原有礦業山城遺址的樣貌。然而，隨著近十年來金瓜石礦區的發展，著重在呈現特有礦業文化生活經驗與懷舊樣貌，並有高達95.1%遊客會到訪九份，兩座礦區毗鄰卻發展迥

異，藉由景點的串連互惠發展，既可避免金瓜石礦山因觀光需求過度商業開發，可維持工業遺址的懷舊風貌特色，也補足九份地區因為過度商業化發展而缺乏礦業文化特色的窘境，因為九、金兩地礦山的發展迥異，形成特有的對比趣味。近年來許多遊客透過兩礦區的串連遊程規劃，互補需求且互惠發展，進而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遊客到訪，呈現九、金兩地相互輝映、互惠觀光效應加乘的現象，造就了歷年來參觀人次屢創新高，於 2013 年由臺灣官方票選成為臺灣十大特色觀光小鎮，本個案儼然成為以博物館發展工業遺址旅遊的重要經驗。

參考文獻

- Alison J. Beeho, R. C. P. (1995). "Evaluating the experiences and benefits gained by tourists visiting a socio-industrial heritage museum: An application of ASEB grid analysis to blists hill open-air museum,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 United Kingdo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4(3): Pages 229-251.
- Cossons, N. (1989). "Heritage tourism : trends and tribulations." *Tourism Management* 10(3): 192-194.
- Daniel M, C. N. (2013).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mmunity support for tourism: A case study oof a heritage fish hatchery." *Tourism Management* 34: 221-230.
- Davies, P. (2004). *Ecomusum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 Dredge, D. (2010). "Place chan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lict: evaluating public interest." *Tourism Management* 31(1): 104-112.
- Edwards, J., & Lurdes,J. (1996). "MINES AND QUAR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 341-363.
- Herris, F. (1989). For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heritage Industry. *Geographical Magazine*. 61: 38-42.
- Howard, p. (2002). "The eco-museum : Innovation that risk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8: 63-72.
- Huey-Jiun Wang, Hsiao-Wen Sung, Chin-Chung Chen (2014). "The Cunstruction and Decelopment of the Ruifang Min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2 (2): 22-35.

- JustinGreenwood, A. W. a. G. (1990).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ourism in the UK." *Tourism Management* 11(1): 53-62.
- Kimeev, V. M. (2008). "Ecomuseums in Siberia as Centers for Ethn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5(3): 119-128.
- MacNulty, R. (1985). "Revitalizing industrial cities through cultural tourism." *International Journai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5: 225-228.
- McKercher, B. (1992). "Tourism as a conflicting land use: Northern Ontario's outfitting industr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3): 467-481.
- McKercher, B. (1993). "Some fundamental truths about tourism: Understandingtourism's soci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1): 6-16.
- McKercher, B., et al. (2005).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26(4): 539-548.
- Millar, S. (1989). "Heritage management for heritage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10(1): 9-14.
- Pei-Chun, L. (2011). "From Mining Industry to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oastal Mountain Settlement Jinguashi." Submitted to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ster: 182.
- Perduce, R. R., Long T., &Allen, L. (1990). "Resident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7: 586-599.
- Silberberg, T. (1995). "Cultural tourism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museums and heritage sites." *Tourism Management* 16(5): 361-365.

- TICCIH (2003). THE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NIZHNY TAGIL.
- Varine-Bohan, H. d. (1973). "A 'fragmented' museum: 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 *Museum International* 25(4): 242-249.
- Xie, P. F. (2006).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jeep museum in Toledo, Ohio." *Tourism Management* 27(6): 1321-1330.

硫砷銅礦的發現與金瓜石礦山

Discovery of Enargite and Jinguashi

駱淑蓉¹ Shu-Jung Lo

摘要

明治 37（1904 年），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從此由金礦山轉為金銅礦山。硫砷銅礦是一種什麼樣的礦石？它在金瓜石礦山的分布情形如何？它的製煉方式與一般的金礦石有什麼不同？明治、大正年間的金瓜石礦山，因為硫砷銅礦的發現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本文擬透過礦業史料中對於硫砷銅礦發現的記載，回顧明治與大正年間的金瓜石礦山史。內容包括硫砷銅礦發現的源起、本山礦床與第一長仁礦床的異同、硫砷銅礦的特色以及臺灣總督府與日本礦物學界所做的調查報告，等等。

關鍵字：硫砷銅礦、金瓜石礦山、濕式製煉、乾式製煉

Abstract

In the 37th year of Meiji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1904), enargite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Jinguashi. This discovery had turned Jinguashi not just a gold mine but a gold-copper mine since then. What is enargite? What is enargite's distribution in Jinguashi? How is the enargite refining method different from the refining method of gold? What kind of changes did the discovery of enargite br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Meiji and Taisho (from 1895 to 1925)?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view the Jinguashi's mining history during the Meiji and Taisho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overy of enargite. This article covers the discovery of enargi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enshan Tunnel and Changjen First Tunnel, characteristics of enargite and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s done b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xisted under Japanese rule) and Japanese mineralogists.

Keywords: enargite, Jinguashi, hydrometallurgy, pyrometallurgy

壹、前言

臺灣島上的硫砷銅礦，主要產於金瓜石礦山礦床，這是山金礦中較為罕見的類型，在硫化銅礦石中蘊藏著豐富的金與銀。金瓜石礦山因為硫砷銅礦的發現，由金礦山轉為金銅礦山，為了粹取礦石中的金銀及銅，必須改變製煉的方式，促使熔礦所的興建，以及乾式製煉法技術的革新。硫砷銅礦在日治時期，是臺灣本島代表性的礦石之一，除了稀少性，其豐富的礦藏量更是世界少見。

金瓜石礦山除了高品位的金礦享有盛名，硫砷銅礦礦床的發現，更讓金、銅礦產量開始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金、銀、銅礦的高額產量又與製煉方法息息相關。為了製煉這批礦石，礦山經營者逐年規劃興建精礦所、搗礦所、砂礦所以及泥礦所等選煉礦設施、鋪設運輸用軌道、架設空中索道等等，礦區景觀逐漸產生變化。

明治 28（1895）年日本治臺後，為有效掌握臺灣島的現況以及各項資源，積極進行各方面的調查工作，這也包括地質、礦產等資源的產業調查。以明治 29（1896）年臺灣總督府的官制為例，民政局之下設置包含殖產部在內的七個部；殖產部下則有包括鑛務課在內的四個課。有關產業、地質、礦物等調查工作，皆歸屬殖產部鑛務課。殖產部在明治、大正年間因為官制改革，名稱數次更改，但從明治 28 年到 44 年之間，在有限的經費與人力之下，間斷性地派遣所屬技師至臺灣各地進行礦山巡視以及礦物調查，以此實際踏查方式，終於逐漸掌握臺灣各地區地質風貌。特別是有關金礦、煤、石油、硫黃等具有經濟價值的礦物及產地現況。其調查結果可由每次調查結束後臺灣總督府出版的殖產部報文、巡視復命書或者調查報告得知，這也是認識日治初期臺灣土地與產業狀況極佳的第一手資料。

除了臺灣總督府所進行的官方調查，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地質與礦物學界，也對於臺灣這塊新版圖充滿興趣，他們有的是帝國大學地質系的教授，有的是受聘來臺為總督府工作的技師，皆具有一定的礦物學背景。藉由上述臺灣總督府的報告資料，或是親自來臺參與調查的機會，記錄下臺灣的地質、礦物特性，並採集珍貴的礦物標本。

本文擬藉由前述礦山調查報告，以及礦物學界的礦物標本紀錄等史料記載，回顧金瓜石礦山硫砷銅礦發現的過程，以及金瓜石礦山因為這個發現所造成的改變。

貳、金瓜石礦山硫砷銅礦的發現

一、明治大正年間的金瓜石礦山沿革

光緒 16（1890）年，清朝政府（簡稱清政府）進行基隆河七堵段²縱貫鐵路鐵橋修築時，有工人在河道中發現砂金，引起基隆河淘金熱潮。光緒 18（1892）年，清政府於基隆廳設置金砂總局，於瑞芳設立分局，金礦開採納入政府管理。光緒 19（1893）年，採金者溯大、小粗坑溪而上，發現九份的小金瓜露頭。並於隔年發現金瓜石的大金瓜露頭，以及大粗坑、小粗坑的含金層。光緒 21（1895）年，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仿清制於瑞芳設立砂金署。明治 29（1896）年 9 月，總督府律令第六號訂定「臺灣鑛業規則及其施行細則」，為免小資本業者濫採，遂指定大阪的藤田傳三郎以及東京的田中長兵衛，這兩位當時有名的大礦業家發給許可。由合名會社藤田組領取礦業許可礦區番號第 1 號瑞芳礦山，礦區面積 190 萬 3723 坪；田中長兵衛領取第 2 號金瓜石礦山，礦區面積 178 萬 6070 坪。並於次（1897）年著手礦山開發。（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讓，1900：38-55。）

¹ 任職於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研究助理，lu.shujung@gmail.com

² 筆者 2012 年曾向唐羽先生求證，部分史料所記載的“八堵鐵橋”應為七堵河段鐵路鐵橋。亦即今七堵變電所前橫跨基隆河的「昭和橋」（光復後更名為「大華橋」）下。唐羽，1985：123。

明治 31（1898）年，連培雲、周步蟾共同申請獲得礦第 178 號，取得牡丹坑 12 萬餘坪、尤枝申請獲得礦第 186 號，獨得 4 萬 5000 餘坪，雖然試掘舊坑但以失敗收場。明治 34（1901）年，頂得礦權的木村久太郎在武丹坑溪間發現新礦脈，自此銳意開發日漸興盛，是為牡丹坑金山。正式成為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與牡丹坑礦山三金山鼎立的狀態，俗稱「基隆三金山」（以下同）。（林朝榮，1950：32）

明治 34（1901）年，田中長兵衛過世，事業由其長子安太郎以二代目田中長兵衛名義繼承。明治 37（1904）年，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及第一長仁礦床，於明治 39（1906）年在水湳洞興建製煉用熔礦爐，並於明治 40（1907）年完工，從此金瓜石礦山開始以乾式製煉法製煉長仁礦床產出的硫砷銅礦。大正 2（1913）年 6 月，金瓜石礦山合併牡丹坑礦山，礦區更具規模。大正 7（1918）年，金瓜石礦山由二代目田中長兵衛擔任社長的「田中鑛山株式會社」繼承，由田中清任職金瓜石礦山所長一職。

大正 12（1923）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經濟低迷影響，金瓜石礦山因製煉用的配合劑（硫化鐵礦、石灰石）成本過高，遂停止本島唯一的乾式製煉，改將礦石賣給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在大分縣的佐賀關製煉所。大正 14（1925）年 12 月，後宮信太郎收買金瓜石礦山，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田中家族在金瓜石的經營，自此完全畫下句點。

【表 1】明治大正年間的金瓜石礦山與製煉所發展沿革 作者製表		
年代	礦山	金瓜石礦山
1896(明治 29)		總督府律令第六號訂定「臺灣鑛業規則及其施行細則」
		10.26. 田中長兵衛領取鑛業許可，礦區番號第 2 號
1897(明治 30)		10.15 著手採礦事業
1898(明治 31)		1. 開始金礦的濕式製煉法（混汞法） 2. 設置第一精礦所
1899(明治 32)		設置第二精礦所
1900(明治 33)		設置第三精礦所
1903(明治 36)		設置第四精礦所
1904(明治 37)		1. 開始併用濕式製煉的氰化法 2. 設置第五精礦所
1905(明治 38)		發現豐富的含金銀硫砷銅礦床
1906(明治 39)		1. 於水湳洞新設熔礦爐 2. 第二精礦所改為泥礦製煉所 3. 第五精礦所改為砂礦製煉所
1907(明治 40)		1. 熔礦爐興建完成，開始併用乾式製煉法製煉 2. 第四精礦所改為搗礦製煉所 3. 廢止第一精礦所
1908(明治 41)		廢止第三精礦所
1910(明治 43)		1. 開始收取第一長仁礦床的沈澱銅 2. 陸續發現第二、第三、第四長仁礦床
1913(大正 2)		田中組合併木村久太郎的牡丹坑礦山
1918(大正 7)		由「田中鑛山株式會社」繼承。
1925(大 14)		12 月，後宮信太郎收買金瓜石礦山，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

二、硫砷銅礦發現的經過

《臺灣鑛業會報》昭和 13（1938）年 3 月 30 日第 191 期，在〈雜錄〉內刊登一篇以〈金瓜石礦山硫砷銅礦發現的始末以及關係文獻〉為名的記載。內容敘述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Enargite）的時間、過程以及代表人物。首先介紹金瓜石本山礦床發現硫砷銅礦的經過如下：

明治 37（1904）年 4 月，當時擔任金瓜石田中礦山探礦主任技術員的安間留五郎氏，在本山三坑坑道內 151.5 公尺處，及其往下 30.3 公尺處的中段坑道內，發現石英礦脈中除了黃鐵礦之外，還有數處含有黝黑色銅礦成分的小結晶，因其數量有限，一開始並不以為意，但隨著坑道越往深處並向下掘進，其數量逐漸增多，即猜測可能是黝銅礦或硫砷銅礦。剛好該年 9 月，東京帝大工科採冶三年級學生阿部安積來臺實習，至瑞芳礦山與金瓜石礦山做調查，安間留五郎氏便委託阿部安積將此結晶採集帶回東京大學。阿部將此採集標本請教地質礦物學者神保小虎以及日本礦物學始祖和田維四郎兩位專家鑑定，經過化學分析與結晶面角測定的結果，確定為「硫砷銅礦（Enargite）」。神保小虎博士並於該年 10 月於地質學教室座談會上公開發表。（作者不詳，1936：88-91）

同一篇記載當中，也記錄金瓜石礦山第一長仁礦床發現硫砷銅礦的經過，內容包括兩段不同發現者的陳述，一般皆視後者為第一長仁礦床發現的開始，以下並列兩段發現的內容供參：

明治 37（1904）年 9 月，來臺做地質調查的東大實習生阿部安積，在金瓜石礦山停留調查期間有一天在礦山的職員以及第三氰化場主任高橋氏的陪同下，來到當時都是芒草與蕃薯田的水湳洞海岸處，隨手用鋤頭敲打路邊一塊石頭，發現仿佛含有金礦。

事後分析結果得知其含金品位³在 10ppm 以上。高橋氏得知後即向小松仁三郎所長報告，並建議進行探礦，可惜並未獲得認可。高橋氏便獨斷率領工人從該標本採集處往下挖掘，不到數公尺處便發現豐富的藍色炭酸銅，持續大規模探礦的結果，終於發現龐大的長仁坑硫砷銅礦礦床。（作者不詳，1936：88-91）

另一段陳述紀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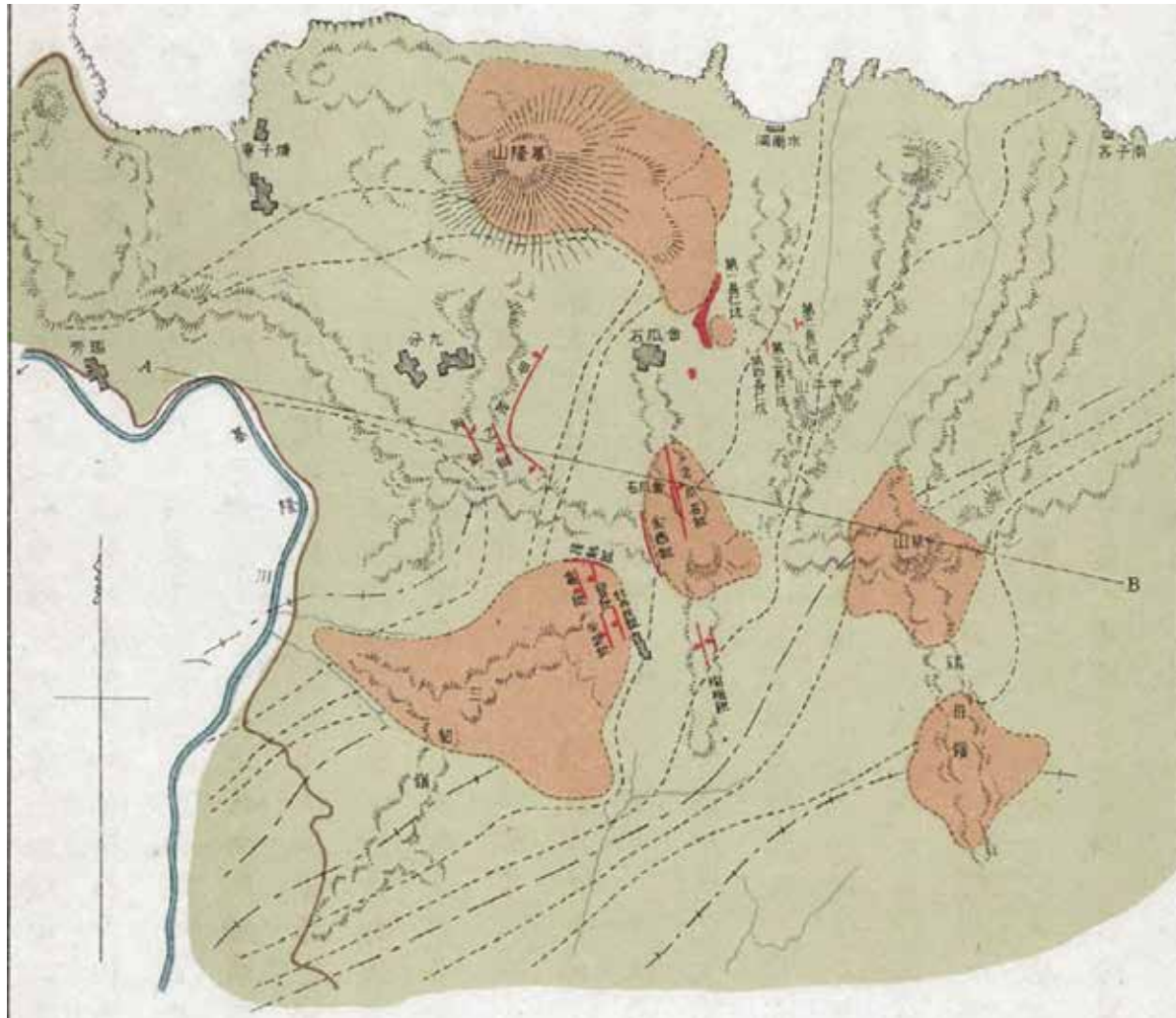
明治 38（1905）年 6 月中旬，前述金瓜石田中礦山探礦主任技術員的安間留五郎氏，帶領時任總督府礦務課課長的福留喜之助氏參觀礦山時，於金瓜石溪⁴北部小丘上發現類似石英的酸化礦石，經由福留課長的提醒，將礦石表皮剝下進一步調查，發現這個看似焦土的礦石中，存有石英的酸化礦，還有硫砷銅礦的粉狀物質交錯其中，經分析結果約有 10pp 的含金量，確定該區應為一豐富礦床的露頭。遂於同年 8 月從其北側向下 52 公尺處開鑿橫向坑道並往下掘進，果然發現龐大的硫砷銅礦礦床。便取金瓜石礦山礦主田中長兵衛姓名中的“長”及礦山所長小松仁三郎的“仁”兩字，命名此礦床為「長仁礦床」，該礦坑即為「第一長仁一番坑」⁵。（作者不詳，1936：88-91）

受到前述發現第一長仁豐富礦床發現的激勵，金瓜石礦山開始更積極探礦，明治 43（1910）年，又陸續發現第二、第三及第四長仁礦床。金瓜石本山礦床與第一長仁至第四長仁礦床分布情形，可詳參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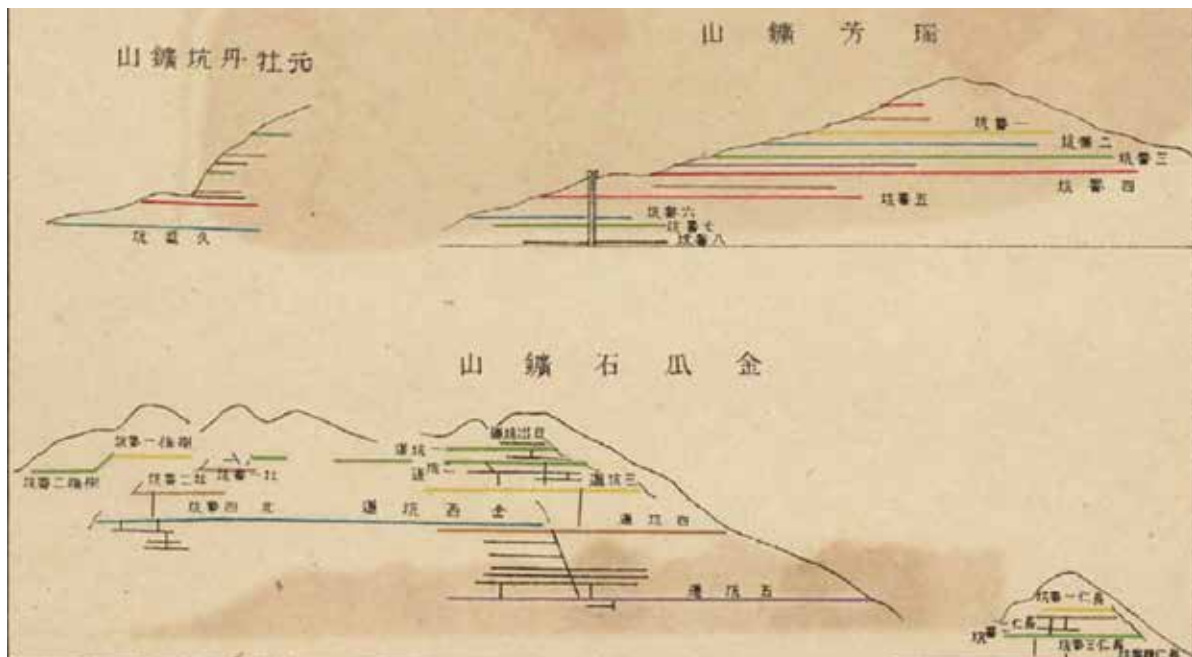
3 礦石的品位指的是礦石中有用礦物、金屬礦物的含有率，用來表示礦石的價值。1ppm= 百萬分之一，10ppm= 十萬分之一。例如：1 公噸的原礦中，含有 1 公克的黃金，其品位即以 1ppm 表示。根據 1911 年的紀錄，金瓜石礦山的最上礦含金品位約 612.5ppm，上礦為 50-117ppm，並礦為 15-30ppm，貧礦則為 2-3ppm。

4 唐羽先生在《臺灣採金七百年》一書提到此處的「金瓜石溪」應為齋藤讓〈視察報文〉中之內九份溪。唐羽，1985：117。

5 有關長仁礦床的發現，當事人之總督府礦務課課長福留喜之助，在昭和 12(1937) 年《臺灣時報》1 月號〈談臺灣礦業的黎明期〉一文中，也有詳細的描敘。



【圖 1】「金瓜石鑛山地質及鑛床圖」《臺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大正 15(1926) 年出版



【圖 2】「金山坑道平面及斷面圖」《臺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大正 15(1926) 年出版

三、本山礦床與第一長仁礦床的異同

本山礦床是金瓜石礦山最大的礦床，自清末光緒 20（1894）年本山礦床的露頭被發現後，到明治 30（1897）年田中組著手採礦事業初期，本山礦床的濫採情況不斷。明治 30（1897）年 1 月，田中組著手整理濫採坑口、規劃有秩序的開採方式，從海拔約 629 公尺⁶的金瓜石岩嶂近頂處開鑿本山一番坑，之後依序向下開挖二、三、四、五番坑。本山五番坑為本山礦床海拔最底的坑道，也是作為運輸、排水、通風等的主要坑道。本山礦床礦脈在三番坑以上屬於酸化礦帶，三番坑以下硫化礦物逐漸增多，金礦與銅礦開始同時產出，到了五坑附近已漸漸轉變為含金硫砷銅礦帶。

第一長仁礦床堪稱日本治臺後金瓜石礦山最重要的發現。第一長仁礦床露頭高度約為 360 公尺⁷，往下 52 公尺即海拔約 308 公尺處開鑿長仁一番坑，因由內部向上往露頭處大面積開挖，恐造成坑內坍塌，便以露天開採方式從坑外向下開採至一番坑位置，自此該岩嶂外觀完全消失。後來陸續往下開鑿長仁二番坑、三番坑及四番坑，四番坑的硫砷銅礦脈已和本山礦床的礦脈相通。可參考圖 2 以理解兩處礦床的斷面情形。

雖然本山礦床與長仁礦床皆發現硫砷銅礦脈，但前者礦床中的銅礦藏量不如後者豐富，所以並未大量開採。

參、硫砷銅礦的特色與製煉法

一、硫砷銅礦的特色與記載

硫砷銅礦在世界上屬於稀有且量少的礦物，多數產量僅足以作為採集用的標本。像長仁礦床這般數量龐大，且可不斷提供製鍊生產的硫砷銅礦藏量，在世界上實屬少見。它不僅是一種結晶極美的特色礦物，亦為具有經濟價值的有用礦物。

明治 37（1904）年，日本礦物學始祖和田維四郎出版《日本鑛物誌》，為日本礦物標本蒐集、記載之大成，當時臺灣島內的礦物調查尚未完整，臺灣產的礦石只記載「角閃石」與「風信子礦」兩種（岡本要八郎，1916：154），而日本內地也還沒有發現硫砷銅礦的紀錄。和田維四郎後來於明治 40（1907）年出版的《本邦鑛物標本》，被視為是明治 37 年版本的增修版，內容新增數種礦石，也包含臺灣產的「Enargite 硫砷銅礦」。和田維四郎歷年來所蒐集的眾多礦石標本，堪稱是日本最完備的礦石標本大全，後皆由三菱合資會社（現今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所收藏。《本邦鑛物標本》中有關硫砷銅礦的記載如下（詳圖 3）：

「Enargite 第四七六號及第四七七號 基隆廳基隆堡金瓜石金山產第四七六號（五番坑）黝黑色帶金屬光澤，呈塊狀，內含斜方柱狀結晶，間雜矽化岩石。第四七七號（四番坑產）直徑 3 釐米以下，群生於結晶岩石表面，一部分表面薄覆黃銅礦。」
（和田維四郎，1907：56）

⁶ 原文為「海拔 2076 尺」，約為 629 公尺，頁 91，福留喜之助〈談臺灣礦業的黎明期〉《臺灣時報》1 月號，昭和 12(1937)。昭和 11(1936) 年島田利吉〈金瓜石鑛山特輯號〉《科學の臺灣》第四卷第六號第 202 頁，「…，海拔 638 米高的金瓜石岩嶂，…」，兩者所記載的高度略有出入。
⁷ 同 6。原文為「海拔 1187 尺」，約為 360 公尺，頁 92。



【圖 3】編號第四七六號硫砷銅礦，由和田維四郎所收藏，並記載於明治 40(1907) 年出版的《本邦鑛物標本》中，現由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典藏。資料來源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資料庫。

明治 40（1907）年，《臺灣產鑛物標本目錄》出版，由時任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教師，同時也是鑛物學家的岡本要八郎⁸所著。該書所採集的「硫砷銅礦」⁹標本，皆出自金瓜石，呈現幾種不同的物理樣態。例如：1. 於露頭處呈浮石狀；2. 結晶於安山岩分解的孔隙中；3. 群生成柱狀結晶，有切割面；4. 呈硫砷鐵礦般的短柱狀晶群；5. 如車骨礦般的雙結晶；6. 如黑色錳礦般的緊密塊狀；7. 如輝銻礦般的柱狀結晶；8. 在岩石中與黃鐵礦共同形成礦脈；9. 混有黃鐵礦的緊密礦石；10. 伴隨八面體的黃鐵礦；11. 伴隨自然金；12. 伴隨後來生成的重晶石，具有漂亮綠藍色的銹色；13. 伴隨矽孔雀石；

14. 轉變為孔雀石；15. 存在於石英中，由周圍開始逐漸變化成孔雀石。該書所介紹的臺灣產鑛石標本，分別來自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標本陳列室、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博物標本室、金瓜石田中組鑛山事務所標本陳列室、瑞芳藤田組鑛山事務所陳列室。（岡本要八郎，1907：13~14）

大正 5（1916）年，由神保小虎、瀧本澄三、福地信世三人增訂和田維四郎《日本鑛物誌》第二版，除了作為和田維四郎六十歲大壽紀念之外，第二版也比初版增加了 40 種鑛物，總數達 197 種。鑛石採集地分布除日本內地之外，也包括樺太

（今庫頁島）、臺灣、朝鮮等地。（和田維四郎，1916：2）在這 197 種鑛物中臺灣產的鑛物數量計 30 種，硫砷銅礦的漂亮結晶、有放射能的北投石以及大屯硫黃等代表性的鑛石皆列於其中。該書記錄的硫砷銅礦產地，除了臺灣金瓜石礦山之外，還有日本陸奧國安部城礦山（在今日本東北 5 縣境內）、甲斐國小尾（今日本山梨縣）、豐後國真玉礦山（今日本大分縣）等地。上述產於臺灣的鑛物標本，當時皆收藏於大正 4（1915）年 8 月 20 日開館的臺北新公園內紀念博物館（又簡稱臺北博物館）內，以及東京帝國大學鑛物學教室。

二、硫砷銅礦的製煉法

金瓜石礦山與現今九份的瑞芳礦山，兩地雖然都產金也僅隔一座基隆山，但是礦床形式卻大不相同。金瓜石礦床為臺灣最大的金屬礦床，除盛產金礦之外並大量出產銅礦及銀礦，附近地質由石英安山岩及第三紀水成岩所構成，為一種熱液性交代及裂罅充填礦床，礦脈各處含金量比較均勻，罕見自然金塊體。在垂直方向有礦脈愈深處，銅礦相對愈增加的趨勢。而瑞芳礦床胚胎於石英安山岩、第三紀夾煤層內及兩者之接觸部，由許多微細的淺熱液性裂罅充填礦脈群所成。金粒較為粗大而獨立存在於脈石中，往往由肉眼可看出，又常遇富礦體。（臺灣省鑛業研究會，1966：72）

為了處理不同成分的鑛石，金瓜石礦山的鑛石製煉法分為濕式及乾式製煉法兩種，濕式製煉法主要用來處理金礦石，又分為混汞及氰化兩種程序。以金瓜石本山礦床為例，由於粘土礦成分多，岩質堅硬，須先以嚙礦機及搗礦機選礦後，再施以濕式製煉。首先須將水銀加入搗碎後的金礦，讓金

粉集中於水銀內，再將此混汞金加熱後讓水銀蒸發，始得粗金塊，約可收取 40% 左右的含金量。因過程使用水銀的關係，亦稱為混汞法，適用於含金量品位較高的金礦石。

混汞法收金後所剩下的礦滓，仍含有品位較低的金粉，此時則利用氰化法二次收金。礦滓又分為砂礦與泥礦，前者含金量品位約 7ppm ~ 10ppm，採濾過溶解法、後者含金量品位約 10ppm，採攪拌溶解法。在上述礦滓內加入氰化鉀溶液將之溶解，藉由鋅的媒介讓殘滓中微量的金粉變成金泥。這種使用氰化鉀溶液的方式也稱為氰化法，適合處理含金量品位較低的鑛石。因此若遇上品位低的貧礦，常省略混汞的過程，直接採氰化法製煉。

乾式製煉法簡單說來，是以熔礦爐來處理含金銀銅礦石的方法。將此礦石與少量的金礦粉作為原礦，加入煤熔劑混合後略為熔煉，如此各種礦粉即可集結一處，當硫化汰礦及一部分的金礦粉熔燒後，再一同放入熔礦爐內，所產出不純的硫化物直接以真吹製煉法即可收取粗銅。（作者不詳，1914：76）有關明治時期金瓜石礦山的濕式及乾式製煉法的流程，可參考附錄 1 及 2。

光緒末年基隆河床引起的淘金熱潮，當時的採金範圍雜亂沒有規則，洗金方式亦極為簡陋。日治時期最早的產業調查報告《臺灣產業調查錄》，以及甲午戰爭末期美國從軍記者 Lames W. Davidson 所著《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皆對於清末以來漢人淘洗砂金、採掘山金及煉金的方式有類似的記載，以下摘錄 Lames W. Davidson 於明治 30（1903）年所做的紀錄：

⁸ 岡本要八郎為「北投石」發現者，詳參方建能〈北投石與岡本要八郎〉《臺灣博物季刊》116，Vol.31(4)，2012，頁 64-69。

⁹ 硫砷銅礦的化學式為 Cu₃AsS₄，化學成分多寡依序為銅 (Cu)、硫 (S)、砷 (As) 及銻 (Sb) 等。

在瑞芳近邊採掘之基隆河的含金碎石分佈於廣大地區，…漢人洗金者漸掘走河岸，對該地方增害甚多；這些河岸有些地方是天然的防洪堤，以其高及鄰接的低地來防洪，洪水之損害增加引起不少狼狽。在沖積土採金，漢人只用較原始的淘洗器具，如「淘洗器（cradle）」及「長湯姆淘洗器（Long Tom）」。大規模的沖積礦床用之斜水槽或水力學的採礦器具則尚未採用。…取得之金，不是就以金沙直接處分掉，就是製成2英吋又3分之1長之小金條。為製成金條，金沙放入土製坩堝內，攪本身重量10分之1之礪砂以促進融解，坩堝要取出黏在上面之金，仍然有百分之8以上的損失。（Lames W. Davidson《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蔡啟恆譯，1972：324-325）

相較於上述清末簡易的製煉法，明治29年取得金瓜石礦山礦權的田中長兵衛於次年開始著手整頓礦區、開挖坑道，並以工業化的方式興建選、煉金礦的精煉所。明治31（1898）年，於現今本山五坑口附近狹隘的內九份溪旁，設第一精礦所（亦稱製煉所），並開始使用濕式製煉法提煉金礦。後於第一精礦所的下方，逐年擴建精煉所。（島田利吉，1936：56）當時製煉所的建築以及大概的位置配置圖詳參圖4及5。

明治37（1904）年，基隆三金山共同向總督府申請設備擴張，同年開始併用濕式製煉的氰化法。礦山因為設備的擴增，礦區面目一新，這一年亦可視為基隆三金山的革新期。（福留喜之助，1937：85）明治31（1898）年興建的第一精礦所後於明治40年廢止。明治32年12月興建第二精礦所，並在明治39年變更為泥礦氰化製煉所。明治33年12月興建的第三精礦所，於明治41年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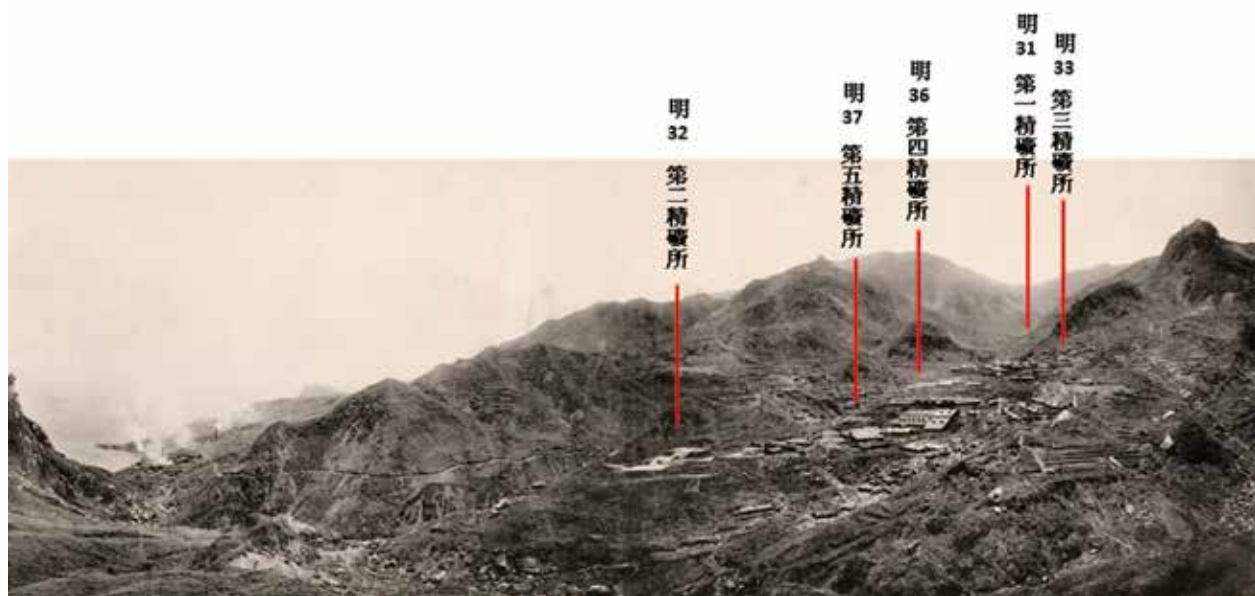
止。明治36年12月興建的第四精礦所，則於明治40年改造為搗礦所。明治37年興建的第五精礦所，於明治39年改為砂礦所。第二、四、五精礦所改造後的泥礦、搗礦及砂礦所，後於昭和10年4月，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於水湳洞興建的全泥式氰化法製煉所完工後廢止。圖6、7及8為採用氰化法後所改建的製煉所、新建的熔礦製煉所及其位置分布圖。（島田利吉，1936：56。福留喜之助，1937：94）有關製煉所發展沿革亦可參見表1。

明治38（1905）年發現第一長仁礦床後，因硫砷銅礦含量豐富、含金品位亦高，如何避免濕式製煉法在處理含金硫化礦粉時繁瑣的流程，同時又能提煉出金、銀，是礦山經營者思考的方向。明治39（1906）年金瓜石礦山開始興建熔礦製煉所，於明治40（1907）年完工後，開始併用熔礦爐的乾式製煉法處理金銀銅礦，並且順利產出粗銅，這也是臺灣礦業史上煉銅的嚆矢。田中組從明治30（1897）年著手開採事業後，開採範圍陸續由金瓜石露頭處往下移，至熔礦製煉所興建完成，礦山景觀已大幅改變，金瓜石礦山整體開發的雛形至此出現。

明治43（1900）年起，金瓜石礦山因缺乏乾式製煉法在熔煉時最需要的鹽基性媒熔劑，便將一半的金礦石賣給同屬田中組所有的日本岩手縣釜石鐵礦山，委託其製煉，再從回程的船運上載回釜石礦山出產的含銅硫化鐵礦、含銅鐵礦以及硫酸滓等，以作為金瓜石礦山乾式製煉的媒熔劑。大正2（1913）年，金瓜石礦山因礦石品位逐減降低，取消委託日本內地礦山的製煉，開始增加礦石賣出的數量。大正12（1923）年，廢除自山金銅礦石的乾式製煉，將礦石全數賣給日立礦山位於九州的佐賀關製煉所。（福留喜之助，1937：95）



【圖4】由左至右為明治31年、32及33年興建的第一、第二、第三精礦所，使用濕式製煉的混汞法《臺灣金瓜石田中鑛山全景》19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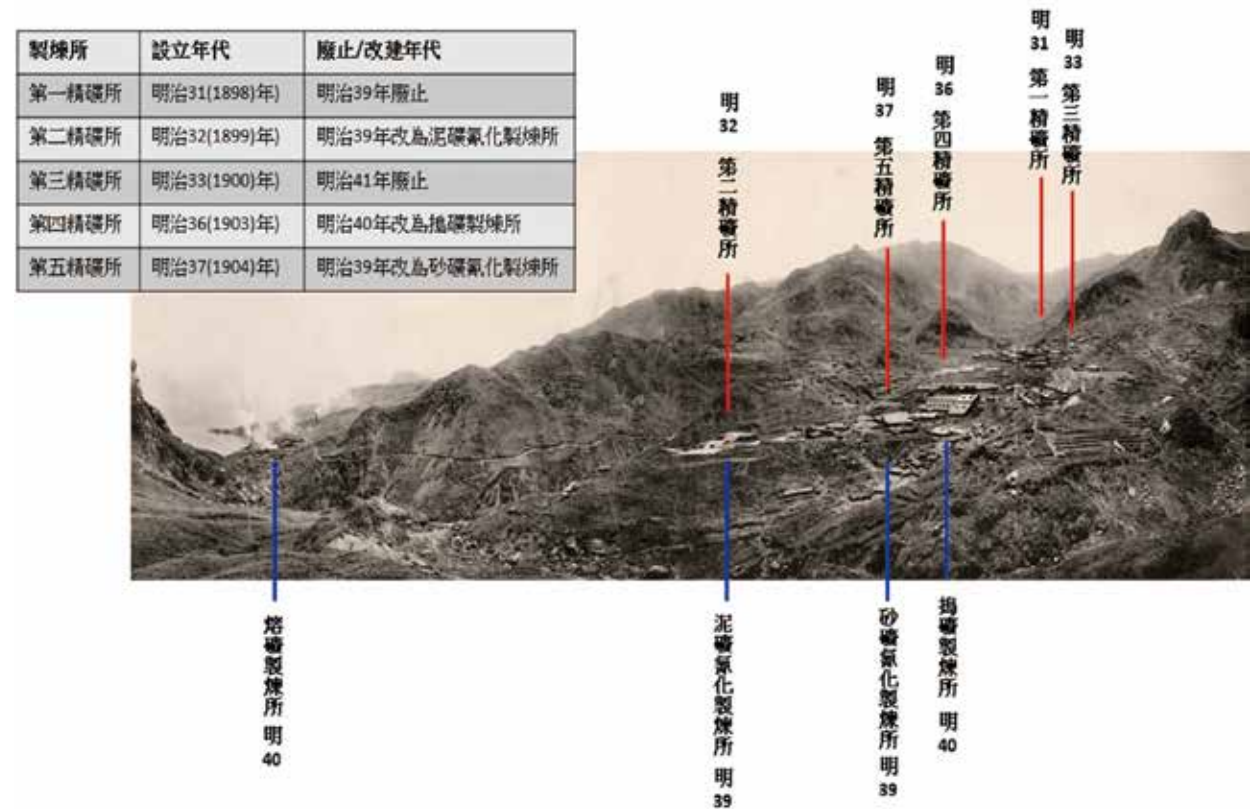
【圖5】明治31年至明治37年間金瓜石礦山所興建的濕式製煉混汞法精礦所位置圖。底圖出處《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年。



【圖6】由左至右分別為泥礦氰化製煉所（原第二精煉所）、搗礦製煉所（原第四精煉所）以及砂礦氰化製煉所（原第五精煉所）《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年。



【圖 7】明治 40 年完工的熔礦製煉所，用以處理含金銀銅礦石。《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 年。



【圖 8】金瓜石礦山混汞法製煉所改建為氧化法製煉所的示意圖。明治 31 年以「明 31」表示。底圖出處《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 年。

三、金瓜石礦山的金、銅產量

福留喜之助在〈臺灣鑛業の黎明期を語る〉文中提到，「明治 34（1901）年，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以及牡丹坑礦山三金山的產額，占全日本總產金額的 29.8%。而金瓜石礦山自明治 34 年至大正 1 年之間的年度金產量都是全日本第一。」其中明治 38（1905）年，瑞芳礦山年度金產量為全日本第二；明治 39（1906）及 40（1907）年兩年，牡丹坑礦山年度金產量超過瑞芳礦山，成為全日本第二。大正 4（1905）年，合併牡丹坑礦山後的金瓜石與瑞芳兩金山總產額超過 1642.5 公斤¹⁰，這也是明治、大正時期臺灣產金的最高紀錄。（福留喜之助，1937：86）

明治 40（1907）年金瓜石礦山完成熔礦爐設備，至明治 44 年間數次增置熔礦爐，明治 43（1910）年因第一長仁礦床的坑水富含銅分，開始收取沉澱銅。大正 1（1912）年金瓜石礦山的銅產量（含沉澱銅），已是當時臺灣僅次於金礦的高產額經濟礦物。表 2 為金瓜石礦山明治、大正年間的金、銅產量，可看出明治 40（1907）年之後，增設熔礦爐開始使用乾式製煉法製煉硫砷銅礦後，金、銅礦產量逐年增加的情形。大正 2（1913）年起隨著金瓜石礦山的賣礦量逐漸增加，年產量也一年不如一年，大正 12（1923）年廢止當時臺灣島唯一的乾式製煉場時，礦產量已大不如前。（福留喜之助，1937：86。《第七臺灣鑛業統計便覽》，1909:82。《臺灣統計要覽》，1914:258。）

【表 2】金瓜石礦山金銅年產量 (1898-1925)			
年	kg	金產量	銅產量
明治 31(1898)		41,329	—
明治 32(1899)		122,288	—
明治 33(1900)		346,579	—
明治 34(1901)		582,836	—
明治 35(1902)		861,293	—
明治 36(1903)		809,756	—
明治 37(1904)		889,084	—
明治 38(1905)		639,825	—
明治 39(1906)		519,694	—
明治 40(1907)		452,693	46,852
明治 41(1908)		1,042,290	323,802
明治 42(1909)		1,064,835	433,426
明治 43(1910)		1,040,921	446,630
明治 44(1911)		1,092,780	953,297
大正 1(1912)		1,058,794	1,459,162
大正 2(1913)		865,721	1,544,989
大正 3(1914)		1,378,829	1,875,359
大正 4(1915)		994,429	1,482,054
大正 5(1916)		745,024	1,155,735
大正 6(1917)		754,043	1,016,390
大正 7(1918)		514,481	532,481
大正 8(1919)		432,113	883,801
大正 9(1920)		354,870	692,270
大正 10(1921)		494,715	1,196,890
大正 11(1922)		423,116	1,095,508
大正 12(1923)		378,210	854,376
大正 13(1924)		206,396	184,613
大正 14(1925)		199,058	—

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民國 39 年 10 月出版，頁 67~68。

¹⁰ 原文為 438 貫，1 貫約為 3.75 公斤，438 貫為 1642.5 公斤。福留喜之助，1937：86。

肆、臺灣總督府的礦物調查

臺灣島的礦物調查，在清代以前多停留在地方產物的記載，日治初期基於產業調查目的，偏重諸如硫黃、煤、砂金、金礦等具經濟效益的有用礦物調查，尚未達到礦物學要求的礦物普查程度。日治時期最早的產業調查報告，為明治 29（1896）年 3 月 27 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發行的《臺灣產業調查錄》，由技師橫山壯次郎所著。該書調查的產業種類包括茶、米、木藍、苧麻、樟腦、硫黃、石炭、砂金及金礦等 10 種，區域僅限當時的臺北縣境內，調查年代為清末至明治 28（1895）年 11 月以前的產業狀況。因戰爭剛結束不久，臺灣地區各地紛亂，原住民山區難以進入，語言不通又缺乏有關臺灣全島精確的地形圖等等因素，有人認為只能算是一次粗略但具重要參考價值的普查紀錄¹¹。

臺灣總督府成立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民政局下置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明治 28（1895）年 12 月，於殖產部下設鑛物掛。明治 29（1896）年 4 月，民政局官制發布，廢鑛務掛，設置鑛務課。鑛物課又設常務掛、鑛業掛、地質掛、分析掛四掛。由地質掛負責地質調查工作。明治 30（1901）年 4 月，官制改革，廢殖產部設殖產課、廢鑛務課設鑛務掛。明治到大正年間因官制改革因素，負責地質、礦物調查的殖產課經常面臨編制緊縮、經費刪減、人力不足或人員任期過短等問題，導致臺灣地質與礦物調查多限於小型、散狀計畫，績效不佳¹²（市川雄一，1925：20-22）。一直到大正末年，臺灣全島的地質盤點調查工作終於大致完成。綜觀明治、大正時期臺灣總督府針對「金礦」所做的調查報告如表 3：

【表 3】臺灣總督府明治大正年間所做礦業及地質礦物調查報告（以金礦類為主）		
出版年 / 月 / 日	書 名	出版者 / 編著者
1896 (明治 29) 3/27	《臺灣產業調查錄》	臺灣總督府技師橫山壯次郎
1896 (明治 29)	〈鑛山視察復命書〉	臺灣總督府技師石井八萬次郎
1896 (明治 29)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第 1 卷第 2 冊鑛業之部	臺灣總督府技師石井八萬次郎
1897 (明治 30)	〈九份金瓜石兩鑛山 / 基隆川筋砂金場 鑛業視察復命書〉	臺灣總督府技手富田榮太郎 / 村田雄之助
1897 (明治 30)	〈臺灣島地質鑛物巡視復命書〉	臺灣總督府技師石川貞治等
1898 (明治 31)	〈瑞芳金山巡回復命書〉	臺灣總督府屬熊田幹之助
1898 (明治 31)	《臺灣島地質鑛產圖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技師石井八萬次郎
1899 (明治 32)	《第一臺灣鑛業統計便覽》	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讓
1900 (明治 33)	《鑛山地質調查報文》	臺灣總督府技師井上禧之助
1900 (明治 33)	〈瑞芳鑛山鑛區調查復命〉	小官儀 臺灣總督府技手山下律太
1900 (明治 33)	《瑞芳及金瓜石鑛山視察報文》	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讓
1900 (明治 33)	《第二臺灣鑛業統計便覽》	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讓
1905 (明治 38)	《第三臺灣鑛業統計便覽》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07 (明治 40)	《臺灣產鑛物標本目錄》	岡本要八郎
1908 (明治 41)	《臺灣鑛業一斑》	臺灣總督府技師福留喜之助
1909 (明治 42)	《第七臺灣鑛業統計便覽》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鑛務課
1910 (明治 43)	《鑛區一覽》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鑛務課
1911 (明治 44)	《臺灣鑛物調查報告》	岡本要八郎
1911 (明治 44)	《臺灣地形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6 (大正 5)	《臺灣鑛業一斑》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6 (大正 15)	《臺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¹¹ 作者不詳〈本島最初の鑛業調查報告〉《臺灣鑛業會報》第 121 號，大正 14(1925) 年 6 月 30 日。

¹² 市川雄一〈臺灣に於ける地質調査事業と地質調査所設置の急務〉《臺灣鑛業會報》第 121 號，大正 14(1925) 年 6 月 30 日。石井八萬次郎《臺灣島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明治 30(1897) 年。

除了總督府主導的調查工作，明治 29（1896）年 2 月 21 日，由東京地學協會理科大學地質學教室小川琢治所著的《臺灣諸島誌》，彙整歐文、日文、漢文有關臺灣島的紀錄，介紹日本治臺初期臺灣概況，包括歷史沿革、海洋、山嶽及河流、地質、氣候及氣象、住民、產業、交通、天然及行政區分，等等，堪稱日治初期臺灣史大全，亦具重要參考價值。

日本以科學角度開始鑽研礦物學，始於明治 6（1873）年左右，東京的開成學校，招攬德國的鑛山技師 Karl Schenk 指導地質與礦物學課程為其濫觴。（和田維四郎，1916：頁 2）自明治 28（1895）年統治臺灣之後，地質或礦物學家也開始關心臺灣等殖民地的產業現況。總督府技師們在全臺各地調查鑛山、確認有用礦物的同時，也陸續蒐集不少臺灣島上各式各樣的鑛石標本，並將其保存陳列於殖產局博物館內。日本的礦物學界除透過這些歷年的調查、礦物蒐集，進一步認識臺灣地質特色與礦物種類之外，也適時的扮演專業判斷、指導，以及技術支援的角色。以金瓜石鑛山硫砷銅礦發現的過程為例，可說是產（金瓜石鑛山經營者及技師）、官（總督府技師）、學（日本礦物界）合作的成果。

結語

黃金相較於煤、銀、砂金、硫黃以及石油等經濟礦物，往往礦產價值最高。日治時期的黃金產量，皆出於當時的基隆三金山，其中又以金瓜石鑛山的貢獻最大。鑛石依含金品位的高低，可分為（最上礦）、上礦、並礦（普通礦）及貧礦四個層級。金瓜石本山礦床二坑以上的富礦帶，曾出產豐富的自然金，含金品位高達 1000ppm 以上，亦即一噸的原礦可出產一公斤以上的黃金。而越往地底

下開採，含金品位越差。金瓜石鑛山自創設以來，舉凡最上礦以上的高品位鑛石，搬運出坑後即原封不動送至日本總公司冶煉成金，只有普通級等以下的低品位鑛石，才會利用鑛山現有的選、煉設備進行提煉。（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1。頁：92-140）

明治 37（1904）年，金瓜石鑛山發現稀有的硫砷銅礦，成為臺灣特色鑛石之一，不僅鑛物學界感到興奮，它豐富的礦藏量也讓鑛山經營者受到鼓舞，進而加速各區的探礦作業。金瓜石鑛山於明治 43（1910）年陸續發現第二、第三及第四長仁等潛力礦床，成為實至名歸的金銅鑛山。金瓜石鑛山所產的銅，也自明治末年開始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礦物之一。高額的金、銅產量，除了有賴含量豐富的礦脈，合適的製煉技術更顯重要。鑛石製煉時所使用的濕式製煉的混汞法、氰化法，以及乾式製煉法，簡單說來就是運用氧化、還原、燃點、沸點，以及比重等化學與物理特性，取出經濟礦物的不同程序。金瓜石鑛山自明治 40 年開始產銅，至大正 12 年因成本收支平衡問題關閉當時臺灣唯一的乾式製煉廠，煉銅時間長達 17 年之久。令人好奇的是，當年因為煉銅所產出的銅煙，是否也曾引發汙染問題？

金瓜石鑛山在明治末年為了解決熔煉過程欠缺鹽基性媒熔劑的問題，除了賣礦委託其他鑛山製煉之外，並思考解決之道。大正 10（1921）年，於長仁四番坑（本山六坑）坑口附近興建浮游選礦場，目的之一據了解也是希望解決媒熔劑不足的問題，可惜後來因收支未能平衡也休廠。有關大正至昭和年間，金瓜石鑛山在鑛石製煉技術上的演變，筆者將會持續探索整理。

金瓜石礦山在明治、大正年間，因工業化的選、煉礦設施的增加，第一長仁礦床的小山丘因露頭的露天開採而消失了；水湳洞的芒草與蕃薯田的景觀亦不復見，礦區景觀大幅改變之外，也形塑出金瓜石礦山的基本開發風貌。

誌謝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修正意見，使內容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橫山壯次郎，1896。臺灣產業調查錄，頁：245-255。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石井八萬次郎，1896。鑛山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頁：123-132。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石井八萬次郎，1898。臺灣島地質鑛產圖說明書，頁：1-12。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纂。

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讓，1900。瑞芳及金瓜石鑛山視察報文，頁 38-55。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金瓜石田中鑛山共救義會，1903。臺灣金瓜石田中鑛山全景。基隆：臺灣基隆堡九份庄金瓜石田中鑛山共救義會。

和田維四郎，1904。日本鑛物誌，頁：1-4。東京：和田維四郎。

持地六三郎，1905。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頁：384-454。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和田維四郎，1907。本邦鑛物標本，頁：56。東京：和田維四郎。

岡本要八郎，1907。臺灣產鑛物標本目錄，頁 13-14。出版單位不詳。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鑛務課，1909。鑛區一覽，頁：1。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鑛務課編纂。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1。臺灣地形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頁：92-140。東京。

岡本要八郎，1911。臺灣鑛物調查報告，頁：29-35。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絹川健吉，1913。金瓜石鑛山寫真帖。基隆：絹川健吉寫真館。

岡本要八郎，1913。臺灣新產鑛物に就いて：臺灣鑛業會報 2：58-63。

作者不詳，1914。主要鑛山に於ける事業經營の概況：臺灣鑛業會報，6：74-81。

岡本要八郎，1916。日本鑛物誌第二版と臺灣鑛物：臺灣博物學會會報，25：154-155。

岡本要八郎，1916。日本鑛物誌第二版と臺灣鑛物：臺灣鑛業會報，34：4-10。

和田維四郎，1916。日本鑛物誌，頁 88-89。東京。

市川雄一，1925。臺灣に於ける地質調査事業と地質調査所設置急務：臺灣鑛業會報，121：24-2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6。臺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出版地不詳。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1934。金瓜石鑛山概要，頁：1-2。臺北。

島田利吉，1936。金瓜石鑛山の事業現況：臺灣鑛業會報，182：56。

福留喜之助，1937。臺灣鑛業の黎明期を語る：臺灣時報，1：84-95。

作者不詳，1938。金瓜石鑛山のエナアジャイト發見の顛末と關係文献：臺灣鑛業會報，191：88-91。

林朝榮，1950。臺灣之金，頁 16-52。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

臺灣省鑛業研究會 / 臺灣區煤鑛業同業公會，1966。臺灣鑛業史上冊，頁：72。臺北。

Lames W. Davidson，蔡啟恆譯，1972。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324-327。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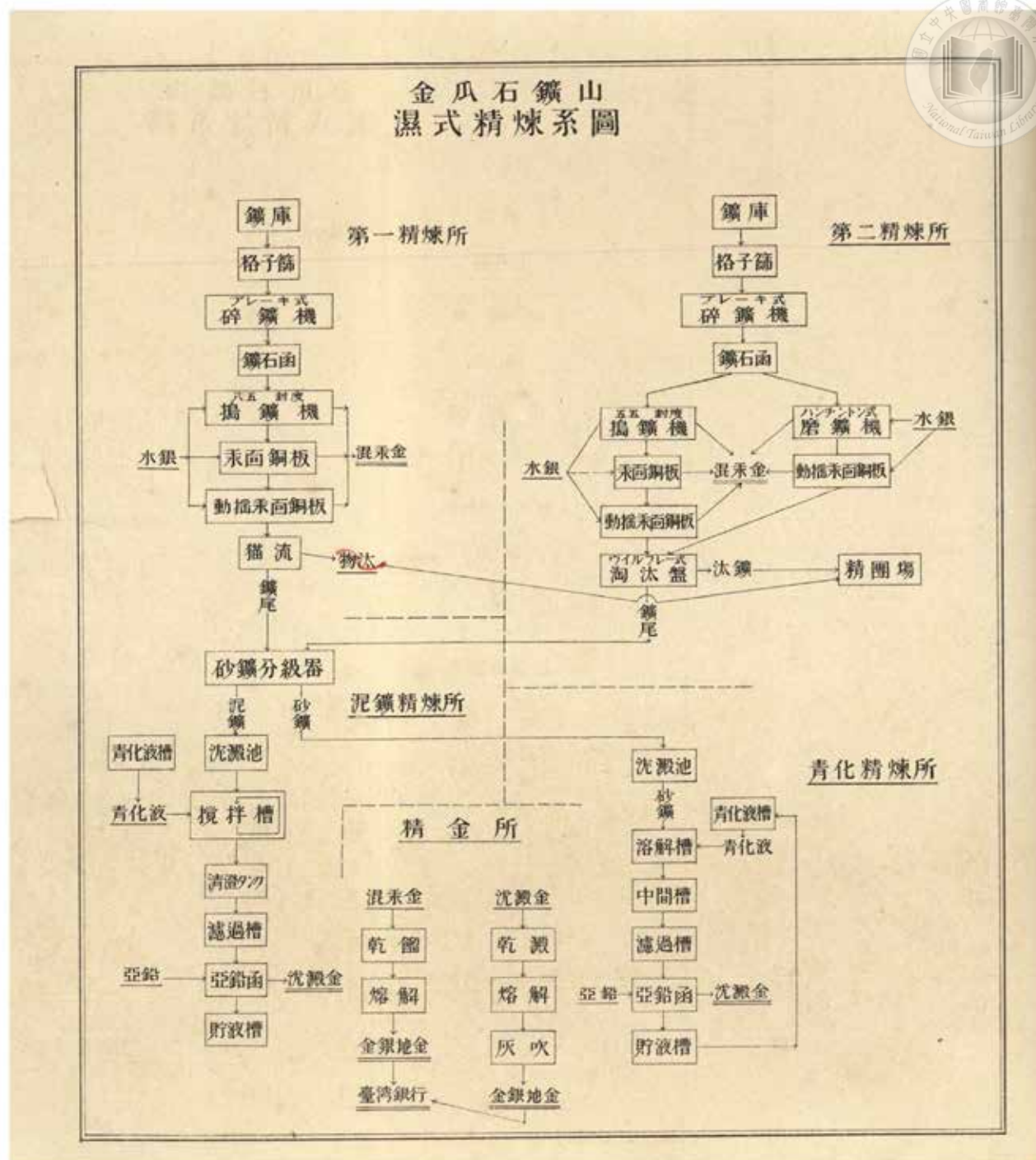
唐羽，1985。清光緒間基隆河砂金之發見與金砂局始末：臺灣文獻，123。

唐羽，1985。臺灣採金七百年，頁 105。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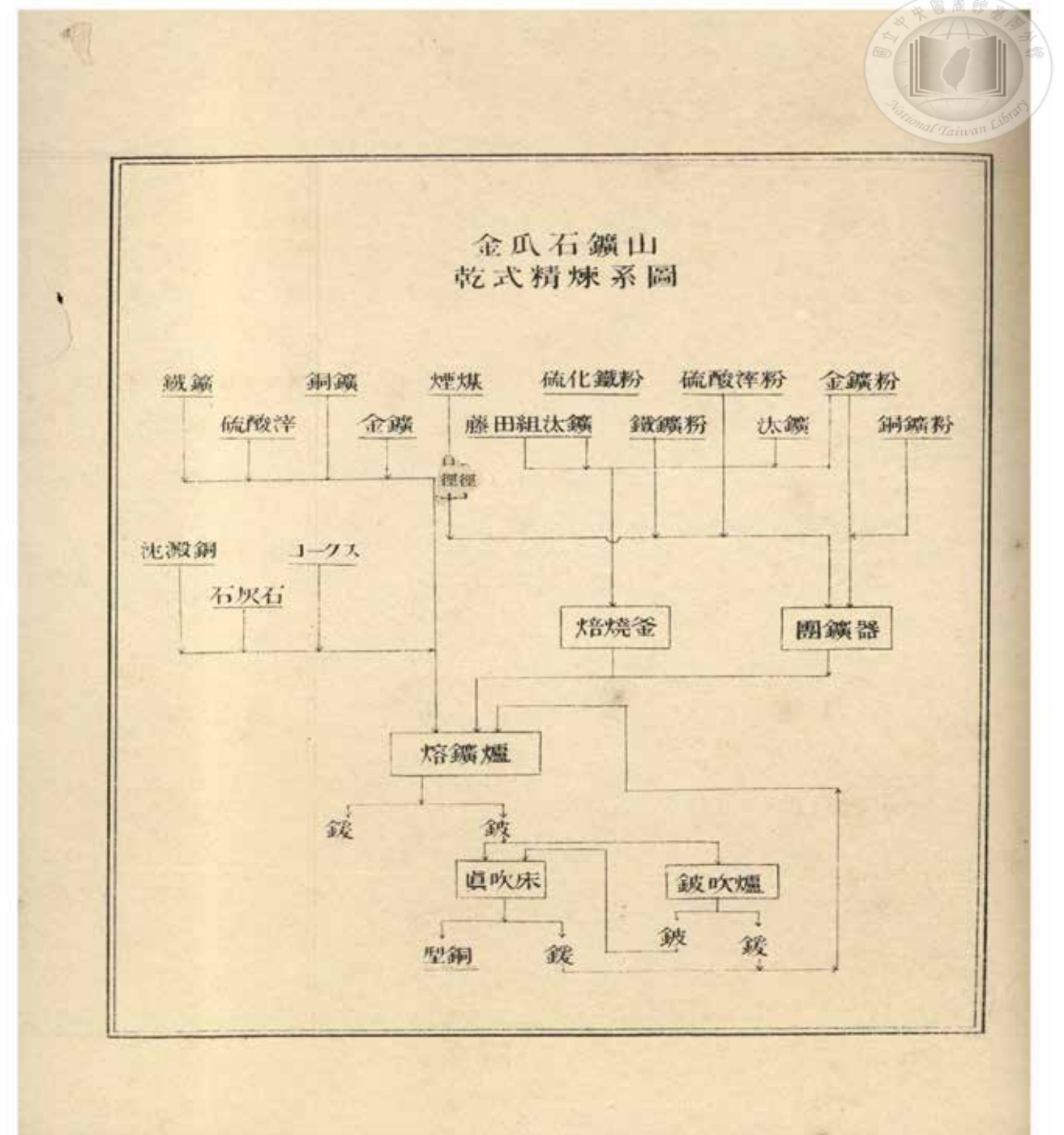
附錄 1

金瓜石礦山濕式精煉系圖『臺灣地形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明治 44（1911）年



附錄 2

金瓜石礦山乾式精煉系圖『臺灣地形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明治 44（1911）年（註：「コークス」為焦炭之意。「鉍」指熔鑛爐底含銅的硫化物，因為比重較重，會下沉自熔鑛爐底的溝槽出。「鍍」為礦滓，比重比「鉍」來得低。「真吹」（或「間吹」）是指從風口送進高壓下的風力，促進爐內物質的加速氧化，為日本傳統冶煉粗銅的方法。）



孿生太子賓館的前生今世

Different Fates of the “Twins” of Crown Prince Chalet

許勝發¹ Sheng-Fa Hsu
徐明福² Min-Fu Hsu

摘要

金瓜石與菁桐為臺灣北部兩處重要之礦場地，皆曾短暫蓬勃於日治時期到國府初期，除主要礦產類別的差異，兩地也因分屬日臺不同企業主而在經營管理呈現各自的發展面貌。然而，兩地卻分別擁有一棟風格特徵及空間格局相似，且皆曾號稱為「太子賓館」的傳統日式木造建築。本文擬探究此兩棟看似孿生建築的創建身世背景與歷史命運造化之差異，作為了解兩地礦業發展史區域特色之參考。

關鍵字：太子賓館、日式建築、金瓜石、菁桐

Abstract

Jinguashi and Jingtong used to be two important mining sites in northern Taiwan. The two places generated abundant prod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egin to the early days of post-war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main products, the gold mine Jinguashi and the coal mine Jingtong developed their very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one was manag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other by the Taiwanese owners. However, the two mining towns have two almost the same Japanese style clapboard siding buildings – similar not just in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interior space, both also once called “Crown Prince Chalet” – each standing insid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s and compares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y of the two “twin buildings” as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places' mining history.

Keywords: Crown Prince Chalet, Japanese style building, Jinguashi, Jingtong



【圖 1】金瓜石太子賓館（2010/09/25）



【圖 2】菁桐太子賓館（2012/07/14）

¹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生，Fadai.Hsu@gmail.com
²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教授

壹、前言

金瓜石與菁桐為臺灣東北部重要之礦產地，各擁有一棟號稱「太子賓館」之傳統日式木造建築³。就字面意義，「太子賓館」直覺讓人與「太子」產生聯想，譬如曾經有前清或日治時期皇太子的蒞臨下榻，但稍微探究歷史發展背景，便可知這兩棟建築的「太子」身分都相對薄弱。然而，如再細究其時代背景的發展脈絡，卻又各自蘊藏著獨特且在地化的「太子」情節，隨著時空演替，述說著自身的「太子」傳奇。兩棟建築雖與礦業生產無直接之關係，但都曾是企業體在礦產地營運期間的門面之一，歷史發展中雖幾經易主，但空間仍大抵完整，當礦區的所有礦業生產設施幾乎都已隨著停工而遭到拆除或自然耗損消逝，這兩棟太子賓館卻因緣際會走過 80 到 90 年代礦區黯淡蕭條的歲月，捱到獲得法定文化資產身分而走入生命歷程另一個新的階段。近年的發展，大抵上金瓜石太子賓館被公部門凍結式保存，雖有限度地開放民眾參訪庭院景觀，但主體建築幾乎等同靜態標本原地陳列，且禁止民眾進入。而菁桐太子賓館則被屋主嘗試各種私人活化再利用的可能性，在開放與封閉思維中辯證拉扯，考驗著私有資產擁有法定文化資產身分後，如何能在不損及屋主權益的基礎下，實踐全民均享的文化財精神。

貳、金瓜石與菁桐礦業發展背景

一、金瓜石的礦業發展

金瓜石與九份是臺灣最主要的產金地區，日人治臺後開始有系統的大規模發掘。最初臺灣總督府以基隆山南北線為界，將東側的金瓜石礦山開採權給予田中長兵衛的田中組經營，西側的瑞芳礦山（九份地區）開採權給予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經營，兩者皆為日人企業體，在日本都擁有財力雄厚的礦業資產，且為當年日人接收臺灣期間處理軍隊後勤物資補給的「御用商人」，能獲得此區的採礦權，一般被認為是政治酬庸的結果⁴。

田中長兵衛在 1897（明治 30）年設立「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開始金瓜石地區有系統的金礦生產，1904 年又發現硫砷銅礦，使金瓜石因為豐富的金、銅蘊藏量而被譽為「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並且因為大量的開採而使此區短暫繁榮，奢華炫耀一時，但旋即陷入經營困境。1918 年該礦技師田中清與後宮信太郎合組「田中鑛山株式會社」收購金瓜石礦山，繼續勉為慘澹經營。1925 年後宮信太郎取得全部經營權，再改名為「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隨後於 1933 年遭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併購，更名為「臺灣鑛業株式會社」，並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 年由臺灣金銅礦物局接收，1955 年改組為「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之後礦脈逐漸耗竭，1987 年結束營業，停止採礦，土地轉移為台糖公司與台電公司所有並持續到今日⁵。

³ 這兩棟建築在歷史發展中皆曾出現許多不同名稱，但本文行文中一般皆以「太子賓館」稱之，並在前面冠以地名「金瓜石」、「菁桐」以區別之。
⁴ 唐羽，1985：93-94、陳斐翬，2004：38、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16。
⁵ 劉珮君，2011：40、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16-21。

回顧金瓜石的礦業生產歷史，持續約 1 世紀便趨於沉寂，由 30 年代曾經的繁華「小上海」到 90 年代的落寞「悲情城市」，再到今日觀光遊憩主導的販賣歷史情境「小確幸」，相同的舞臺背景上演一齣時光快速流轉的礦業輪替沉浮戲曲。

綜觀日治時期金瓜石礦山的經營發展，幾次的易主都與黃金需求及世界經濟局勢消長、礦業生產方式侷限有關，然始終掌握於日人單一的會社企業體營運，與瑞芳礦山（九份地區）顏雲年在初期採小包分租開採，會社抽成的營運方式不同，兩者最終塑造出不同的空間區位配置景象，前者層級分明，並留下日式風格鮮明的宿舍區與礦產、辦公區空間，後者則呈現漢人聚落生活與生產空間混合且有機增長的景象。

二、菁桐（石底）的礦業發展

菁桐地區的礦業發展以煤礦為主，且主要掌握在基隆顏家手中。基隆顏家為臺灣近代五大家族中唯一以商業起家者，其發展以臺灣東北部為主，擁有較鮮明的地域性色彩。顏家在臺灣的祖業為煤礦開採，但其崛起主要由顏雲年在 1899-1909 年間藉由向藤田組承包九份鑛山的金礦開採而奠定基礎，顏雲年採用分散承包的策略，最終幾乎經營 90% 九份鑛山面積，至 1918 年「雲泉商會」（1903 年成立）改為株式會社，並收購藤田組在瑞芳礦山（九份）的全部產權。1923 年顏雲年過世後由顏國年（顏雲年弟弟）短暫經營，1937 年再由顏欽賢（顏雲年兒子）接手，使家族企業發展到鼎盛⁶。

除了金礦，顏家一直持續發展煤礦的開採事業，最終使顏家成為臺灣最大的礦產企業體。顏家的眾多煤礦區以石底煤礦區（現今平溪線鐵道周邊區域）最受重視，其開採始於 1918 年，由顏雲年延續九分採金與藤田組合作的默契，兩者共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開始生產煤礦，1920 年藤田組離開臺灣，將股份全部轉售予顏雲年，顏雲年另增資並將會社改名為「臺陽鑛業株式會社」，且擴展煤礦開採範圍，開啟獨霸臺灣煤礦產業的年代。1937 年顏欽賢接手家族事業，新設立瑞芳、石底、海山三個礦業所，並且為了節省成本，提升生產效率，決定在菁桐建造「石底大斜坑」，1939 年完工後開始統一集約出坑。1941 年因為戰爭因素致使會社進入停工狀態，之後國府時期顏家的相關企業因為涉及日人持股因素而經歷一段遭公部門整併的過渡期，至 1948 年改成立「臺陽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而石底煤礦區直至 1949 年才恢復生產，並於 1988 年結束營運，煤礦開採資產全部讓售，至此顏家所有煤礦開發事業皆終止⁷。

顏家立基於金煤兩礦業，發展歷程橫跨日治、國府兩時期，並在 1960 年代煤礦業出現危機時開始轉型，拓展多角化企業經營，包括造船、金屬工業、公共運輸等範疇⁸，最終退出礦產業而致力於其他事業體。整個菁桐地區（白石腳）也因為煤礦的開採而曾繁榮達 70 年時間，再恢復農村景象，近年則與金瓜石類似，因為工業遺產觀念的推動與觀光遊憩的發展而又活絡起來。由於菁桐地區幾乎都屬於私人的土地，臺陽公司離開後原先承租之土地及殘留之地上物遺構皆歸屬原地主，公部門不容易介入整合後續的觀光遊憩發展，僅能隨勢操作，點狀依附隨機發展，譬如搭上臺鐵的平溪線鐵道旅遊或平溪地區的天燈燃放熱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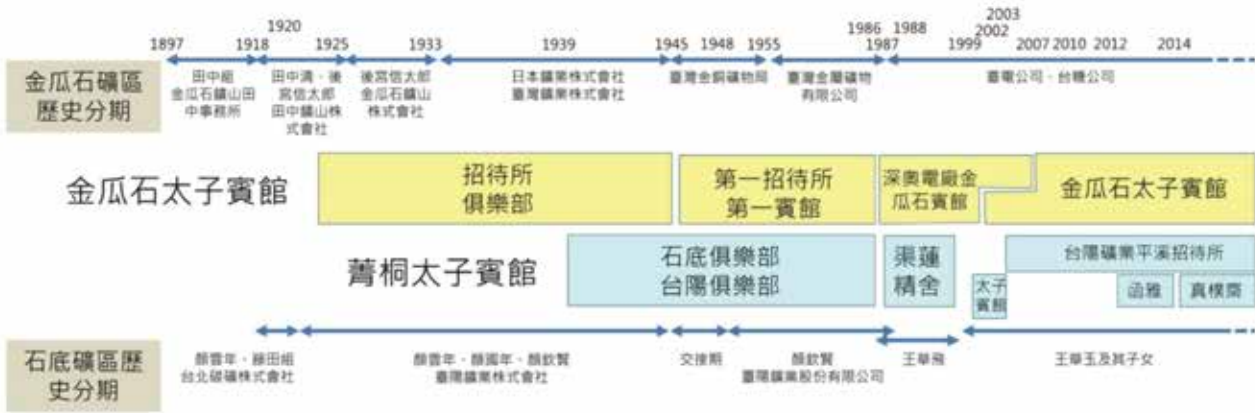
6 司馬嘯青，1987：24。
7 陳勤忠，2001：2-23-25。
8 陳慈玉，1999：136。

【表 1】金瓜石與菁桐礦業發展比較表

項目	金瓜石鑛山	菁桐（石底煤礦區）礦區
業主屬性	日籍與官方	臺籍 / 私人
主要經營者	1897-1918：田中長兵衛的田中組 1918-1925：田中清、後宮信太郎的田中鑛山株式會社 1925-1933：後宮信太郎的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 1933-1945：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的臺灣鑛業株式會社 1945-1955：臺灣金銅礦物局 1955-1987：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 1987- 現今：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糖公司	基隆顏家
主要礦產	金、銅	煤
產礦方式	會社統一開採	會社統一開採，後期分包承租
開採時間	1897-1987	1918-1988

【表 2】兩棟太子賓館比較表

項目	金瓜石太子賓館	菁桐太子賓館
建造年代	約 1910 至 1930 年間	1939-1940 年
建築風格	日式書院造	日式書院造
構造形式	外牆雨淋板，一層木造瓦葺	外牆雨淋板，一層木造瓦葺
空間形式	中廊下型 / 雁行平面	中廊下型
基地面積	約 360 坪	約 600 坪
建築面積	約 141.5 坪	約 202 坪
其他 附屬設施	日式庭園造景、射箭場、高爾夫球練習坑道	日式庭園造景



【圖 3】兩棟太子賓館的歷史發展變遷圖



【圖4】金瓜石太子賓館空間示意圖（2015/08/19繪製）

參、金瓜石太子賓館的歷史變遷

金瓜石礦區從日治時期的日人私有會社經營到國府時期的公營企業體經營，其營運與土地所有權都掌握在日人與公部門之間，而日人嚴厲的執事態度讓礦區的空間配置區隔明顯，在地形上大致由上而下依序為出礦區、日式宿舍區、辦公區，這幾個區域連同其他服務設施、宗教設施、學校等空間，形成日籍員工活動的區域（國府時期成為公部門職員生活區），而臺籍員工則集中居住於更為下方的區域，以及後期的水涵洞地區。如此階層分明的空間層級區隔，基本上已大略定調今日金瓜石地區後續空間活化的格局限制，容易產生一種常民百姓無法介入的隔閡感，此困境在 2004 年黃金博物館進駐運作之後，便不斷被挑戰浮現。

金瓜石太子賓館位於整個日式宿舍區最東側的區域，西北側靠近主要辦公空間，地形上保有自然的邊界，可以俯瞰北側山谷，擁有極佳的景觀視野。其建築主體為日式書院造風格，並帶有部分的數寄屋造風格，構造為外牆使用雨淋板的一層木造瓦葺型式，空間型態為中廊下型，由中央走道串連各個空間，其中包括四間主要之寢房（客室），以及具洋式風格的應接室與娛樂室。由於主要寢房空間在平面安排上逐層退縮，因而帶有雁行平面的配置特色。後方庭院有小型高爾夫球練習場與射箭場，兼具西式與日式的休閒運動風格，此兩者使用混凝土材料，與主體建築木構造的形式差異大，且由後側庭院空間因為安置高爾夫球場而略顯擁擠觀之，此兩項設施與主體建築有可能分屬不同時期所建造。

關於金瓜石太子賓館建造目的有許多推論，包括做為礦山社長別墅、迎賓館、俱樂部、招待所、集會所、客室等⁹。然就空間格局與建築規模研判，可能是兼具宿泊、休憩與小型集會空間等各種機能，以會社或公司經營的角度而言，這類建築作為「俱樂部」與「迎賓館（招待所）」或兼具兩者機能的可能性最高。

金瓜石太子賓館的興建年代由於欠缺直接之證據，目前並無法論定，但主要有 1922 年或 1924 年兩種推論。依曾任職於臺金公司之鄭春山先生說法，此棟建築興建於 1922（大正 11）年，乃田中組為迎接裕仁皇太子於 1923 年「東宮行啟」巡行臺灣期間參訪金瓜石所特別建造之「御泊所」¹⁰，換言之，是作為皇太子巡行金瓜石礦山的住宿館舍。

然而事實上裕仁皇太子 1923 年 4 月 16 日至 27 日共 12 日的「東宮行啟」巡行臺灣期間，並未真正蒞臨金瓜石訪視，自然不可能下榻此棟建築。雖然裕仁皇太子未親臨金瓜石，但依據 1923 年 4 月 27 日及 28 日《臺南新報》的報導以及《臺灣礦業會報》第 98 號所載，當年 4 月 26 日下午確實曾有皇太子的御差遣使服部東宮武官，帶領水越府事務官、鄉田軍參謀、篠崎州理事官等人前往金瓜石訪視，但僅短暫停留便返回臺北，並未留宿過夜¹¹。

1923 年裕仁太子「臺灣行啟」的原定期程為 4 月 9 日到 23 日共 15 日，但因為 4 月初有日本皇室的其他成員在法國發生意外過世，此行啟程因

而延後且縮短，改為 4 月 16 日到 27 日共 12 日，有些說法認為此行程的臨時改變是造成皇太子原欲訪視金瓜石的行程遭取消而改派御差遣使代為前往訪視¹²。然無論原先的期程或是延後縮短的期程，金瓜石皆未列為皇太子預定訪視之地點，而基於交通及防衛安全考量的緣故，最初的行程安排已將許多較為偏遠及後山地區（宜蘭、花蓮）的參訪地點規劃由御差遣使前往代為視察，但金瓜石原初亦未列為御差遣使代為訪視之地點，而是在期程延後重新規劃時，才被安排於 4 月 26 日御差遣使由宜蘭返回臺北途中進行訪視。御史差遣代表的即是皇室，因而或許也能寬鬆地視同曾有皇室成員抵達金瓜石礦區訪視，來合理化這棟建築是為迎接日本皇室成員而建造的。

或許因為有著前述金瓜石太子賓館的建造目的是為了迎接裕仁皇太子參訪金瓜石礦區作為「御泊所」之用的推論，因而這棟建築被順勢判定完工於 1922 年，但此推論並無實際之建造資料可供佐證，僅能判定若當時迎接太子蒞臨的期望確實存在，礦區也已有相對應的準備，則此棟建築最初的建造年代必定早於 1923 年。

1920 年代為日人殖民臺灣進入中期成果展現的時間點，各項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大致完成，平地反抗勢力幾乎消弭，鎮壓北部原住民的計畫進入穩定階段，山地資源的開採逐步擴大，政治上日趨穩定、經濟上日益富饒，此時日本皇室接受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奏請，蒞臨臺灣視察¹³，正是展現日本國力現代化、凝聚國族意識，以及殖民統治

⁹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28-29。

¹⁰ 鄭春山，2007：144。

¹¹ 1923 年 4 月 26 日皇太子御差遣使服部東宮武官帶領水越府事務官、鄉田軍參謀、篠崎州理事官等人於 0700 自大里簡便御所出發，1220 通過武丹坑（牡丹）驛，於瑞芳午膳後搭乘肩轎往返金瓜石礦山，1655 分經過八堵驛，之後返回臺北（《臺南新報》1923 年 4 月 27 日五版、1923 年 4 月 28 日五版）。由此時間表可知，若扣除搭乘火車以及瑞芳與金瓜石之間步行往返時間，皇太子的御差遣使實際停留在金瓜石礦山的時間是相當有限的。

¹² 鄭春山，2007：144-146。

¹³ 這是臺灣總督府第四次奏請皇室巡視臺灣。第一次的奏請為 1912 年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在完成武力攻擊太魯閣地區原住民之後返回東京所提出，並獲得當時太子殿下允諾考慮來臺巡行，隨後臺灣總督府配合此計畫進行角板山及打狗山貴賓館新築工事及總督官邸修繕，然隔年（1913 年）明治天皇駕崩，此奏請皇室巡行臺灣的第一次計畫便告中止（吳馥甸，2005：2-7）。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任期間亦曾進行三次奏請皇室巡行臺灣，至 1923 年的第三次奏請才獲皇室同意。

成效的大好時機，透過皇室巡行此一具備「視覺支配」意象的統治儀典活動，強調君主制度絕對的統治權與神聖地位，對日本內地可以壓制自由民主的爭取，對臺灣亦可達到壓抑殖民地自治的聲音。而金瓜石為臺灣出產金礦品質最佳之處，乃展現臺灣總督府治理臺灣發展經濟的樣板之一，且是日資企業經營，因此臺灣總督府如安排此地作為讓皇太子了解臺灣礦業生產發展現況的範本是可以理解的。而以日人企業體經營者的角度而言，皇太子蒞臨廠區參訪及下榻是何等榮耀之事，因此配合總督府的行程安排，為此特地興建招待所的主觀動機也是合理的推測。但若是考量 1923 年金瓜石礦山實際營運狀況，當時正處於 1918 至 1925 年田中清即將退出，後宮信太郎即將完全入主的過渡時期，現實面金瓜石礦山的營運正處於第一次繁榮後的衰退局面，當時的主事者田中清與總督府殖產局之間對於營運的發展方向存在明顯的期望落差而出現爭執，田中清甚至自行將提煉設施炸毀¹⁴，以避免繼續生產帶來更多的成本虧損，因此，這個時間點挑選金瓜石礦區作為臺灣總督府展示殖民地礦業生產成效的樣板是存在幾許尷尬處境的。另外，若考量當時金瓜石的地理區位偏僻，交通相對較不方便，出入須搭乘人力肩轎（宜蘭線鐵道 1924 年通車，瑞芳與金瓜石之間的輕便鐵道則遲至 1931 年才通車¹⁵），且有疫病傳染（瘧疾）、土匪出沒等問題，臺灣總督府或皇室安排皇太子至金瓜石參訪或下榻的可能性也不高。

裕仁皇太子在臺灣 12 天的訪視行程幾乎都被安排在臺灣西部的五大城市及周邊區域，城際之間交通主要由鐵道串聯，各城市內部則由汽車（自動車）道路聯繫，參訪的單位都屬於臺灣總督府（官方）所屬或相關機構，產業類別的產地參訪僅有總

督府專斷獨賣的臺南安平臺灣製鹽株式會社鹽田及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工廠，以及臺南安平的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鹹水養殖試驗場，並未參訪其他私人財閥或實業家之產業設施，且皆下榻於臺灣總督府所屬的賓館或地方官邸、招待所，如總督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臺中知事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臺南知事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高雄貴賓館（和洋併置式建築）等¹⁶，並無私人會社所屬建築或民間友人宅第之類的「御泊所」。這些官方安排的參訪或宿泊地點都位於主要交通要地附近，鄰近火車站，並且有足夠的防禦腹地，可保持參訪過程及休憩地點的安全，由此可知，總督府安排的訪視與住宿地點除了需能彰顯殖民統治與產業發展成效之外，交通順暢與安全考量也是重要的考量點，這時，私人會社的招待所或賓館要成為「御泊所」的可能性相對是較低的。另一方面，皇太子巡行期間未曾下榻私人宅第或會社招待所、賓館等，除了出於安全的顧慮，同時也能保持皇室絕對的神聖尊貴地位，並且避免造成企業體或人民認為皇室或總督府偏頗片面者的情勢出現，有其平衡國內政經勢力及穩固國族與殖民統治意涵的考量。

整體而言，此棟建築就作為迎接太子而特別建造一事，或許存在主觀上的期望，但卻無客觀上的條件。主觀上臺灣總督府與日商會社或許都存在著祈求皇太子蒞臨金瓜石巡視的期望，當時整個臺灣島甚至都沉浸在一種隨時要迎接皇太子蒞臨的氛圍中，然而，客觀上黃金礦產並非當時官方專賣管制的民生物資品或國防工業相關產業，且金瓜石礦產地存在交通不便、衛生條件及防禦安全的顧慮，這些都降低了皇太子蒞臨的可能性，最終改以派遣御差遣使代為巡視的方式，應該是兼顧了各種需求

顧慮之後合宜的折衷因應表現。裕仁皇太子 1923 年的臺灣行啟為例年日本皇室抵達臺灣的最高層級，其返回日本 3 年後便登基成為昭和天皇，日後未再踏上臺灣一步，一直到 1945 年日人結束臺灣的統治，亦無其他皇太子再度蒞臨臺灣視察。因此，金瓜石太子賓館在整個日治時期，似乎成為一棟等不到太子蒞臨的「太子賓館」。

關於這棟建築是作為迎接皇太子巡行而特別於 1922 年建造的說法大約是在 2000 年之後才開始出現於雜誌或專書中，如朱瑞徵 2001 年的〈太子賓館小記〉、鄭春山 2004 年的〈太子賓館紀事〉、陳斐翊 2004 年的《黃金城傳奇金瓜石》等，這些文章可能是近年金瓜石「太子賓館」一詞的源頭，而這個興建目的與年代說法是目前最常被引用者，之後陸續出現此棟建築為「小型皇宮」，或是依照日本皇室規格建造的說法¹⁷，以及許多關於皇太子蒞臨金瓜石的傳聞¹⁸。而目前此棟建築的法定文資身分名稱即為「金瓜石太子賓館」，黃金博物館也於 2012 年出版名為《金瓜石太子賓館：身隱礦山的閃耀金光》的專書，並且在其策劃以金瓜石礦山歷史發展為背景，書寫於 2007 年的擬小說《孤寂的山城》中，亦曾鋪陳了國府時期具前清皇室血統的溥心畬先生受邀下榻此處的橋段，用來連結另類的皇族蒞臨景象。顯然認定此棟建築是與皇室成員保有脈絡淵源的「太子賓館」已成為當下大家對於此棟建築原初身分的「共識」，人們只在乎當初曾存在欲迎接太子入住的期望，而不在意太子是否真的蒞臨，或是否真的此棟建築是為了迎接太子所特地建造的。

金瓜石太子賓館另一個興建年代的推測為 1924（大正 13）年，主要來源為西川滿 1957 年所著之後宮信太郎傳記式小說《黃金の人》中述說後宮信太郎於 1925 年入主金瓜石礦山，當時礦山的設施包括俱樂部等多項建築，此「俱樂部」為日式木造覆瓦建築，寬度約 12 間（約 21.6 公尺，此規模大約僅為現今的 1/2），並有庭園設施。當時後宮信太郎抵達礦山時，由田中清為其介紹周邊環境，提到此棟建築為 1924 年所建，原作為貴賓室，後改為俱樂部。此棟建築由屋內走廊向北方的山下俯瞰，可見到紅磚造之鑛山事務所、工員住宅群、小溪、群山以及西沉的日落景象。這些描述除規模之外，大致都符合現今太子賓館的景象，因此此棟建築被認為有可能在 1924 年完工¹⁹。而由此也可以知道此階段這棟建築是被稱為「俱樂部」，而非「太子賓館」。然而目前太子賓館建築的面寬約 42 公尺，遠大於西川滿書中所述的 12 間寬（約 21.6 公尺），兩者在規模上的差異顯示可能指涉不同建築或同一棟建築在 1924 年曾進行增建，這些似乎又增加原初建造年代的不確定性，讓這棟建築的實際興建年代又蒙上一層面紗。除此，堀込憲二教授由繪製於 1931 年的建築圖上將「客室四」標示為「離れ」（別館），以及此空間與「管理入部屋」屋架上的上棟柱「幣束」樣式不同，因而推論兩者的建造年代可能不同²⁰，換言之，至少在日治時期昭和年間曾經歷一次之增改建，且其最初建造年代應該早於 1931 年，而最遲於 1931 年已達目前之規模。另由空間格局觀之，此棟建築的中央廊道轉折變化稍多，甚至存在高程差而需在廊道安置部分之踏階，且主入口深陷於應接室與客室一之中而顯現隱蔽性，與其他客室的開放性形成強烈反差，這些都可能顯示此棟建築曾經歷不同時期各自的需求而進行局部的增改建。對照金瓜石礦區日治時期

¹⁷ 陳斐翊，2004：100-103。

¹⁸ 甚至出現年邁日籍管家等候皇太子蒞臨的聊齋軼聞。

¹⁹ 堀込憲二，2007：13。

²⁰ 堀込憲二，2007：14。

¹⁴ 唐羽，1985：118。

¹⁵ 張璦文，1994：37。

¹⁶ 吳馥旬，2005：3-3-4；附 2-1-79。

幾經易主的歷史背景，或許每一個新接手的經營者皆曾針對廠區設施進行必要之調整，這當中便可能包括此棟建築的增改建。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金瓜石太子賓館最初的建造目的與完工年代都無較明確之資料可供判定，目前已出現的年代推論看來都是出自無法確定來源真實性或間接性的推論，因此，或許只能寬鬆認定其最初大約完工於 1910 至 1930 年代之間，並經過至少一次之增改建而達現今之規模。而就作為迎接皇太子蒞臨住宿一事，即便歷任的日資經營者或背後支持者臺灣總督府可能有主觀迎接之意圖，但客觀的歷史發展中，並無皇太子的實際抵達入住。

1945 年此棟建築隨鑛山產權移轉至「臺灣金屬礦物局」，由私人會社資產轉變為公營單位資產。1955 年「臺灣金屬礦物局」改組為「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此棟建築改名為「第一招待所」，或「第一賓館」，主要任務成為接待貴賓之招待所，這段期間，僅有達官貴人或臺金公司高層相關者才可能進入此棟建築，譬如前總統蔣中正、前副總統謝東閔及何應欽將軍等²¹。1987 年「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結束營業，土地與建物所有權轉移給台糖公司與台電公司，此棟建築則歸台電公司所有，並持續到今日，其實際的管理維護工作交由蘇澳電廠負責，而此階段的名稱則改為「深澳電廠金瓜石賓館」²²。

1987 年產權移轉後，金瓜石鑛山的結束運作致使此棟建築面臨乏人照料的荒廢敗落窘境，又遭逢數次颱風襲擊而嚴重毀損，台電公司遂於 1996 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修，乃目前所見之景象，然因為先前累積的各類損害過於嚴重，且修復過程欠缺詳實考證與整修紀錄，許多可供判定原初建造年代的關鍵性構造部位或構件形式可能皆已佚失或非原樣，使此棟建築的興建年代更難以藉由現存建築體本身尋找答案。

金瓜石太子賓館曾於 2001 年被文建會票選為《臺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當時使用的名稱為「瑞芳太子賓館」²³。2004 年配合黃金博物館的成立，開放局部庭園空間供民眾參訪，但是建築本體的室內空間並未開放。2007 年 3 月 14 日被指定為「臺北縣縣定古蹟」，正式擁有法定的文化資產地位，其官方名稱便是「金瓜石太子賓館」，2010 年 12 月 25 日隨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而變更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仍沿用「金瓜石太子賓館」之名稱。目前室內空間依舊未開放，仍維持僅開放局部庭園空間供民眾參訪。

在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從日治時期的日人會社資產到國府時期的官營資產，金瓜石太子賓館始終維持其神秘性，讓一般的民眾無法真正體驗其內部之空間景象，彷彿真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太子」神聖性階層空間藩籬籠罩之。



【圖 5】入口凹入，具隱蔽性及封閉性。（2011/10/29）



【圖 7】寢房由廊道圍繞（2011/10/29）



【圖 9】高爾夫球練習場（2011/10/29）



【圖 11】具西式風格的休閒空間（2011/10/29）



【圖 6】基座表面飾以 13 溝面磚（2011/10/29）



【圖 8】主要寢房（2011/10/29）



【圖 10】射箭場（2011/10/29）



【圖 12】主管單位堅持將外牆粉刷為淺紫色，使此棟建築被戲稱為「太紫賓館」。（2012/07/24）

21 鄭春山，2007：146。

22 由 1996 年台電的修護報告名稱推測。

23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2：36。



【圖 13】菁桐太子賓館空間示意圖（2015/08/20 繪製）

肆、菁桐太子賓館的歷史變遷

菁桐太子賓館的位置介於白石腳日式宿舍區與商店區、菁桐火車站之間，有獨立之區位，單獨位於基隆河左岸，環境清幽雅緻，與右岸白石腳其他日式宿舍區有所區隔。東側圍牆外的道路有橋梁（民生橋）通往右岸（南側）白石腳地區的宿舍群區域。

菁桐太子賓館的建築風格與金瓜石太子賓館類似，兩者的建築主體都屬於日式書院造風格，構造為外牆使用雨淋板的一層木造瓦葺型式，空間型態為中廊下型，由中央走道串連各個空間，並且具洋式風格的娛樂室。但菁桐太子賓館規模較金瓜石太子賓館大，中央廊道較少轉折，寢房逐層退縮的現象不明顯，因而並無雁型平面的特徵，且整體封閉性較高，表現較高的私密性，另外，入口玄關帶有部分西方歷史裝飾風格，如門板的彩繪玻璃、廊柱的 13 溝面磚、地板的馬賽克磁磚拼貼等。

²⁴ 陳勤忠，2011：3-52-54

菁桐太子賓館的主入口位於北側，較隱密；側入口位於東側，臨道路。內部空間主要為客房，並有餐廳、圖書閱覽室、廁所、浴室等服務性空間，亦設有撞球間、桌球室等休閒設施²⁴。此建築是臺陽會社招待貴賓以及舉辦會議、訓練、餐會或音樂會活動之場所，東側 10 間客房提供做為單身職員之宿舍，西側客房主要作為社長巡視廠區期間的寢房，後期並曾一度做為礦長之宿舍。由室內空間配置可知建造之初即有做為公共設施的機能考量，如撞球間、桌球室、圖書閱覽室等，但因為區位（與其他宿舍區隔著河流對望）的地理區隔及空間層級（鄰近日籍主管、技術員居住之日式宿舍區，一般臺籍員工、眷屬不容易接近）的無形隔閡，此棟建築並沒有成為以臺籍人士為主的礦工生活區之主要公共空間。而臺陽會社員工對於這棟建築的稱呼，主要是以「石底俱樂部」或「臺陽俱樂部」為主，從未出現「太子賓館」一詞的稱呼。

此棟建築於 1939（昭和 14）年開始興建，1940 年完工²⁴，距離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已有 17 年之久，兩者並無直接之關係。臺陽企業體與裕仁皇太子之間的聯想可能主要與顏欽賢成年之前在日本生活，以及日治時期與總督府官方互動關係的建立有關，另外，欲仁皇太子與顏欽賢兩人年紀相仿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傳聞昭和天皇（裕仁太子）的兒子明仁太子（現今的平成天皇）1959 年婚禮時，顏欽賢即為臺灣受邀的 3 位貴賓之一²⁵，由此可知顏家與日本皇室及昔日總督府方面的良好關係並不亞於在臺日資會社或財閥²⁶。甚至也有傳聞 1923 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期間原先預定入住的是顏家位於基隆的陋園，而非田中組在金瓜石所建造的太子賓館²⁷。然而臺陽會社決定在菁桐建造招待所的時間已是 1939（昭和 14）年²⁸，完工的時間點已是菁桐地區生產煤礦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是顏欽賢接掌臺陽企業體之後，決定以菁桐作為煤礦發展重心之地，配合新的礦場設施（主要為石底大斜坑的建造，建造完成後礦脈挖掘之煤可採系統性集約作業方式，統一由大斜坑出坑，以減少開採成本，增加工作效率）及大批礦工宿舍的完工而增設此「員工俱樂部」，一方面用作會社礦廠區事務所的門面以招待貴賓之用，平時則做為員工休憩的俱樂部，而此俱樂部也帶有行館的意味，是顏欽賢視察石底大斜坑廠區時的臨時居所，類似的員工俱樂部，臺陽公司在文山煤礦區及瑞芳金礦區（九份）也曾設置過²⁹，應該是建構會社在地區性礦場完整設施的一環。顏欽賢如此大規模且有系統的整

備礦區生產及員工生活設施，可以看出乃效仿日資會社的經營方式，致力於計畫性的統一生產模式，而有別於其父親顏雲年慣常採用的分包承租經營模式，藉以突破礦業生產的營運瓶頸。至於臺陽會社為臺資企業，為何會建造日式風格的俱樂部建築，這可能與顏欽賢受日本教育，在日本居住很長一段時間，生活習慣日式化有關，且該建築物完成於日治時期，當時可能下榻的貴賓以總督府相關官員或其他日資集團高層為主。另外，臺陽會社雖然為臺資企業體，但日治末期礦場的重要領導階層與技術職員皆以日本人為主，因此就作為招待貴賓的賓館機能或供員工休憩的俱樂部機能而言，建造成幾乎純粹日式風格的建築型態，都符合現實中可能使用此空間者的文化屬性與生活慣習。此棟建築鄰近日籍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區，也反映整體空間階層隱約分成較為高階的日籍宿舍建築群區域與較為低階的臺籍宿舍建築群區域。

戰後經歷一段產權釐清的階段，石底礦區於 1946 年重新回歸臺陽企業體掌控，菁桐太子賓館持續扮演臺陽公司在地方上的俱樂部與招待所角色，職員依舊稱其為「俱樂部」。1986 年，在臺陽公司即將結束石底煤礦開採時，顏家將菁桐太子賓館地上物售于王華飛居士（法號慧宗），並在原建築內為臺陽員工設置長生祿位，由居士早晚代為誦經祈福³⁰，此舉足見顏家念舊以及善待職工之心。之後居士將該建築命名為「渠蓮精舍」，成為佛修禪地，居士深入簡出，生活低調，與附近住民互動較

²⁴ 同前註。

²⁵ 張璦文，1994：61。

²⁶ 傳聞顏欽賢年輕時在日本求學與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為同窗，然此並非事實。裕仁皇太子的出生與去世時間都與顏欽賢相近，裕仁皇太子 1901 年出生於東京，1914 年於學習院初等科畢業，之後在東宮學問所讀書，1989 年去世（參考網路資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0469.htm>，擷取於 2015/7/28）。而顏欽賢 1902 年出生於基隆瑞芳，1918 年畢業於東京礪川小學，之後入群馬縣立高崎中學，1928 年畢業於立命館大學經濟科，1983 年去世，其整個求學階段雖都在日本度過，但似乎沒有與昭和天皇同窗的機會（興南新聞社，1943：104；唐羽，1999：418-424）。

²⁷ 顏家為此特地在陋園新建一棟「養浩樓」，準備做為裕仁太子蒞臨之「御泊所」，但事實上裕仁太子並未抵達。但 1929 年 5 月伏見宮博恭王率艦隊來臺灣演習，便曾在「養浩樓」居住達 7 天之久（張璦文，1994：61）。

²⁸ 菁桐太子賓館完工的時間點接近太平洋戰爭的時期，臺灣幾乎已經走入戰時體制時期。隔年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²⁹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146、羅濟昆，2009：131。

³⁰ 當時雖約定售價為 100 萬元，但顏家只收取 60 萬元，另外的費用則改做為在原建築內設置長生祿位之用，（許怡雯，2010）。

少，加上 1988 年臺陽公司結束石底煤礦的生產後已無相關職員進出，一般人到訪的機會更少，且庭院植栽茂密，外側又有圍牆與道路相隔離，使此棟建築物逐漸疏離地方居民的生活圈，最終成為一棟門院深鎖，保有距離感與神祕感的日式大宅第。1999 年王華飛居士過世，由其弟王華玉及子女接續繼承建物所有權。

在平溪線鐵道周邊觀光風潮逐漸盛行之後，2001 年菁桐太子賓館曾被文建會票選為《臺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當時的選拔名稱為「平溪臺陽俱樂部」³⁰。2002 年屋主配合社區營造的推動，將此建築以「菁桐太子賓館」之名對外開放。2003 年被臺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依建築物最初建造目的定名為「臺陽礦業平溪招待所」，使菁桐太子賓館正式擁有法定的文化資產身分與名稱。2007 年由公部門補助，進行建築本體調查，並於 2010 年至 2012 年進行大規模整修，目前維持有限度地開放民眾參訪。

這棟建築物開始出現「太子賓館」一詞的說法，最早的來源應該是 2001 年報紙文章以及文建會推出之百大歷史建築票選活動相關文宣資料的錯誤臆測，之後造成地方推動觀光發展時誤引資料，有一段時間，這棟建築物開放民眾參訪時便因為資料引用錯誤而以「太子賓館」的名稱自居，當然，這樣的稱呼很快就被停用。隨著文化資產身分的認定以及後續的調查、修復工作證明，菁桐太子賓館早已失去「太子賓館」這個看似張冠李戴的誤用名諱，而被重新以「臺陽礦業平溪招待所」作為公部門文資身分編列認定的官方名稱，以及以「沐心山

房-函雅和洋折衷日式書院造建築」（2012-2014）、「真樸齋」（2014-）等作為屋主經營建築活化再利用的地方名稱。

雖無真正的皇太子蒞臨，菁桐太子賓館歷年曾經接待過臺灣總督以及國府時期的許多達官貴人下榻，符合其作為招待貴賓的賓館身分，或是招待所的空間層級意象。而顏欽賢先生 35 歲即接掌家族企業，其事必躬親以及積極威嚴的經營風格，在職員眼中儼然就是臺陽企業體的「太子社長」，並有「天皇陛下」之暱稱³¹，對照臺陽會社白石腳日式宿舍區被冠以「皇宮」（礦長宿舍）、「北海道」區之濃濃日式風味稱呼，此棟作為「俱樂部」的建築保有一間會社社長（顏欽賢）巡視期間居住之主臥室，是足以對位被稱為「太子賓館」的。換言之，顏欽賢本人就是臺陽會社的「太子」，而非指裕仁皇太子，而「太子賓館」是指顏欽賢在石底大斜坑礦廠區的「行館」，而非等待皇太子蒞臨下榻的「御泊所」。而同一時期，類似此格局的臺陽企業體「太子賓館」，至少便包括石底、瑞芳（金瓜石）、文山等處³²，彷彿顏欽賢執掌期間在臺陽企業體營運範圍內所擁有的各地「行館」群。

基隆顏家向來表現出念舊與重視在地經濟發展及文化維護的精神，其後代雖逐漸淡出政治圈，但後續企業體的發展仍多根植於基隆、瑞芳一帶，具有明顯的地方區域性格。顏家將菁桐太子賓館以象徵性轉售方式托于王飛華居士照顧，一方面顯示希望藉由宗教力量來為員工祈福解厄，一方面也表露顏家顧念地方舊情份的在地精神，希望此一昔日被員工稱為「俱樂部」的舊建築仍能留在地方持續

³⁰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2：36。

³¹ 張璦文，1994：61；司馬嘯青，1987：62。

³²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146。

使用。而顏家在瑞芳、平溪一帶的礦業生產期間，幾乎供養了大半的在地經濟發展，在礦脈逐漸耗盡時，也因為顧及在地員工的生活而勉力經營，維持至接近 1990 年代，讓多數的員工獲得較長的轉職時間，其在平溪地區留下的平溪線鐵道及相關礦業生產設施已成為 90 年代之後當地發展產業觀光的重要文化資產，今日，平溪地區作為臺灣礦業生產年代的見證者而能接續發展地方性觀光遊憩活動，背後顏家實為重要之奠基者，有其傳達固守在地化的精神價值而足以為當代人所感念。



【圖 14】北側正入口空間（2012/07/14）



【圖 16】入口窗戶彩繪玻璃紋飾（2012/07/14）

伍、結論：沒有關係的關係—金瓜石／裕仁太子／皇室 & 國族—菁桐／顏欽賢 & 臺陽太子／在地

相較於日治時期的諸多官方高等官舍或私人會社賓館、招待所等，金瓜石與菁桐這兩棟太子賓館的空間格局與華麗程度並非特別突出，沒有龐大高層化的建築量體，也沒有特別炫麗的奢華裝飾風格，僅能說是規模較大、用料較講究、施作較細緻的日式傳統單層木造建築。



【圖 15】玄關地板使用小口馬賽克拼貼（2012/07/14）



【圖 17】入口門柱 13 溝面磚（2012/07/14）

歷史的發展中，兩棟太子賓館都沒有真正的皇太子實際蒞臨。但其初創最主要的機能都是作為招待所或賓館之用，都曾是一種會社（或公司）在礦產區的門面意象，相對於已消逝或僅殘留遺構的諸多生產設施、構造物，這兩棟太子賓館仍相對保存完善，其精緻的空間形式已成為現今回顧過往礦區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對於豐富在地文化資產的價值內涵，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金瓜石與菁桐的「太子賓館」一詞，都在近年的鄉土文化熱潮與工業遺產觀光遊憩發展背景中亟待故事性連結的氛圍下被重新塑造、標誌，賦予歷史想像，雖帶有許多販賣歷史情境之觀光宣傳操作痕跡，卻也呈現一種地方在地意識對於過往歷史追憶的殷切需求，以及表達對於地理邊陲現實中不願被邊緣化的歷史糾葛情結（曾有接近國家權力核心的機會）。

就各自的歷史發展背景以及區位文化資產保存狀況而言，這兩棟「太子賓館」無論有無皇太子（最接近國家權力核心的象徵）實際下榻過，皆不損其高貴神秘的氣質與承載地方未來遊憩發展的要角身分地位。在沉寂一段時日後，因為產權移轉，即使當地方觀光遊憩逐漸開展的同時，位處遊人容易經過的區位，卻仍舊大門深鎖自成一幽閉場域，延續過往的空間區隔階層性，依然保有十足的神祕色彩。這種年代抽離與空間隔閡所造成的距離感，以及人們對於過往日治時期昭和年間富麗傳聞的想像，共同攪拌醞釀出一種虛構的歷史厚度，成為遊人追憶與想像的起點。因此，這兩棟「太子賓館」不必然需要有皇太子的真實蒞臨，他們已成為當代人們對於礦區過往歷史「集體記憶」的一環，在各自身世發展的歷史表述中，獨有其自成一方、細數地方脈絡淵源的「太子」傳奇格局（遙遠的太子與在地的太子），或許傳奇故事的詮釋重點不在於事

件本身的真實成分，而在於人們選擇相信的賴以聯繫過往歷史的價值認同感，因而，在經歷一甲子以上的歲月流轉，這兩棟建築擁有的文化資產價值都足以內化轉換成為臺灣近代礦業發展史中不可取代且「貨真價實」的「太子賓館」們。換言之，在礦區生產期間，這兩棟太子賓館最貼近真實的身分乃作為會社門面的招待所之用，並兼具職員俱樂部、宿舍的功用。而在礦區生產停止後，這兩棟太子賓館則承擔了人們對於「太子」高貴階層與歷史距離感的傳奇想像身分，其揉合真實與虛構的身世表白便端看後續主事者如何面對普羅民眾的親身參訪後給予適切的歷史詮釋，讓表面沒有關係的背後關係，可以逐層被誠實且豐富地闡述。



【圖 18】具穿透感的室內空間（2012/07/14）



【圖 19】兼做宴客使用的座敷（2012/07/14）



【圖 20】「欄間」雕有日本三大名景的嚴島神社景象（2012/07/14）



【圖 21】主要寢房景觀（2012/07/14）（2012/07/14）

參考文獻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金瓜石太子賓館：身隱礦山的閃耀金光》，新北市：新北市黃金博物館。

台灣電力公司施工隊編，1996，《深澳電廠金瓜石賓館整修工程竣工報告》，臺北：台灣電力公司。

臺灣礦業會，1923，《臺灣礦業會報》第 98 號。

司馬嘯青，1987，《台灣五大家族 - 上》，臺北市：自立晚報。

朱瑞徵，2001，〈太子賓館小記〉《源》第 32 期。

吳馥旬，2005，《由 1923 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看都市空間之變化》，國立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唐羽，1985，《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繡助學基金會。

唐羽，1999，《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市：臺陽公司。

堀込憲二，2007，《太子賓館保存維護研究調查》，新北縣：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

張璩文，1994，《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張藝曦，2007，《孤寂的山城》，臺北市：麥田出版。

許怡雯，2010，〈王貞守護 70 歲老宅：菁桐太子賓館光鮮重生〉，《時報周刊》1703 期。

陳斐翡，2004，《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勤忠，2011，《菁桐地區礦業建設與地方空間結構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慈玉，1999，《基隆顏家研究：臺灣礦業史上第一家族》，基隆市：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編，2002，《2001 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年誌》基隆：臺陽礦業公司。

劉珮君，2011，《從礦業到文化產業：濱海山區聚落金瓜石變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春山，2004，〈太子賓館紀事〉《北縣文化》第 81 期。

鄭春山，2007，《昔日風華展金瓜》，臺北市：鄭春山。

羅濟昆，2009，《臺北縣資深藝文人士口述歷史文史類：九份臺陽江兩旺口述歷史專書》，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礦山寺廟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以金瓜石勸濟堂為例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 and Social Changes in Mining Town
– A Case Study of Quanji Temple in Jinguashi

王慧珍¹ Hui-Chen Wang

摘要

金瓜石地區的聚落興衰與金礦業密切相關。聚落因採礦人群集居而發展，供應民生物資及滿足常民信仰需求的商業、宗教設施也隨之興盛，進而出現熱衷投入宗教事務、社會救濟的地方頭人。本文擬聚焦於金瓜石地方公廟「勸濟堂」，試圖說明金瓜石礦山寺廟發展與地方變遷的歷史脈絡（尤其是產業面）兩者之間的關係，處理主題包括：金礦業興起、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的歷史過程；受金瓜石居民崇奉的關聖帝君，如何從「神威顯赫、法力無邊，可求財富福佑的武神」變成鸞堂信仰中「度人救劫的恩主」；因礦業而發跡的地方富商黃仁祥兄弟、簡深淵等如何投入勸濟堂經營；勸濟堂的道德教化、醫療救濟、漢學教育的多重社會功能；勸濟堂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以及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在地方觀光發展的角色。

關鍵字：金瓜石勸濟堂、鸞堂信仰、關聖帝君信仰、金瓜石媽祖遶境、金瓜石礦業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Jinguashi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Local settlements formed and developed as large amount of miners swarmed into this area. Then followed the appearance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religious facilities that accommodated people's living and spiritual needs. The community leaders who devoted to religious affairs and social relief also emerg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ocal temple Quanji Temple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empl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in Jinguashi. This article looks through the rise of Jinguashi gold mine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in terms of how the local settlements expanded and how Quanji Temple was established. Guan Seng Di Jun (Saintly Emperor Guan) was originally worshiped by Jinguashi residents as the “God of War, a stately and mighty god whose infinite power could make people rich and good-fortuned,” but then gradually this image evolved and He became a “merciful lord who save people out of calamities,” the image of god in the belief of Flying Phoenix Hall. The local businessmen the Huang brothers, Jian Shenyuan, and others became rich from gold mining,

and later involved themsel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Quanji Temple. Beyond religion-related practices, Quanji Temple provided multiple-layered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moral teaching, medical aid, and Chinese education to the communities. Quanji Temple solidified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fulfilled the immigrants' emotional needs as a cure for their homesickness. Today, even when the mining activities have come to an end, Quanji Temple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 Quanji Temple in Jinguashi, belief of Flying Phoenix Hall, belief of Guan Sheng Di Jun (Saintly Emperor Guan), Jinguashi Mazu Procession, Jinguashi mining industry

¹ 作者現為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研究助理 ab3471@ntpc.gov.tw。

壹、前言—關公與金礦山

來到金瓜石，還不知道「勸濟堂」之名前就會先看到一座巨大的關公銅像，手拿著書，背靠茶壺山而坐，俯視著腳下的聚落。根據「勸濟堂」三樓牆上的「銅聖像之簡述」，其乃「全臺首座關聖帝君純銅大聖像，高三十五臺尺，重二十五公噸。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日舉行落成大典。」該年是金瓜石礦業結束四年後。

走進銅像下的廟宇「勸濟堂」，三川門中門框的對聯寫著「勸世著明經聖訓皇皇昭日月·濟時安漢室忠心耿耿耀乾坤」，正殿供奉關聖帝君，其上方有「鑾下弟子黃仕春仁祥敬獻」的「代天宣化」匾。根據地方居民所言，「勸濟堂」是金瓜石地區的最大廟宇，居民又叫它「祈堂廟」²。其主祀的關聖帝君，居民也稱之為「恩主公」。銅聖像俯視的聚落，因為在「祈堂廟」下方，居民便稱之為「祈堂腳」。穿越祈堂腳聚落的階梯路則名為祈堂路。自日治時代起，至 1987 年礦業結束時，祈堂路除了聚居臺籍礦工外，也是金瓜石的主要商店街。街上林立各色商店，包括豬肉鋪、菜鋪、布店、西裝店、理髮店、撞球間、中藥行、雜貨店、小吃店、苦力頭店、診所…等等（潘偉華，2005，頁 26-28）。每年農曆 3 月至全臺各地陸續慶祝媽祖聖誕時，勸濟堂也會主辦金瓜石全區的媽祖遶境慶典。當天早上，所有鑾轎、陣頭、參與遶境的居民、遊客等，於勸濟堂前集合出發，繞行完金瓜石地區³後，再回到勸濟堂。該慶典是目前金瓜石地區最盛大的宗教活動，部份地方人士一直希望其能成為地方發展的觀光資源。



【圖 1】背倚茶壺山(獅仔岩山)的關公銅聖像，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圖 2】勸濟堂正面，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3】勸濟堂三川門對聯「勸世著明經聖訓皇皇昭日月·濟時安漢室忠心耿耿耀乾坤」，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4】勸濟堂「代天宣化」匾額，2015 年，張振恭提供。

² 「乩堂」音似「祈堂」，直到現在，金瓜石在地居民還是習稱勸濟堂為「祈堂廟」。田野資料尚未有關於當時「乩堂」是否有乩童問事的相關資料，尚待後續調查釐清。

³ 金瓜石地區屬新北市瑞芳區，行政區域包括瑞芳區銅山里、石山里、瓜山里、新山里等 4 里。

勸濟堂，位於金瓜石礦業時代最熱鬧的臺籍聚落裡，主辦地方最盛大的宗教活動，在礦業結束後，鑄造了全臺最大的關公銅聖像。近年來，地方人士又積極於該廟關聖帝君聖誕時籌備辦理「關公節」活動，希望以此吸引外移遊子返鄉及遊客來訪，以促進地方觀光發展。金瓜石地區，自礦業時代起，至現今轉型成以觀光旅宿業為主要生計，「勸濟堂」作為地方公廟，具有多種功能，滿足不同時代、不同信徒的生存需求。這也是本文意欲處理的主題。以地方公廟「勸濟堂」為例說明：金礦業興起、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的歷史過程；受金瓜石居民崇奉的關聖帝君，如何從「神威顯赫、法力無邊，可求財富福佑的武神」變成鸞堂信仰中「度人救劫的恩主」；因礦業而發跡的地方富商黃仁祥兄弟、簡深淵等如何投入勸濟堂經營；勸濟堂的道德教化、醫療救濟、漢學教育的多重社會功能；勸濟堂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以及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在地方觀光發展的角色。

貳、金礦業發展、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

一、因金礦而興的石尾等聚落與黃家兄弟

金瓜石位處臺灣東北部山區，背倚本山、右側有獅仔岩山（也稱之為無耳茶壺山），左前有基隆山，是個三面有山，北方低平入海的口袋形地形，行政區域屬於新北市瑞芳區。每逢冬季，東北季風長驅直入，至少四個月的雨季，又濕又冷（潘偉華，2005，頁 5-9）。因此地位居崎嶇山裡，交通不便，又因地形氣候關係，不適人居，故晚近才有移民入墾。西元 1886 年（清光緒 12 年），相傳有 5 戶農民移居金瓜石地區的碑仔尾（今金瓜石五號路五號寮小吃店一帶），蓋了五間草寮，以農耕

為業，五號寮的地名由此而來（波多野想，2010，頁 21）。移墾居民也在附近建造石砌小土地公廟，是金瓜石地區最早的廟宇，是為今日「金福宮」前身（林承瑋，2014，頁 99-100）。西元 1894 年，因發現大金瓜露頭，淘金客漸漸聚居於大金瓜露頭附近，陸續形成石尾、樹梅坪、茂風、金西坑、石腳、赤牛仔寮、水管頭、杉仔湖、祈堂腳、五號寮等礦工聚落。礦工聚居後，因應民生物資需求，此地開始有商業經營。當時地方上最有實力的商人為黃從、黃春、黃仁祥兄弟，他們在石尾經營雜貨業。日籍礦主入山後，因金礦業發展、勞動力需求大增，黃家兄弟又經營包工業，供應日籍礦主勞工。由於事業成功，累積財富，黃家兄弟後成為金瓜石地方頭人。



【圖 5】田中組時代的大金瓜露頭，引自 1914 年出版之《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黃家兄弟先祖為福建漳州人，於清末咸同年間來臺，先居於三貂堡大平溪尾寮，後移居牡丹坑，又移居金瓜石山區種植茶葉。金瓜石發現金礦後，黃從棄茶從商，經營有成，致富後搬離金瓜石，將事業交給弟弟黃春經營，黃春致富後也搬離，將事業交給弟弟黃仁祥。在地方耆老的回憶裡，黃仁祥在地方上非常受人敬重，漢學學養好，也通曉中藥。

黃仁祥是承接他哥哥的事業，成為苦力頭的包工，專門做日本人包工的頭家。他的漢文造詣很深，也對中藥有所研究。從以前老一輩的說法得知黃仁祥在金瓜石地方上大家都很尊重他，有時有什麼事情要裁決也都會請他出面，而且也是很公正，很得大家的尊重，算是地方上重要的頭人。（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89）

另一位地方耆老則談到黃仁祥仁慈的一面：

以前黃仁祥家的家風感覺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小時候比較怕他。可是我覺得他這個人很仁慈，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我父親以前是幫忙管理祈堂廟，所以我和弟弟在放學後都要到廟裡的花園幫忙澆花。有一天，我弟弟向我父親要求參加畢業旅行，被我父親拒絕。那時黃仁祥就坐在附近的一張涼椅上，聽到我父親的說法之後便對他說：你這樣不對！人的畢業旅行一生只有一次，你要讓他去。說完，他就從口袋拿出二十元給我爸爸，作為我弟弟參加畢業旅行的費用。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很仁慈。（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38）

嫻熟金瓜石歷史的唐羽為其撰寫「黃仁祥謚思碑」，現立於勸濟堂廟前，從其可看出黃仁祥所經營事業及對地方貢獻：

民國三年(1914年)，公既承攬礦山勞動請負，旋營商號曰金益昌，復兼營金煤二礦水產貿易諸業以起家，膺金山保正，瑞芳庄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諸職，為桑梓獻身者靡不竭力以赴，復以事神誠敬，二十六年任主事修建從春二氏草創之勸濟堂，益使廟貌巍峨著乎壯麗為今所見規模，其於山城之繁榮與有功焉，初日人之據臺民生維艱，來山之

人數以逾萬，黃金固貴寶藏有限，欲謀一工之位匪易，公之承攬採礦則門戶大啟，登其門者多納之，有才幹者力為提攜，使邑無凍餒之人，各安其家，鄉有小過為日吏〇者，挺身作保未嘗退避，里有因事爭者，事無大小化之使和，處世待人量大而宏，施醫濟藥凡諸善舉均居首倡至有令德之譽。（蔡明通，《黃仁祥謚思碑》）

在日治時代的金瓜石，黃仁祥是非常重要的且具人望的地方頭人，不僅經營雜貨貿易業、包工業、金煤礦業，也投身地方政治及慈善救濟，並戮力經營勸濟堂（後成為地方大廟），學習鸞法，希望以列聖仙佛的訓示教化世人，改正社會風氣。



【圖 6】日治時期金瓜石地方頭人黃仁祥⁴

二、金礦業興盛與勸濟堂成立

（一）從「神威顯赫的萬能武神」到「度人救劫的恩主」

1896 年，黃春在自己開設的苦力頭店供奉關聖帝君。該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鑛業規則」，規定只有日本人可以經營鑛業，並以基隆山南北軸線為界，將水金九⁵ 鑛山分為兩個鑛區，日商藤田傳三郎（藤田組）取得瑞芳鑛山（今九份地區）經營權；日商田中長兵衛（田中組）取得金瓜石鑛山經營權⁶。田中組並於隔年（1897 年）入山開始採

鑛事業。起初，田中組以大金瓜露頭（日人稱之為本山露頭）為中心開鑿一、二坑以從事開採事業，並於附近搭建事務所及住宿設施。臺灣鑛工則於露頭附近沿著溪流搭建茅草屋居住。不論日籍或臺籍居民，彼時大都聚居於大金瓜露頭附近以從事鑛業生產。從此，鑛工自四方湧入，金瓜石地區更見繁榮，黃氏兄弟的苦力及雜貨事業也更加興隆。

苦力頭店為甚麼供奉關聖帝君呢？地方耆老這麼說：

因為關公是仁義的化身，他們做苦力頭的，除了要祈求工人工作平安順利，並能順利發財外，經營苦力頭店賣東西給員工一定不能偷斤減兩，必需公正，而且領導員工也必須誠心帶人、真心付出。直到後來變成現在的祈堂廟，也都是勸善濟世。（地方耆老口述，吳文宗，2014，頁 46）

耆老口中的關公，也稱關聖帝君，歷史上真有其人，即東漢末年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的武將關羽。關帝信仰不僅流行於臺灣，在中國大陸也早已遍及各地，是官民都普遍崇奉的神明。從唐代開始，關公便被當做武神而納入官方祀典。到了兩宋時期，歷朝皇帝不停加封，由侯而公，由公而王，其在官方祀典的地位節節上升，民間各地關王廟的設立也日漸增多。元代時，關公廟更加普及，除了被當作武神崇奉，財神性格也出現了。到了明代，官方祀典為其設立專祠，皇帝並加封其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此時，關公有了「帝」的稱號。清代時，對關公的崇奉更是遍及官民，官方視其為至高無上的戰神、武神，在各級政府所在地都設有關帝廟，並且規定官員定時祭祀。

民間各行各業，尤其是商人與秘密會社，因為關公象徵忠義、武勇、神威顯赫、法力無邊，也都崇奉關帝。在臺灣，鄭氏治臺時就建有關帝廟，清朝統治時期因官方祀典的規定，官設關帝廟逐漸增加，並漸漸流行於全臺。寺廟，私壇，商家，民居等都常見供奉關帝以祈求福佑與財富（林富士，1995，頁 117-129）。金瓜石鑛山的苦力頭店內之所以供奉關聖帝君，推測應是基於前述的歷史脈絡，源於商人崇奉關帝的民間信仰。

1899 年，臺籍鑛工逐漸往石尾下方聚居，隨著居民遷移，黃春也將店裡供奉的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寮，改稱「乩堂」，並於堂內增祀孚佑帝君（呂洞賓）、司命真君、王靈天君。由「乩堂」名，推測當時可能有扶乩問事的信仰活動。原來苦力頭店舖內供奉關聖帝君，是因為民間將其視為法力無邊的神明，除忠義武勇之外，也具有財神的屬性，希望藉助其神力以保佑商業興隆、財源廣進。然而，臺灣清末以來的鸞堂信仰也供奉關聖帝君，將其視為救世的「恩主」，並且相信「關帝當玉皇」，由關聖帝君接任玉皇大帝以拯救世人。改遷至赤牛仔寮的乩堂，內中除供奉關聖帝君外，其它增祀的三位神明，都是臺灣鸞堂奉祀的恩主。由前述，此時，關聖帝君已由商人店舖內的「神威顯赫的萬能武神」轉變成鸞堂信仰度人救劫的「恩主」。也顯示，改稱乩堂當時，黃氏兄弟已有扶鸞濟世的想法，才會於堂內增祀鸞堂信仰的神明。隔年（1900 年），「乩堂」改稱「勸濟堂」，黃春、黃仁祥兄弟至淡水行忠堂學習鸞法，並於當年在行忠堂鸞生的協助下扶鸞寫出《如心錄》。這也是勸濟堂迄今以來唯一的鸞書。

⁴ 圖片引自「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http://goo.gl/l9zrki>

⁵ 水金九，包括水滴洞、金瓜石、九份三個聚落。

⁶ 金瓜石鑛山區域包括今金瓜石、水滴洞聚落。

1902 年⁷，因為赤牛仔寮聚居太多人、太擁擠，且當時勸濟堂僅為一草堂，空間侷促，乃由勸濟堂恩主“駕輦”擇定於現在廟址的大拜亭興建新廟⁸。從勸濟堂成立那年（1900 年）開始，日商田中組在本山露頭第一坑下方 300 公尺處陸續興建製煉工廠及職員、礦工生活所需的設施。歷經 10 多年建設，到了 1912 年時，陸續完成包括第二製煉

所（後改為泥鑛製煉所）、第三製煉所、第四製煉所（後改為搗鑛製煉所）、第五製煉所、員工住宅、郵局、宗教設施、學校、醫院、派出所等。這些設施大致座落於今地質公園以下山坡地、黃金博物館園區內、時雨中學、瓜山國小、五號寮小吃店一帶。同時，臺灣礦工則在勸濟堂下方山坡地建屋聚居，形成祈堂腳聚落。



【圖 7】金瓜石今昔對照，上圖引自 1914 年出版之《金瓜石鑛山寫真帖》，下圖由駱淑蓉於 2013 年拍攝。



【圖 8】關公銅聖像與祈堂腳聚落，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⁷ 依據黃仁祥所題之《勸濟堂沿革》，勸濟堂內，1937 年。

⁸ “以前（祈堂廟的前身神壇）會從石尾搬到赤牛仔寮是因為上面慢慢卡冷啊（較不熱鬧了），漸漸往下面來（向下發展）人要上去拜不方便，所以就搬到赤牛仔寮來。後來因為赤牛仔寮這住不下去了，才會搬到這裡來。我們這個地方不是地理師“牽的”（選的），是恩主自己“駕輦”選的。就是軟轎抬到這裡恩主自己“駕輦”的”（耆老口述）。引自潘偉華，2005，頁 3，《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廟宇歷史篇》，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委託。

（二）因礦業發跡的地方頭人

1925 年，金瓜石鑛山轉手予煤礦業者後宮信太郎，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繼續經營。再於 1933 年由日本財閥之一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接手鑛山經營。日鑛公司投入巨資，積極進行全山設備機械化，廢棄原有選礦場，於水湳洞興建年處理量可達 100 萬噸、並具備當時最先進選礦技術與設備的全泥浮游式選礦場⁹以及氰化製煉所，並在濂洞溪左岸興建日籍職員的宿舍。彼時，鑛山採礦事業欣欣向榮，勞動力需求大增，不僅吸引臺灣各地勞工來山挖礦，也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沿海省分的勞工。根據統計資料，1935 年時，在金瓜石鑛山工作的日籍職員有 709 人，臺灣礦工有 3,539 人，中國大陸籍礦工有 1,592 人¹⁰。1938 年，金瓜石鑛山產能達到高峰，獲得「亞洲第一貴金屬鑛山」美名。

因礦業榮景，金瓜石地方社會出現更多因礦業致富的地方頭人，與勸濟堂經營有關的，除了前述的黃仁祥兄弟，還有簡深淵，游阿秋，兩位也都是鑛山著名的包工頭，承攬礦石的運輸業務或鑛山工程，也經營苦力頭店、中藥行、當過地方保正等。在 1934 年勸濟堂改建時，即由黃，簡，游三位擔任重新建築委員會委員，出錢出力，奔走募資。至今還可在勸濟堂廂房看到黃、簡兩位照片。

簡深淵，地方上人稱“深淵叔”，原居貢寮，因家貧，14 歲起即到金瓜石鑛山受僱於黃從、黃仁祥兄弟，因為勤奮努力頗獲賞識，後自立門戶成為苦力頭，承攬鑛山坑內外運輸工作，是當時除了黃仁祥外最大的苦力頭，曾與黃仁祥合資經營苦力頭店“金益昌”¹¹。

以前黃仁祥和簡深淵聯合一個苦力頭店仔叫“金益昌”，他們二位算是咱這裡卡大的苦力頭店仔。黃仁祥他人算是很慈悲，什麼事情他講一講就好了。他和日本人關係也很好，也都有“交陪”。大家都叫他“頭家”比較多，或是“仁祥仔叔”、“仁祥仔伯”。像深淵也是，人家都叫“深淵仔叔”、深淵仔伯”。以前深淵這邊的工人也可以去仁祥那邊拿東西（雜貨店）。（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4）



【圖 9】金瓜石地方頭人簡深淵¹²

我阿公賺錢後，陸續投資煤礦商店、運輸等行業，並在雙溪等地購買田地。他雖沒讀過書，也不識字，但憑其辛勞苦幹，誠信負責與急功好義，所以金瓜石大家都稱他為深淵頭，而在貢寮故鄉的鄉親們均尊稱他為深淵叔公。（地方人士口述，吳文宗，2014，頁 65）

游阿秋，宜蘭出生，日治時期到金瓜石來尋求發展，是鑛山大包工頭，承包當時金瓜石諸多工程，包括日鑛公司的水湳洞選煉廠、金瓜石神社的駁坎、大部分的日式宿舍、斜坡索道、豎井、基隆山隔頂到雙溪的軍用道路（即今之 102 縣道）等。他也參與地方政治事務，當過臺北州評議員及金瓜石保正。（吳文宗，2014，頁 25）

⁹ 即為觀光客稱之為「十三層遺址」的水湳洞選煉場，位於濱海公路濂洞灣上方，2007 年正式登錄為臺北縣歷史建築。

¹⁰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金瓜石地方礦業歷史研究調查》，頁 51。民國 99 年 12 月出版。

¹¹ “金益昌”位於今祈堂路 180 號。

¹² 圖片引自「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http://goo.gl/EZWKHly>

我阿嬤說我爺爺為人很有禮貌，又很隨和，對公益事件更是熱心，金瓜石不論是橋斷了或是路壞了，我爺爺知道後都會自費請工人修復，尤其是在颱風過後，他更是積極的出錢出力為地方修復，所以在地方上很有聲望。我不記得我家有多少工人，只記得每次在發餉日時，總有一批一批的工人輪流到我家來，把屋子及院子都站滿了。（地方人士口述，吳文宗，2014，頁 23）



【圖 10】九份往雙溪之 102 縣道，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參、勸濟堂的多重社會功能

一、作為鸞堂的勸濟堂一代天宣化，勸善濟世。

清光緒中葉至日治時期，大約六十年間，臺灣社會出現了很多以扶鸞¹³為主要宗教儀式、並崇奉恩主的民間教派，其主事者多為信奉儒家思想的地方文人、仕紳。許多鸞堂甚至就是文人仕紳原來的書房，例如，淡水行忠堂便是由淡水仕紳李宗範（錫疇）於 1899 年在其書齋明倫閣所設。鸞堂有幾個重要的活動，包括慈善救濟（尤其是對貧困者的醫療救濟）、宣講勸善、鸞書著作等。許多鸞堂的鸞生本身就精通岐黃。某些鸞書也會附上簡單的藥方，希冀能透過鸞書的流通而使一般信眾得以具備一些簡單的醫藥常識。除了慈善事業，宣講和扶鸞著書也是鸞堂很重要的工作。因為鸞堂信仰認為人世間的災禍是因世人的不道德行為而導致上天懲罰，所幸恩主憐憫世人、下凡救劫，因此藉扶鸞傳下許多訓示（鸞書），希望世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宣揚恩主訓示，鸞堂設有「宣講生」一職，定期將扶鸞所得的神仙勸善訓文向社會大眾宣講。因此，常可在鸞堂中看到「代天宣化」的匾額。根據學者估計，清末至日治結束的六十年間，臺灣設立的鸞堂大約有一百五十所，遍佈臺灣南北，而經由扶鸞著作的鸞書則將近兩百本（李世偉，2008，頁 271-290。），是當時很興盛的民間教派。地處東北角偏遠山區的金瓜石，也在日治初期，1900 年，跟隨上這股仕紳文人淑世濟民的理想與民間信仰結合的風潮，成立了勸濟堂。和淡水行忠堂不同，勸濟堂前身並非書房，而是地方富商店內的私壇。相同者是，勸濟堂主事黃仁祥，「束髮從師習學，聞一反三，旁通多藝，岐黃樂理，罔不幽探」¹⁴，熟諳漢學醫理，並於堂內提供青草丸和教授漢學的免費服務。

¹³ “扶鸞，又稱扶乩，原是中國古老的道術，明清時期成為士大夫文人之間的遊藝活動，或用以猜科考題目，或用以斷頌，問事等。臺灣的扶鸞活動在清代中葉前便出現，不過仍不脫士人遊藝性質，清末之後才出現許多以扶鸞為主要宗教儀式的宗教團體——鸞堂，鸞堂的扶鸞儀式是由乩手（正鸞生），經過請鸞的儀式後，由神靈附於人身推動筆或桃枝在沙盤中寫字，旁邊有唱鸞生逐字報出，由錄鸞生寫下，就成為一篇鸞文，鸞文累積至一定數量便可集結成書，這便是鸞書（鸞作善書）。其參與成員（鸞生）大都為仕紳文人，他們所崇拜的主神為三恩主或五恩主（包括關聖帝君，孚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岳飛，豁落靈官王天君等”。引自李世偉，2008，〈日治時期鸞堂的儒家教化〉，《臺灣佛教，儒教與民間信仰》頁 271。

¹⁴ 引自蔡明通（唐羽）著，《黃仁祥謚思碑》，現立於勸濟堂前。

勸濟堂自成立起即辦理青草祭，於端午節時，召集地方居民，抬著恩主軟轎，跟隨恩主指示，一行人沿著東北角海岸南雅、和美、福隆等地，採摘藥草回來製作青草丸供居民免費索取，期能幫助生活清貧、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礦工。

咱祈堂廟最特殊的是“青草祭”，今年“財庫”（倉庫）還有，所以今年免做。青草祭就是五日節（端午節）這日差不多早上八點多，恩主“駕輦”，抬軟轎出去外面，然後“起鍊”，軟轎會指示，指這樣就拔這樣，指這一片就拔這一片的青草仔。一趟出去大概有五十人左右。吃午飯都在“澳底”吃，原本都是從廟裡抬點心過去吃，後來“哩佬”那邊的人家很好，好幾戶人家就請大家去他們家裡吃，一戶分幾位這樣，可是因為集合不方便，所以就改在麵店裡吃。咱附近基隆山青雲殿以前曾經也做過好幾年，可是做不起來，青草仔不會整顆硬硬（失敗）。

青草仔採回來要先洗過鋪開瀝乾，然後隔天再把這些青草拿去“斬”，再拿去“今”（捶），看採幾袋回來，就要“斬”到完、“今”到透，差不多要“今”一個禮拜。出去都固定一尊恩主公出去，哪一尊就要用爻杯來決定。咱這青草祭是在赤牛仔寮就開始。以前因為醫藥不發達，咱這青草仔很有銷。像咱這求回去，一次拿六粒，把它捶乎破，一粒用三碗水去煮成一碗。不過，要先問過恩主要不要賜藥。

咱仔廟叫勸濟堂，勸就是勸善，濟就是濟世。所以信徒來求青草仔回去，不一定要添油香，這是看個人的心意。（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3）

¹⁵ 《如心錄》內容可參考後附之《如心錄》目錄表。

為了改善社會風氣、“勸善濟世”，地方仕紳黃仁祥兄弟與林輓、呂進、李窗聲、陳瑞發、吳金在等人，於 1900 年扶鸞寫出鸞書《如心錄》。該書有元、亨、利、貞四部，共計有七十五位列聖仙佛降鸞訓示，訓示內容多是勸諭世人行善去惡，戒除賭博、嫖淫、洋菸（鴉片）等不道德行為，以及因果報應故事等¹⁵。訓示皆以詩文呈現，沒有漢學根底無法扶鸞，也難以理解鸞書內容。由於缺乏具漢學基礎的鸞生，勸濟堂目前已無扶鸞寫訓的儀式。

以前咱這有扶鸞，現在就沒人才，就沒了。咱這是文鸞，不是乩童，我們所有寫出來的內容和信徒都沒有接觸。就是抄錄寫好以後，看信徒要問什麼再從抄錄的內容去解釋。咱這裡扶鸞寫出來的都是詩，就要解詩。有的詩都是古語，有的都解不出來，冊讀不到那，是解不出來的。卡早咱廟這有出一本“如心錄”，是咱開廟在赤牛仔寮那裡做出來的。咱這現在休息，沒在做。

卡早若要問就要好幾個“卡肖”（人手），像扶鸞的二個、抄錄的一個、“品調”的一個，大概要四、五個才能做。每天晚上差不多八點左右，要問的人就來。（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1）

雖然目前沒有史料可說明勸濟堂曾有宣講的活動，但從《如心錄》可以看出，主事者淑世濟民的理想與用心。除了扶鸞寫訓、出版鸞書以教化居民、製作可免費求取的青草丸，根據地方耆老回憶，勸濟堂廟方在日治時代曾延聘通漢文的老師免費教授居民詩經、大學、三字經、千字文等，在當時日本語的教育體制內保存漢文化與儒家傳統經典。

我住在廟裡的時候有讀過一段時間的漢文。是一位叫李謙先的清朝秀才來教漢文。那時候有許多人來這裡讀，有的讀詩經、大學這些。我那時候是讀三字經、千字文這些初級的，大概是十來歲讀公學校的時候。(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35)

二、作為地方公廟的勸濟堂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勸濟堂會舉辦媽祖遶境的宗教慶典。在農曆春節過後，大約農曆二月初，勸濟堂會先舉辦北港進香，召集信眾和堂裡供奉的北港媽祖一起到北港朝天宮進香。礦業結束近 30 年後，金瓜石人口外移非常嚴重，目前人口大約 1,230 人，但民國 104 年的北港進香活動仍然有 4 車信眾。參與進香活動的信眾，除了金瓜石在地居民外，也有移居到基隆、新北板橋中和、桃園等地的金瓜石外移子弟報名參加¹⁶。



【圖 11】勸濟堂鸞筆，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2】勸濟堂鸞書，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3】勸濟堂青草丸，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4】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圖 15】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圖 16】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¹⁶ 依據廟方資料，104 年度北港進香的日期為 3/28(六)、3/29(日)(農曆 2/9、2/10)，共計有 4 車，香客上車地點為勸濟堂、瑞芳、暖暖、七堵、中和、板橋、桃園龍潭等。第一天拜訪彰化南瑤宮、鹿港新祖宮、鹿港天后宮、麥寮拱範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第一天夜宿北港朝天宮。第二天一早請火，回程拜訪斗南順安宮。

北港進香結束後，勸濟堂會召開「迎媽祖」的工作籌備會議，近年來，「迎媽祖」都由廟方和各里里長主辦。人口外移導致人力、經費不足。抬轎人力不足，以僱工方式解決，經費則來自居民自由樂捐。各里里長會向有意願的居民（以戶為單位）收取費用，樂捐金額多寡不拘。從表一可看出，勸濟堂所在地的銅山里里民，不論在參與戶數比例以及樂捐金額上，相較其他里都較為踴躍。籌備會議也會決定遶境路線。隨著人口外移，聚落變化，



【圖 19】金瓜石媽祖遶境，神轎陣頭行經祈堂路（祈堂老街），2013 年，王慧珍拍攝。

繞境路線並非一成不變。日治時代的「迎媽祖」遶境範圍包括金瓜石、水湳洞。大約 1990 年代¹⁷後，金瓜石、水湳洞兩聚落於同日各自舉辦媽祖遶境慶典。以往的媽祖遶境路線也不會經過五坑。黃金博物館開館後，遶境路線才改經五坑。下博物館櫻花道後，在博物館行政辦公室前暫停，博物館贊助的陣頭會在門前表演，領紅包，甚至會繞進行政辦公室一樓。



【圖 17】金瓜石媽祖遶境，2013 年，神轎陣頭於勸濟堂集合準備出發遶境，王慧珍拍攝。



【圖 18】金瓜石媽祖遶境。



【圖 20】金瓜石媽祖繞境路線，2014 年，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

參與遶境的神明除了北港媽祖，還有基隆媽、煥子寮媽、關渡媽、頭城大里天公（玉皇上帝）、勸濟堂恩主、保民堂仙公（神農大帝）、金福宮福德正神等。在「迎媽祖」慶典前一天（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各里里長會被分派至不同宮廟請神到金瓜石。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子時，廟方依例辦理祝壽儀式、扮仙等。二十三日早上八點左右所有神轎、陣頭於廟前集合，出發遶境。

在人口零落的金瓜石，「迎媽祖」是現今居民參與最多的地方盛事。在金瓜石、水湳洞耆老回憶裡，自日治時代開始，「迎媽祖」就是地方最熱鬧的慶典，礦業興盛時，勸濟堂前有十幾棚戲同時上演，家家戶戶辦桌請客，供應社酒類商品銷售一空，豬肉銷售量大增，去廟裡參拜的香客絡繹不絕。從遶境範圍、北港進香的香客組成、地方各里長參與等，顯出勸濟堂的公廟性質。透過「迎媽祖」慶典，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子弟對家鄉的情感。年復一年提醒在地人及外移子弟，金瓜石是「我的家鄉」、是「我的故鄉」。

【表 1】金瓜石地區 104 年迎媽祖各里樂捐戶數、金額統計表						
金瓜石地區里別	戶數	人口總數	樂捐戶數	丁口錢樂捐金額總數	樂捐戶數 / 總戶數	每戶平均樂捐金額
瓜山里	116	210	43	43,900	37%	1,020
石山里	195	382	77	77,700	39%	1,009
新山里	205	413	77	50,700	38%	658
銅山里	111	227	71	88,200	64%	1,242
備註： 1、媽祖遶境總收入 290,500 元，總支出 258,571 元。 2、勸濟堂位於銅山里。 3、瑞芳區共計有 34 里，41,024 人。金瓜石四里共有 1,232 人。						

資料來源，勸濟堂及新北市人口統計網站 104 年 5 月份資料。

17 依據地方文史工作者林文清口訪資料。

肆、勸濟堂與礦業結束後的觀光發展想像

1987 年，臺金公司結束營運，金瓜石地區自清末以來的生計命脈至此結束，金瓜石居民紛紛外移出去找生計。留居山上的居民也開始思索未來，希望能在家鄉找到生存之道。1990 年代，金瓜石居民曾經成立“金瓜石地區復興礦業促進會”，及“金瓜石觀光促進會”兩個地方組織來擘畫地方未來發展。由地方組織可看出，礦業結束後初期，在地居民對於未來的想像在“復興礦業”及“觀光促進”兩條路線之間競爭。1991 年，勸濟堂出資完成了全臺首座關聖帝君大銅像及報時山下的大停車場，希望以此吸引觀光客上山參拜，還可參觀附近留存的礦業遺跡。目前，金瓜石的主要產業為服務觀光客的餐飲旅宿業，但迄今尚未發展出像九份老街一樣的商店街，合法民宿的數目也僅有 8 家¹⁸。2011 年，在地方熱心青年、各里里長、瓜山校友會、臺灣城鄉發展協會，及勸濟堂的協力合作下，創造了“關公節”活動，結合農曆六月二十三日的關聖帝君聖誕，地方人士以勸濟堂為中心，設計了

觀光客導向的活動，希望將觀光客從黃金博物館導引至祈堂老街，沿著祈堂路至廟前參加活動、促進周邊商店街的消費。這是近年來，由地方人士自籌經費，自行籌備執行的觀光活動中規模最大者。該活動從 2011 年持續辦理至今（2015 年）。

以往關聖帝君聖誕時，居民會拿龜造型的供品到廟裡祝壽，早年，這些供品大都是居民自家製作，以米糕為材料塑型成龜狀。近年來，祝壽龜供品的食材越來越多樣化，有麵線、沙琪瑪、綠豆椪、糕餅等。這些祝壽的龜供品，儀式結束後提供者可以自行拿回家，也可以留在廟裡讓信眾以擲筊取得神明同意後拿回家。這些信眾相信，這些祝賀神明聖誕的龜供品帶回家和家人分享，可以“吃平安”，獲得福佑、財富、好運氣。和其他地方不同，勸濟堂關聖帝君的乞龜習俗沒有「加倍奉還」的規定。求得龜供品的信徒，來年除了送原尺寸的龜供品來祝壽，可視自己心意多送一隻龜供品，尺寸大小則不拘¹⁹。金瓜石地方人士從關聖帝君聖誕的祝壽龜造型供品以及金礦山產黃金這兩件事情得到靈感，進而“發明”（自勸濟堂成立百年歷史裡從來沒有的活動）了“擲筊得金龜”的觀光活動。遊客繳交報名費後得以參加該項活動。主辦者坦言希望以此造成話題，吸引觀光客。



【圖 21】關公聖誕時信眾祝壽用的龜造型供品，2014 年，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

18 金瓜石合法民宿資料引自 <http://taiwanstay.net.tw/Home/Search>

19 依據筆者 2015 年與廟方人員的口訪資料。

伍、結論

本文聚焦於金瓜石地方大廟「勸濟堂」，試圖說明礦山寺廟發展、金礦業興衰，與地方產業從礦業到觀光的變遷過程。在金瓜石，礦業興起、聚落發展，產生地方富商。地方富商又投入地方宗教事務，主導廟宇發展。從本文案例可以看到，臺灣地方社會的廟宇，是臺灣民間社會的重要公領域，滿足人民的多方面的生存需要。除了滿足居民的信仰需求，也兼具道德教化、醫藥救濟、漢學教育等社會功能。另，地方公廟，藉由辦理全區的宗教慶典，例如勸濟堂主辦金瓜石地區的媽祖繞境，也具有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在原有生計沒落後，廟宇傳統慶典甚至成為地方居民對未來的生存想像。以金瓜石為例，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廟方整建停車場、打造關公銅聖像，做為觀光亮點。雖然，地方政府以成立礦業人文歷史主題的博物館作為振興地方的手段，然，某些地方居民一直覺得沒有從博物館營運所帶來的人潮裡得到預期的利益。近來，地方人士從勸濟堂的宗教慶典得到靈感，自行籌備辦理「關公節」，試圖以「擲筊得金龜」的活動行銷家鄉。

未來，勸濟堂與金瓜石觀光發展的關係值得觀察，可進一步探究信仰與觀光之間的關係。例如，地方居民如何以既有的信仰活動裡的元素轉化成刺激觀光客消費的「商品」？哪些居民主導這個過程？在新的觀光產業裡，又是哪些人有機會成為地方頭人？此外，九份、水湳洞等地在日治時代也曾有扶鸞、崇奉關、呂恩主的民間信仰。例如，九份民間傳說，顏雲年之所以會向藤田組買下瑞芳礦山經營，是因為到木柵仙公廟向呂仙公（呂洞賓，也稱孚佑帝君）求夢，得到仙公指點（張璦文，1994，頁 59）。而田中組時代的水湳洞，曾有名為呂瑞乾的礦工於該地的鸞堂扶鸞，為居民提供醫療

問事的服務，後來更移居基隆創辦了基隆代天宮（主祀孚佑帝君）²⁰。故，可進一步探究恩主崇拜（鸞堂信仰）與礦業之間是否有特殊關係。本文作為一個初步的整理分析，希望後續能以金瓜石的民間信仰的相關資料理解不同時代裡的人們的生存樣貌。

致謝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委員的審查意見，對於初入門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的筆者來說獲益良多，並使本文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 吳文宗，2014。《1942 金瓜石事件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再續計畫成果報告書》。臺灣，臺北市：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未出版。
- 李世偉，2008。〈日治時期鸞堂的儒家教化〉，收錄於《台灣佛教，儒教與民間信仰》。臺灣，臺北縣：博揚文化。
- 林承緯，2014。《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臺灣，新北市：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 林富士，1985。《孤魂與鬼雄的世界》。臺灣，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 波多野想，2010。《金瓜石地區礦業歷史研究調查》。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 張璦文，1994 年 10 月。《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未出版。
- 黃仁祥，1937。《勸濟堂沿革》。臺灣，新北市：勸濟堂廟內牆上。
- 潘偉華，2005。《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廟宇歷史篇》。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 潘偉華，2005 年 12 月。《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 -- 聚落地景篇》。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 蔡明通（唐羽），（無日期）。《黃仁祥謳思碑》。臺灣，新北市：勸濟堂碑文。
- 林瑋嬪，2005。〈台灣廟宇的發展：從一個地方庄廟的神明信仰、企業化經營以及國家文化政策談起〉，《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56-92。

- 林瑋嬪，2013，〈為何要建廟？從廟宇興建的物質化過程探討馬祖社群再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1-33。

²⁰ 資料引自基隆代天宮網站 <http://www.tai-tien.org.tw/index.asp>

【附錄】

附錄 1

《如心錄》目錄，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頁：264-267

	神祇			神祇	
元	孚佑帝君	論	元	孚佑帝君	詩
元	柳星君	歌	元	將軍廖	詩
元	本堂帝君韓	詩	元	孚佑帝君	詩
元	將軍廖	詩	元	紫微星君	詩 勸孝文
元	齊天大聖	詩	元	值日功曹歐陽	詩 論
元	太白金星	詩 行善消災種福文	元	白礁保生大帝	詩 戒庸醫歌
元	清水真人	詩 勸兄弟文	元	本帝帝君韓	詩
亨	文昌帝君	玉詔 詩	亨	司命真君	詩
亨	豁落靈官	詩	亨	監理堂務歐陽	詩 戒賭文
亨	何仙姑	詩 戒寵妻生亂文	亨	鍾離仙翁	詩 戒富有不樂善文
亨	韓湘子仙翁	詩 戒交友不信友	亨	李仙翁鐵拐	詩 喚夢歌
亨	張仙翁果老	詩 勸敬老慈幼文	亨	曹仙翁國舅	詩 戒口過傷風文
亨	藍仙翁采和	詩 戒嫖淫文	亨	金剛仙翁	詩 戒洋菸文
亨	丁仙姑	詩 教女子文	亨	麻仙姑	詩 戒婦女不勤文
亨	監理堂務歐陽	詩	亨	哪吒太子	詩 人情鄙薄曲
亨	南海觀音佛祖	詩 勸烈女文	亨	韋馱尊者	詩 戒男子沉溺閨房文
亨	善才童子	詩 戒賭博文	亨	閒遊老祖	詩 戒鬧房文
亨	赤腳大仙	詩 畏妻歌	亨	本堂帝君韓	詩
亨	孚佑帝君	詩 論	亨	燃燈道人	詩 贊鸞堂文
亨	大太子關	詩	亨	彌勒祖師	詩 勸賭生文
亨	桃花聖母	詩 戒邪法害人文	亨	孚佑帝君	詩
亨	香山老祖	詩 戒圖佔人產業文	亨	白鶴仙翁	詩 戒聖蹟不惜文

亨	赤松子	詩 勸修路造橋文	亨	太陽星君	詩 戒和睦宗族文
亨	太陰星君	詩 戒妯娌歌	亨	文衡聖帝	詩
亨	王禪老祖	詩 戒命卜欺心詐利文	亨	太乙真人	詩 勸敦守三綱五常文
利	李淳風先生	詩 戒星家害人文	利	袁天罡先生	詩 勸人修譜文
利	木腳大仙	詩 戒停喪不葬文	利	李靖仙翁	詩 戒藥商害人文
利	謝洪仙翁	詩 勸人及早修善歌 修善文	利	謝映登仙翁	詩 勸婚姻以時文
利	姜太公子牙	詩 臨陣對敵文	利	昭烈帝	詩 說禮文
利	二郎神	詩 說仁文	利	諸葛武侯	詩 說信文
利	徐元直先生	詩 說義文	利	水鏡先生	詩 嘆世境曲
利	第一殿秦廣王	詩 姦淫案 詩 不孝案	利	孚佑帝君	詩
利	第二殿楚江王	詩 因財害命案	利	第三殿宋帝王	詩 妓首害人案
利	第四殿五官王	詩 悍婦逆姑案	利	第五殿閻羅天子	詩 口角致命案
利	第六殿卞成王	詩 罪婦殺三夫案	利	第七殿泰山王	詩 貪官污吏案
利	本堂帝君韓	詩	利	第十殿左判官李	詩
利	第八殿都市王	詩 拋親設賭案			
貞	第九殿平等王	詩 老嫗害人失節案	貞	第十殿輪轉王	詩 縉紳害人案
貞	酆都大帝	詩 贊宣講文	貞	孚佑帝君	詩 論
貞	亞聖孟夫子	詩 贊鸞堂文	貞	復聖顏夫子	詩 序
貞	紫陽朱夫子	詩 讚	貞	太上老君	詩 序
貞	如來文佛	詩 序	貞	幽冥教主	詩 勸人修身齊家文
貞	文衡聖帝	詩 嘆世境文 序	貞	司命真君	詩 慨末劫文 跋
貞	先天將軍李	詩	貞	豁落靈官	詩 勸肅整家規文
貞	復聖顏夫子	詩	貞	青衣童子	詩 歌
貞	孚佑帝君	詩 勸學文 銘	貞	監理堂務歐陽	詩 記
貞	本堂帝君韓	詩 引	貞	大太子關	詩 戒色安親歌
貞	將軍廖	詩 勸勿貪非義財文	貞	本堂周將軍王	詩 行述
貞	孚佑帝君	詩 訓鸞下詩 訓諸生歌	貞		

附錄 2

勸濟堂發展與礦業興衰年表

1886 年 / 清光緒 12 年	清光緒 12 年，相傳有 5 戶農民移居金瓜石地區的碑仔尾（今五號路五號寮小吃店一帶），蓋了五間草寮，以農耕為業，五號寮的地名由此而來。
1889 年 / 清光緒 15 年	臺灣巡撫劉銘傳建造臺北至基隆鐵路時，工人於八堵鐵橋下發現基隆河內有金沙。從此引起基隆河淘金熱。
1893 年 / 清光緒 19 年	淘金客溯溪而上發現小金瓜露頭，之後又發現大金瓜露頭，並於其附近漸漸形成石尾、樹梅坪、茂風、金西坑、石腳、赤牛仔寮、水管頭、杉仔湖、祈堂腳、五號寮等礦工聚落。
1895 年 / 清光緒 21 年	甲午戰爭後清朝政府割臺予日本政府。
1896 年 / 明治 29 年	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鑛業規則」規定只有日本人可以經營鑛業。該年，以基隆山南北軸線為界，將水金九鑛山分為兩個鑛區，日商藤田組取得瑞芳鑛山（今九份地區）經營權，日商田中組取得金瓜石鑛山經營權。 金瓜石地方頭人黃春於石尾經營苦力頭店、雜貨店等，於苦力頭店供奉關聖帝君。
1899 年 / 明治 32 年	黃春將店裡供奉之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寮改稱乩堂並增祀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王靈天君。
1900 年 / 明治 33 年	在五坑附近建立第一座製煉場，其後陸續興建了第二、三、四、五製煉場。改乩堂為「勸濟堂」。黃春、黃仁祥兄弟等人向淡水行忠堂學習鸞法。
1902 年 / 明治 35 年	勸濟堂遷建於現今拜亭的位址。
1905 年 / 明治 38 年	金瓜石鑛山發現硫砷銅礦。
1918 年 / 大正 7 年	田中組經營困難，由該鑛山技師田中清及煤鑛業者後宮信太郎合組「田中鑛業株式會社」，收買鑛山繼續經營。
1920 年 / 大正 9 年	臺灣總督府令第 48 號確定了「金瓜石」作為聚落名稱。
1931 年 / 昭和 6 年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因籌建製煉場致使勸濟堂建物龜裂。
1933 年 / 昭和 8 年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由後宮手中手買下金瓜石鑛山，創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建設大規模的新設備，金瓜石鑛山之生產驟然增加，一躍而成為名符其實的亞洲第一貴金屬鑛山。
1934 年 / 昭和 9 年	地方人士簡深淵、黃仁祥、游阿秋為勸濟堂重新建築委員，於現址進行重建。

1937 年 / 昭和 12 年	勸濟堂重建落成
1945 年 / 民國 34 年	二戰結束，國民政府經濟部接手金瓜石鑛山。
1946 年 / 民國 35 年	金瓜石鑛山移交資源委員會接辦，成立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
1948 年 / 民國 37 年	由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改為臺灣金銅鑛務局。
1955 年 / 民國 44 年	臺灣金銅鑛務局再改組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延續 50 年代初期「以銅養金」之經營策略。
1970 年 / 民國 59 年	金瓜石地區媽祖遶境改為農曆 3 月 23 日辦理。
1975 年 / 民國 64 年	勸濟堂正殿改建為鋼筋混凝土。
1983 年 / 民國 72 年	勸濟堂改建左右護龍、新增建鐘鼓樓與拜亭。
1985 年 / 民國 74 年	勸濟堂興建後殿
1987 年 / 民國 76 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結束營運。
1991 年 / 民國 80 年	勸濟堂關公銅像落成
2001 年 / 民國 90 年	勸濟堂增建「文化樓」
2005 年 / 民國 94 年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開館營運
2011 年 / 民國 100 年	勸濟堂辦理第一屆關公節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2016 年學刊第 4 期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發行人：朱立倫

總編輯：林寬裕

主編：廖文卿

企劃編輯：朱南光、鄭宜峯

執行編輯：張簡俗文

校對：林承緯、李建緯、江明親、蔡宗雄、蘇憶如、
駱淑蓉、王慧珍、許勝發、徐明福、鄭宜峯、
王惇蕙、張簡俗文

編審委員：阮昌銳、余炳盛、林茂賢、徐慧民、陳逸偵、
黃士娟（依姓氏筆劃排列）

美術設計：新北市維凱創意印刷庇護工場

出版單位：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地址：22450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8 號

電話：(02)24962800

傳真：(02)24962820

網址：<http://www.gep.ntpc.gov.tw>

經銷商：紅螞蟻圖書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11494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19 號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出版日期：2016 年 1 月（初版一刷）

定價：新臺幣 250 元整

I S S N：2308-8427

G P N：201020132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SN 2308842-7

00250



9 772308 842002